

# 炎黄春秋

第 **2** 期  
2010年

**田纪云：追忆关于改革的两点建议**

**还原真相是走向正义的第一步**

**改革重点：建立现代新闻制度**

**在中国上学插队的美国人**

**韩国腐败文化与廉政建设**



## 目 录

春秋笔	
1 追忆关于改革的两点建议	田纪云
3 毛泽东称赞美国的民主和天赋人权	李 凌
一家言	
6 改革重点：建立现代新闻制度	胡星斗
7 批量制造改革者	辛 宇
10 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稳定	王利平
14 刘青山张子善事件的再反思	张 鸣
亲历记	
16 我参与了抢救胡耀邦	王敏清
18 右派农场的马克思主义学会	吴 昊
23 毛主席的芒果到瓮安	黄育中
25 在中国上学插队的美国人	韩 秀
品书斋	
31 《无声的群落》：最后的古代故事	王克明
33 为国为民心坦荡——读《李昌传》	杨继绳
37 读《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释集评》	姚锡佩
沉思录	
41 还原真相是走向正义的第一步	郭道晖
43 大地主刘文彩：集体记忆的重构	王永华
忏悔录	
46 反右欠下的良心债	王 瑛
往事录	
48 抗战胜利后中共的地方自治思想	赵铁锁 肖光文
52 我看历史上的朱毛之争	李尚英
55 解放区审判外国人第一案	刘向上
59 我在少先队的工作经历	吴芸红
怀人篇	
63 思想者陈乐民	朱尚同
70 胡耀邦救了我一家	姜达雅
争鸣录	
72 民主的对立面不是专制吗	胡 湘
75 也谈刘少奇骨灰的保存和查找	黄家生
海外事	
77 韩国腐败文化与廉政建设	詹小洪
80 “墨西哥奇迹”与墨西哥宪政	思 源
编读窗	
76 还历史本来面目	杨 军
87 读者来信摘登	蒋燕燕等

## 顾 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荣华 李 普 李一鑫 李大同

李冰封 李维民 杨天石 杨继绳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苏双碧

邵燕祥 周瑞金 范敬宜 金冲及

赵德润 钟沛璋 凌 云 展 江

徐 孔(副召集人) 秦 晖 袁 鹰

高尚全 章诒和 萧蔚彬 彭 迪

曾彦修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 社 委 会：

杜导正(主任) 徐 孔 吴 思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竞成

## 社 长：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常务社长、总编辑：吴 思

副 社 长：徐 孔 杨继绳

执行主编：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胡竞成

网 络 总 监：张晓鸥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白建钢 郎福呈

秘 书 长：徐 孔

副 秘 书 长：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昊奕赵阎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印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本 刊 网 址：<http://www.yhcqw.com>

本刊电子信箱：[yanhcq@sina.com](mailto:yanhcq@sina.com)

发行部 邮箱：[yhcqfxb01@126.com](mailto:yhcqfxb01@126.com)

电话：发行部：010—68532048

编辑室：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室：010—68525374

办公室：010—68522852

传 真：010—6853256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定价：6.90元

本期：终审 吴 思

执行主编 李 晨

审校 王晓梵

# 追忆关于改革的两点建议

• 田纪云



田纪云

1997年7月4日,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我对进一步推进改革问题提出了以下两点建议:

一是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必须正视现在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处在极为困难的境地,已成为影响国家安定、威胁党的领导基础的大问题,建议中央下最大的决心,以最大的勇气,以邓小平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按照十五大报告提出的思路,排除一切阻力和干扰,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实现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

要实现这个突破,关键是排除干扰。回想我们近二十年来改革开放的进程,每前进一步都有阻力和干扰,比如:农村承包、乡镇企业、办特区、沿海发展战略、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让外资承包开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证券股票市场,等等。每前进一步都有人出来责难,轻则戴帽子,重则打棍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一看,还很少发现有哪些改革措施是错误的,使得生产力遭受破坏的。相反,每排除阻力前进一步,使改革深入一步,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力的增强、社会的进步,使人民受益。是非曲直不言自明。而那些给人戴帽子、打棍子的“裁判员”们,从来没有认过输,至多是不哼不哈,默不作声。但他们很快又对准下一个改革目标。现在他们的目标是对准国有企业的改革、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谁敢越雷池一步,他们就说谁是搞私有化、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让国有企业原地踏步,自生自灭,才是坚持社会主义。搞活了,搞好了,倒是资本主义。岂非咄咄怪事。这实际是“四人帮”“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翻版。

其实,这些人也未必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更未见过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无非读了几本马列书,摘引只言片语,加上自己想当然的理解,拿来吓唬人而已。这些人更少了解实际,了解国情。说挖苦一点,就是不知道或者忘记了饿饭是什么滋味。他们没有真正理解小平同志这样一个思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饿饭的社会主义,贫穷的社会主义,人民不幸福的社会主义,人民是不会拥护的,在当今世界上是难以立足的。这正是些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最深层原因。

那些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也应该有点自知之明。现在除了邓小平的理论能够动员群众,号召群众,凝聚群众外,任何盗名欺世的所谓“理论”,可以说根本没有市场,人们只不过嗤之以鼻。

要突破国有企业改革这个难点,就必须根据小平同志指示的,要敢于冒点风险,敢于闯,敢于



试,才有可能挽救国有企业,开辟国有企业的光明未来。可以相信,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将大大解放生产力,使我国经济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二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我赞成政治体制改革采取慎重态度,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十二亿人口(整理者注:当时的数字),人的整体素质又不高,改革的措施必须稳妥。但稳妥也得逐步改,不改是难以持久的。

现在提出健全法制、依法治国是完全正确的。但有了法不等于能执行。现在发生的许多案件并非因为没法律,而是有法不依、执法犯法、徇私枉法、以权乱法。解决这个问题根本的措施就是加强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有人说,民主是腐败的天敌,我看有道理。我认为近期可以研究,在扩大党内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内部民主,加强党的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监督和制约机制方面采取一些可行的具体步骤。

现在有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受法律的约束,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民的利益,大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因为有权,谁也管不了,谁也不敢管。只有建立一套党内、人民代表大会内部的民主监



督机制,让普通党员、人民代表真正具有说话、监督的权力,让当官的“乌纱帽”与党的、人民的民主监督制度联系起来,把公仆置于主人的监督之下,才能使法律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制止腐败的蔓延滋长。毛主席说过:“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主席所说的人民民主,是跳出黄炎培先生所说历史兴衰这个周期率的唯一可行的路子。在十五大报告中原则都有了,但需要具体化。

另外,毛主席早就提出,干部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但一直是一个口号,未形成制度。现实情况是,能上不能下,能官不能民,只有犯了错误才能下。在台上一切都好,无人敢批评,下了台,一切皆非,办的好事也成了坏事。我认为,现在是到了应该建立干部包括国家领导人正常交替机制的时候了。

我相信,我的上述建议,特别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多数人是会赞成的。散会后,有一位领导同志就向我表示同意我的观点,并说:“正想听你怎么办的意见哩,怎么一下就收了?”

(上接6页)机构也承认其运营的独立性。1932年萧同兹提出三个条件:第一,独立经营,使中央社有机会与报界及社会接触;第二,以新闻为本,发稿不受干预;第三,用人行政,社长有自由决定权。蒋介石同意了,萧同兹才接任中央通讯社的社长。

如今,中国进入了高风险期,社会矛盾突出,大部分矛盾都与缺乏公众监督、新闻监督,人民群众缺乏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有关,如腐败、特权、垄断、信访、贫富差距、司法不公、官民冲突、弱势群体利益受损,等等,无不根源于新闻自主的阙如。虽然不是说了有了新闻自主,这些问题马上全部可以解决;而是说,新闻自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和基础。

新闻体制改革也最容易、最可行。不像搞民主选举,操作非常困难,甚至有人担心会造成社会失控。新闻改革,需要的是无为而治,治大国若

烹小鲜,是传统的道家智慧,也就是说:放弃新闻垄断和管制就行了;少干预新闻报道就行了;撤消审读、审看的组织就行了。当然,无为不是绝对的不做,政府要做的是制定《新闻法》,然后一切依法行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提高执法能力和效率。新闻体制改革,会造成社会舆论“乱哄哄”,这是社会活力和民族创造力的来源,不是坏事,而是思想解放的前提,只要大家都守法,违法必究,那么社会就不会失控。

改革新闻体制,应当成为中国未来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我相信中国政府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应对各种各样的危机,顺势而为,通过抓住建立现代新闻制度这一“牛鼻子”和关键,化解燃眉之急。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

(责任编辑 萧 徐)

# 毛泽东称赞美国的民主和天赋人权

• 李凌

看了这个题目,有的同志可能提出疑问:“你这个提法有根据吗?”回答:有根据,有大量史料为据。这是历史,是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请先看胡乔木为1944年7月4日《解放日报》写的题为《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日》的社论:

今天是美国国庆日。1776年7月4日,美国人民在华盛顿,杰斐逊等民主主义伟大先驱的领导下,宣布了民族的独立。美国的独立是处于这样的历史条件:它不但代表美国的民族利益,而且代表美国的民主利益,代表美国要求自由的多数人民而与美国当时的保皇党——大地主、大商人、职业宗教家的集团相对立,这样,领导独立战争的华盛顿就不但完成了民族任务,同时也完成了政治上经济上的民主任务,而被选举为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的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个大总统了,同样,杰斐逊总统,不但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同时也是消灭大地主法案、思想自由法案、全民教育法案、禁止输入奴隶和限制奴隶法案的起草者。这个事实,就说明了美国独立运动的丰富历史内容,也就说明了美国为什么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而且直到今天,也与社会主义的苏联成为民主世界的双璧。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家和行动家,对于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及其在世界史上的进步作用,从来都是给予最高度评价的。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有其光荣的历史传统,美国的独立不是唾手可得,是在八年的对外战争与更长期的对内斗争中完成的。列宁说,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真正解放和真正革命的战争”之一;正因为如此,美国的民主派领袖杰斐逊和杰克逊,美国民主党的这两个创造者,在他们的斗争中甚至被他们的政敌指为“共产主义者”和“赤化分子”。美国穷木工的儿子林肯,他所领导的黑奴解放战争被马克思称为“开始了劳动阶级兴起的新时期”,而在实际上,他与马克思所领导的美国共产主义者和欧洲共产主义者也是合作的,他曾委任美国的共产主义者担任他的军官,这样,他就更有理由被当时的反动派指为“共产主义者”和“赤化分子”了,以至最后这些顽固分子竟然暗杀了他……

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

7月4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

中国的独立战争和民主运动万岁!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摘自《胡乔木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0—133页)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毛主席8月底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战后和平和建国问题。路透社记者甘贝尔向毛主席提出问题,甘贝尔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

毛主席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按:四大自由指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言论和表达的

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28页)

以上史料说明:当时身为毛主席政治秘书的胡乔木写的社论完全符合当时毛主席的思想,是对毛主席的思想的阐发。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新华日报》也发表了多篇文章,赞颂美国的民主,如1943年7月4日,该报发表的社论《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1944年7月4日,该报又发表社论《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这篇社论的内容与《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内容完全相同。可见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发的统稿。

1945年4月13日,《新华日报》又发表社论《纪念杰斐逊先生》,该文赞扬这位《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权利法案》的倡导者,“以对人民的无比的信心与坚决的态度,在这新世界上的新国家中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础”。社论指出,“人有天赋的人权,人的自由与尊严,不该为不公正势力所侵犯和亵渎。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这从十八世纪以来,应该早已经是全人类共知公认的常识”,“可是在今天还有人想用丑恶卑劣的方法来钳制人民的自由,剥夺人民的权利”,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个民主先锋诞生的日子,就格外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也就格外觉得杰斐逊先生精神的崇高与伟大了。”

这篇文章不只是从制度方面来论证民主,而且从普世价值观方面来申明“人有天赋的人权”,“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这就更加珍贵了。

更值得指出的是:1946年7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美国国庆》,该文大力谴责美帝国主义支援蒋政府打内战,干涉中国内政。社论强烈要求美国撤走驻华美军。但即使在这个时候,这篇文章一开头仍然肯定美国的《独立宣言》指出的“天赋人权”,“平等、自由、幸福的崇高思想”,肯定提出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的林肯。社论号召美国人民和民主力量发扬《独立宣言》的精神,改变美国现行的政策。并且坚定相信,在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声援下,中国人民一定能克服各种困难,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的国家。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不只是通过《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媒体发出争取民主自由的声音,而且

亲自出马,多次和美国人赫尔利、谢伟思讨论民主。

1944年夏,日本败局已定,美国政府希望战后的中国,仍由蒋政府统治,但要他进行一些民主改革。美国总统派前国防部长赫尔利少将于9月来华。在重庆时,赫尔利向中共领导人董必武等表示访问延安的意愿,然后于11月到延安,和毛泽东等多次商谈。赫尔利曾提出一个关于国共合作的草案,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满意,经过反复磋商,由毛泽东修改、补充定稿,由赫尔利代表美国总统签字,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签字。该协定有五条,其中第一、二、四、五几条主旨为国共和抗日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合作,组成联合国民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共同努力,以迅速打败日本侵略者。

这五点协定由赫尔利带回重庆后,为蒋政府否决,未能施行,中共曾因此谴责赫尔利不守信义。虽然如此,这个协定的第三条,充分反映出毛主席当时对未来民主的新中国的政治制度的理念。如下:

“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691页)

1944年夏,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时任中缅印战区司令兼任蒋介石参谋长的美国将军史迪威要求华莱士向蒋介石交涉,蒋被迫同意由美方派人到延安。史委任当时号称“中国通”的美驻华大使馆二秘谢伟思为“美国军事观察小组”(组长包瑞德上校)的政治顾问。谢伟思在延安住近三个月,多次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交谈。

在交谈中,毛主席表示中共坚持国共合作和反对分裂的立场,同时,也谈到对美国的民主的肯定和向往。毛主席说:“每一个在美国的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民主的理想。”

谢伟思说:“把我们军队当作一支政治宣传部队来使用是不允许的,我们没有像共产党政治部那样一类教育军队和指导这类工作的机构。”



毛主席说：“即使你们的美国士兵不作积极宣传，但只要他们出现并同中国人接触，就会产生好的影响。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欢迎他们在中国。国民党却不是这样，它需要把他们加以隔离，不让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现在你们究竟有多少美国观察员在前线？我们乐于让你们的人到处走走。国民党却担心大量美国人在中国的影响，他们害怕美国人登陆仅次于他们害怕苏联参战。

“从相反的另一方面来看，有美国人在场也是好的。如果美国人分布得很广泛，他们对国民党就会产生一种约束作用，国民党要制造麻烦就更加困难。昆明是一例子，那个地方已经变成自由主义思想和学生自由活动的中心了，因为在这么多美国人的眼皮底下，国民党是不敢逮捕学生和把学生投入集中营的。拿这一点同西安相比，西安美国人非常少，特务就横行无阻。”

谢伟思及时地详尽地把毛主席的这类谈话内容向美国当局报告，并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建议美国支援中国抗日的武器，也应公平地分配一部分给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由于这些报告和建议，在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麦卡锡主义横行时，谢伟思受到迫害）。后来有人把谢伟思的报告翻译成中文，其中关于毛主席谈美国民主的部分，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的《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发表。

抗日时期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历史已成为中外学者们研究的热门课题。曾经和谢伟思、鲍大可、奥克森伯格等“中国通”以及史迪威后人有密切交往的金先宏先生写了一本题为《影响白宫对华决策的“中国通”——一位前外交官的采访手记》的书，于2003年1月在时事出版社出版。书中有关毛泽东与谢伟思谈话部分，引用了胡乔木写的1944年7月4日《解放日报》社论中的名句：“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

作者金先宏先生据此说明：“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对美国的期望及对中美合作的憧憬不仅是形势的需要，也是长期的战略思考。”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所发表的赞颂美国的民主和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价值观的大量文章，其实也是对

毛泽东当时的思想的宣传和阐发。这种宣传对大后方如昆明、成都、重庆各地的民主运动起过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取得了最高领导的地位，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他大权独揽，发动了多次的政治运动，在经济上违反了他自己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巨著中反复强调的允许包括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和发展的政策。政治上，他违反了当年主张并积极宣传的民主自由的思想，造成千百万冤假错案堆积如山，连开国元勋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都被整死。当年许多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为争取民主自由奋力拼搏，但建国后却被残酷迫害，许多人被摧残致死。

有人为毛泽东辩护，说他在抗战时期宣传美国的民主自由，只是为争取美援的一时策略。这种论调是十分荒谬的。如果是打仗，兵不厌诈，声东击西，设置疑阵，以迷惑敌人，引蛇出洞，以便聚而歼之，这是可以的，无可非议的；因此而打了胜仗的部队还应得到表扬。但这只限于战时对付敌人，而不应在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根本问题上。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时，1980年6月，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61页）同年8月，邓小平又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来但是没有做好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72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在平反冤假错案方面，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主要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我国社会今天仍存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贪污腐败日益严重等重大问题。在抗战期间，毛主席曾大力倡导民主自由，但他在全国执政以后，就违反了自己正确的东西。现在我们应该重申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观，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民主改革，把我国建成为一个高度民主的民富国强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

（作者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现已离休）

（责任编辑 李晨）

# 改革重点： 建立现代新闻制度

· 胡星斗

现代新闻制度是媒体民有、新闻自主、监督官员、保护公民的新闻制度。

所谓媒体民有、新闻自主,是指媒体主要由民间出资、民间所有、民间经营、民间分利,传媒进行独立的报道、自由的评论、充分的竞争、不受权力或者资本的控制。实行媒体自由创立、备案登记制度,禁止利用公共财政资金办报办电视台,推动公共媒体的独立运作,限制大资本的持股比例,允许外资进入传播事业,防止政治家、资本家操纵传媒。进行新闻立法(制定《新闻法》),废除新闻审查,依法发布新闻,依法承担责任,保护新闻记者,捍卫网络自由;废除新闻内参制度,实现新闻的全民共享;取消各类禁载规定,废除审读、审看等制度。

所谓监督官员、保护公民,是指发挥媒体的公器作用和“第四权”的监督作用,揭露权力黑幕,防止权力滥用,批评政府所为,纠正官员偏差,伸张社会正义,维护人民利益,将媒体从官员的喉舌转变为人民的喉舌。为此,必须保护批评报道,严惩官员打击报复的行为;报道即使有误,也免受责任追究,除非你能证明记者是故意的恶意。对于官员、公众人物、强势群体实行有罪推定,举证责任倒置,当弱势的一方起诉时,由强势的一方举证。限制官员和公众人物的隐私权,鼓励公民举报,规范记者行为,保护记者权益,同时保障公民自由接受采访的权利。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罪、扰乱公共秩序罪、窃取国家机密罪进行特别的立法,出台司法细则,防止以言治罪、以文治罪。取消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

按照张博树研究员的观点,新闻的普世价值观可以概括为:1. 新闻媒体的使命在于客观地报道事实,为实现公众的知情权服务;2. 媒体必须成为社会公器,成为公众表达权的手段;3. 媒体必须承担社会监督职能,所以既不能仰赖权力,又不能仰赖资本,而必须与二者保持距离。

中国新闻制度改革的目标可以归结为:解构现存的新闻观念,废除落后的新闻运行体制,建构符合宪政民主原则和公民社会精神的现代新闻观念和新闻制度,还亿万中国国民的信息获取权(知情权)、言论表达权(参与权)和通过媒体对公共权力的公众监督权,并借此为中国宪政改革在各个领域的深化创造条件。

中国曾经有过新闻的开放与自由。清末新政,实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1902年梁启超说“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成为影响中国前途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民国初期,出现私人办报的高潮,报纸以“社会良心”自勉自励。1912年3月4日临时政府内务部曾颁布《民国暂行报律》,规定对“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将停止其出版发行,结果引起舆论大哗,认为是“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众多报纸亦发表社论,表示“所定报律,绝不承认”。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采纳了这些批评意见,发表《令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文》,公开宣布“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从善改恶,古人以为常师”;再,“民国一切法律,皆当由参议院议决宣布,乃为有效”。

国民党时期也认可民间报刊的存在,对于官营新闻(下转2页)



# 批 量 制 造 改 革 者

● 辛 宇

昆明执政经验是仇和同志带领市委“一班人”，依靠人民群众，把中央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的大政方针落到实处的阶段性成果。吕日周同志为组长的课题组，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所形成的长达75页44000多字的课题调研报告，详细地描述了昆明一年多的改革及变化。应该说，选题敏感并重大，调查认真并广泛，研究比较深入，论证比较充分，从而使昆明的执政经验具有较高的价值和较好的说服力。

昆明执政经验调研，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听其言的听声阶段。锣鼓听音，说话听声。在此阶段，下面赞扬声，中间争议声，上面不吱声的“三声现象”，同时存在，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可圈可点。二是观其行的检验阶段。百闻不如一见。仇和同志带领一班人，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身体力行党的宗旨；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只争朝夕为人民服务。于是在老百姓中留传着“求天求地不如仇和”。三是推其广的拷贝阶段。深入接触昆明的父老乡亲，他们说，是党的脊梁，放在脊梁的位置不仅能维护稳定，而且能改革创新！如果将肋骨放在脊梁的位置，就不仅是错位，而且会夭折！在一线奋勇拼搏的改革者，既需要激励，更需要增援！在科学的制度尚未建立健全之际，最有效的激励是重用，最有用的增援是复制拷贝更多的勇于改革创新的“仇和式”干部。

四中全会指出：“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公信度不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屡禁不止。”三十年来，在一些地方和单位，那些能打粮食并勇于创新的改革者常常流汗流血又流泪。这也严重影响了来自基层的改革动力。

所以，我更感兴趣的是，仇和这一目前仅存的职务最高的改革先锋，还能继续在改革的路上向前冲多远，走多久？还能否带动更多的人在改革之路上“敢闯、敢试、敢冒风险”？在我看来，课

题报告最具价值还不是昆明执政经验的分析归纳总结，而是提出了一个十分敏感却又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营造改革者群体辈出的生动局面？

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年，就动力的来源而言，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最初的动力，主要来自最高领导层。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由于有在十年浩劫中的亲身经历，对党内民主被毁，权力过于集中，给党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所造成的危害，感受非常强烈，反思非常深刻，从而对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非常到位。一开始就从政治思想舆论导向入手，通过解放思想，否定“两个凡是”，恢复党的集体领导，科学分解党内权力，重建中央纪委，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成立过渡性质的顾问委员会，并力争通过机构改革吸纳优秀人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此阶段党内民主成为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不仅能对中央（包括毛泽东同志）过去所犯的错误进行认真反思，深刻剖析，而且党内的不同认识，还能通过党的会议、党的报纸进行认真讨论，以形成共识或求同存异。此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同步而且先于经济体制改革，因而才能有力地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这一阶段我们党不仅产生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而且产生了改革开放的总执行官胡耀邦，改革开放的先行官万里等。

第二阶段的动力，主要来自中层骨干。经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此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因投鼠忌器而极其敏感。稳定于是具有了比改革开放更为现实的压倒优势。最高领导层权衡国际国内形势，谋求安定，力保稳定。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一特定时期，动力主要来自中层骨干的自觉推动。1985年至1993年任无极县委书记的刘日，因重视吏治，密切干群关系，加强农村建设，闯出

了闻名全国的“无极之路”。1997年至2000年任遂宁市市中区区委书记的张锦明,在步云乡组织了我国第一次乡长直选。随后,张就任雅安市委组织部,在雅安市雨城区和荥经县推行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并于2002年12月,举行了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县级党代表直选。其改革意义不亚于20多年前的“小岗村”。2000年,沉寂十年之久的吕日周出任长治市委书记,挟十年前改革试点原平县强力推进改革,“政府搭台,农民唱戏”,严格整饬吏治的雄风,以电视剧《新星》主角李向南原型的声望,深度发掘“报纸最有力量是批评”这一优势,充分发挥《长治日报》在舆论监督方面的作用,用密切联系群众的巨大优势,化解了长期执政下脱离群众的巨大危险。“长治变法”成为世纪之交中国地市级改革中的一个样板。

第三阶段的动力,主要来自基层群众。经历20多年的改革开放,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时推进,既得利益势力逐渐形成并坐大,来自高层和中层的改革动力逐渐衰减。广大群众要求共建共享改革成果的呼声不断高涨。如同战争年代一样,改革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同样存在于民众之中。“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开始成为全党的共识。2007年十七大报告由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推导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深化”两字取代了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前缀的“积极稳妥”提法。同时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于是,“表达权”和“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首次进入党代会报告。但是,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由于两极分化的加大,城乡差距的扩大,改革的成果没有实现分享和共享,一些群众的改革愿望和动力以扭曲的方式出现,甚至以群体事件来折射和表现。如从2004年10月的重庆万州事件,到2005年6月的安徽池州事件;从2006年12月的四川大竹事件,到2008年的贵州省瓮安县“6·28”事件。因地震而形成的堰塞湖,从上到下高度重视,因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表达权落实困难而出现的“言塞湖”,却鲜有人注意。尽管各级党委政府对群众信访越来越高度重视,甚至抽调骨干到北京值班,变接访为截访。但是,群体访、

越级访有增无减并始终在高位运行。与此同时,由于三十年改革者命运多舛,那些最善于深入群众,化解矛盾,推进改革,赢得民心的改革先锋,如刘日、吕日周等,大多被搁置赋闲,难以施展身手,致使改革进入第三阶段,利益分化非常明显,腐败形势仍然严峻,干群关系十分紧张,敢于冲在改革前沿“手把红旗旗不湿”的弄潮儿,在逐年递减。

据此,“如何营造改革者群体辈出的生动局面”,不仅是当前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必须正视的重大课题,而且也是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全面推进改革,特别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破解的重点难题。

清代思想家、政治家魏源,曾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勾勒出一幅从人才站位透视权力结构、政权兴衰的历史挂图:“至治之世,士在公孤;小康之世,士在僚采;倾危之世,士在游寓;乱亡之世,士在阿谷。”(《默觚下·治篇十二》)

通过这幅图,对照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人才站位及选拔任用,大概有这样一些普遍现象:专注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官员,只要有突出政绩且被高层领导和基层群众认可,便有可能升至省部级及其以上;如果改革由经济领域进入政治领域,但只涉及技术层面的改革官员,且有突出政绩并被高层领导和基层群众认可,也有可能升至地厅级或省部级;如果涉及政治领域中权力来源、权力结构、党内民主、领导制度、监督体制层面的改革官员,即使政绩突出、民意良好,但一般会止步于县处级或厅局级。或许,这种状况也暗合了古人关于“小康之世,士在僚采”之说(僚采,古时同僚相称,此指县、州、府等中层官位)。

最好的用人导向是制度导向,当用人制度还正在建立健全过程中,政策导向、案例导向也是需要的。2000多年前的商鞅,为使秦国能吸纳各国优秀人才,用“徙木立信”这一成功的经典案例,深入浅出地诠释了秦国崇尚法治、尊重人才政策和人才强国战略,为广纳各国精英做了一个最具创意的广告。

2004年冬,我在江苏与时任省委书记的李源潮同志有过一次长谈。话题是“如何从干部‘能下’方向实施战略突破”。结论是:改革开放20多



年,干部“能上”方向的创新空间已经极小,但“能下”方向的空间却相当广阔。如果“能下”空间一旦打开,干部队伍的素质就能在流动中不断提高,唯“年轻化”是举的僵局就能顺利打破,改革中的优秀人才就能脱颖而出!据此,在干部“能上与能下”这对矛盾中,“能下”才是主要矛盾!

当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还处在攻坚的关键阶段,当干部“能下”的战略突破口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时期,如果能变通地采用“徙木立信”的方式,大胆起用刘日、吕日周、张锦明、仇和等改革闯将,让他们在干群关系最紧张、改革最困难的地方去化解矛盾,凝聚人心,大胆创新,深化改革,那么,通过这种用人的案例导向,也能展示中央重用改革者的决心,能使全国各地逐步形成良好的用人导向,以“营造改革者群体辈出的生动局面”,进而有力地推动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

而要做到这些,一是要为改革者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使“敢闯”者有所“依”。改革开放是振兴中国、复兴中华民族的一出大戏,需要为“敢闯、敢试、敢冒风险”的改革者打聚光灯,需要为他们及时喝彩,因此主流媒体应在第一时间为改革者做及时的跟踪报道,在争议和是非面前要敢于为改革者撑腰壮胆,如果党的报刊不敢见义勇为,改革者也就难以冲锋陷阵。二是要为改革者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使“敢试”者有所“靠”,让

明哲献身而不是明哲保身的改革者始终敢为天下先,让“改革者群体辈出的生动局面”既要靠领导抓典型抓出来,也要靠领导以身作则带出来,更要靠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催生、培养、成长出来!这种制度既是改革者勇气的依托,也是改革者利益的保障。三是要辩证认识对改革者的争议,正确处理改革中的失误。改革是对现有体制、机制、制度弊端的一场革命,是对既得利益的挑战,是以单兵突进、孤军深入的方式对传统势力发起的战术冲击。因此,改革者个人利益的牺牲是必然的,引发的争议是必然的,偶尔的失误也是必然的。有鉴于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各级党委政府绝不能一有争议就否决改革者,一有失误就否定改革者。因为,改革通常会有争议与失误,而没有争议与失误的,通常也不是真正的改革者!

允许这些改革先锋的存在,已经证明历史在进步;如果能允许这些改革先锋的发展,那么则更能证明时代在前进!

进而言之,如果仇和、吕日周、刘日、张锦明式的领导干部在县(区、市)委书记位置上有300个左右,在市(地、州)委书记位置上有30个左右,在省委书记位置上有3个左右,那么,就能大大提高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切实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因为,人民群众最清楚谁在为人们服务!

(责任编辑 李 晨)

SIEMENS

SW 声望听力  
好听力·好生活

# 西门子助听器

解决听得见听不清 耳聩耳鸣的烦恼

声望全国连锁助听器专业验配机构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46号天恒大厦508A/B

电话:010-84608877 400-610-0896

邮编:100027

网址:<http://www.sw-tl.com>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苏医械广审(文)第2009030029号

# 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稳定

● 王利平

## 一、当前所面临的社会危机

1. 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社会不公日益突出,并呈现固定化和代际传递趋势。

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 2006》提供的 127 个国家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测量指标,中国与几个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并列于第 95 位,列入少数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很高的国家之一。<sup>注 1</sup>

王春光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撰文《警惕我国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和固定化问题》指出:对 2001 年十大阶层的目前收入与过去收入之比较,我国的贫富两个阵营已经成型,私营企业主的高收入地位和农业劳动者的低收入地位没有因时间的变化而改变,特别是私营企业主们在其小时候的家庭收入就比其他阶层的家庭收入高,而农业劳动者在其小时候的家庭收入也是最低的,这明显地透露出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迹象。在两个贫富群体已然成型的格局下,贫富的代际传递也有了相应的依托:富者的后代承受着富者的遗产和资源,贫者的后代继续忍受着贫穷的煎熬。在这里,市场机制的作用、体制的缺陷、社会结构的惯性以及价值观念的影响,进一步促成了贫富差距的代际传递。<sup>注 2</sup>

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问题研究》指出:根据《国际统计年鉴 2004》、《2004 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统计年鉴 2003》的数据或其中相关数据的整理和计算,中国现实社会中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呈现出一种颠倒的状况,十分不合理。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是直接关乎基本民生的头等大事,但是由于政府在自身定位方面的错位,我们国家在

这些方面公共投入的比例却小得可怜。从世界主要国家情况的比较来看,中国在这方面的投入比例是最低的,这进一步固化着业已扩大的贫富差距。<sup>注 3</sup>

2. 社会财富通过权力寻租(腐败)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趋势加剧。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撰写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研究报告摘要指出:根据恩格尔系数和其他一些消费特征进行初步推算,高收入阶层中存在大量隐性收入,目前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 10% 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 31 倍,而不是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的 9 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 10% 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 55 倍,而不是按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推算的 21 倍。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要远大于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的水平。在中国城镇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灰色收入,这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包括金融腐败、土地收益流失、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支出、垄断行业灰色收入等,数额已接近 3 万亿元,占了 4.4 万亿元遗漏收入的大部分。这说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存在巨大漏洞和严重制度缺陷。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和灰色收入:

(1) 财政资金通过“条条”(部门)渠道分配到各地的部分存在严重管理漏洞。有大量资金脱离了财政管理程序,透明度低,滥用和漏失严重。2005 年这部分资金估计约 5600 亿元,漏失部分待查。近年来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数额巨大(2006 年 4.5 万亿元),投资项目层层转包、工程款层层剥皮,营私舞弊现象严重,漏失巨大。据有些项目的情况,施工单位实际拿到的工程投资还不到工



程拨款的 1/3。

(2)金融腐败普遍存在。据央行研究局 2003 年一项大面积调查,全国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已成为一项“潜规则”。平均而言,企业在每笔贷款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和为维持与金融机构“良好借贷关系”的费用合计,相当于贷款额的 9%。2006 年全国金融机构贷款 22 万亿元,考虑大型企业贷款条件有利,较少发生这种情况,按贷款额的一半推算,额外付费给全国金融机构相关人员带来的灰色收入可能高达 1 万亿元。由此造成的不良贷款损失还未计算在内。

(3)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寻租行为。例如各地党政官员入股煤矿,这些“股权”多是凭审批权、检查权、资源控制权换来的。又以医药业为例,一个时期以来药品审批和流通环节极为混乱,给医药行业和相关权力部门某些人带来了巨额灰色收入。世界银行 2006 年进行的中国 120 个城市竞争力调查指出,企业的旅行和娱乐花费可以衡量对政府官员的“非正规支出”(行贿的委婉说法)。这项花费占企业销售额的比例在各地和各类企业有所不同,最低 0.7%,最高 2.3%。如果以 0.5% 作为企业正常支出水平,超过部分作为行贿部分,按 2006 年全国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销售收入 55 万亿元计,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花费约为 5000 亿元。这可能还只是行贿的一小部分,未包括现金、存款、实物、信用卡划账、股权赠送等行贿方式。

(4)土地收益流失。2005 年有价出让国有土地 16.3 万公顷,其中“招拍挂”出让面积只占 1/3。“招拍挂”与其他方式出让的平均地价相差 4—5 倍,差价每公顷 500 多万元。除去其中 0.5 万公顷经济适用房建设用地不适用“招拍挂”方式,其余 10.1 万公顷土地少收 5400 亿元。这成为房地产开发商暴利和权力相关者灰色收入的来源。未采用有价出让方式但进入了市场的土地还未计入。此外,在土地征用开发过程中估计地方政府平均每亩获益 10 万元,合计 2080 亿元。这部分本该用来补偿失地农民和用于社会长远发展的土地收益,在大多数情况下被作为地方当期额外收入花掉了,其使用严重缺乏监督。

(5)垄断行业收入。2005 年电力、电信、石

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 833 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 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达 1.07 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 55%,高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部分约 9200 亿元。其中相当部分来自行政性垄断。<sup>注 4</sup>

3. 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加,官民冲突日趋激烈,政府的治理危机凸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范亚峰在《治理群体性事件需要宪政新思维》一文透露:根据公安部门披露的数据,群体性事件数量从 1994 年的 1 万多起上升到 2004 年的 7.4 万多起,增加了 6 倍多,参与人数从 1994 年的 73 万人次上升到 2004 年的 376 万人次,增加了 4 倍多。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的特点:第一,事发突然,演变迅速。一旦事发,规模迅速扩大,在数小时至数日内引起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参与。第二,组织严密,行为激烈。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都有策划组织者,参与者往往进退有序,表现出相当的组织性、目的性和纪律性。第三,发生的直接原因一般都与群众切身利益有关。第四,参与者日益体现出鲜明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第五,多重矛盾交织,处置难度大。稍有不慎,就可能激化矛盾,扩大事态。公安部 2004 年的统计显示,劳资关系、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等问题,是酿成“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sup>注 5</sup>

2004 年 2 月 20 日北京大学志愿服务与福利研究中心主任丁元竹教授公布《2010 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对 98 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其在该报告中指出:对于中国在 2010 年前是否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有 77 位专家做了回答,其中 51 位认为会发生重大危机,26 位认为不会,分别占 66.23% 和 33.77%,说明大部分专家认为中国 2010 年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风险较大的时期,或者说是危机多发期。同时指出:国内治理危机中使人们较为关注的危机因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官员的贪污腐化、欺压百姓、违法乱纪、不严格执行党和政府的政策,将激化现已存在的社会矛盾,引发进一步的社会危机,换句话说,治理危机可能会成大规模经济或社会危机的

导火索。<sup>注6</sup>

4. 公民利益表达机制不畅和缺乏,社会危机和矛盾被掩盖,政府对社会危机反应迟滞。

最近10年,信访量逐年增加。据官方统计,中国2003年到2006年每年平均信访量超过1000万件。<sup>注7</sup>只讲对外开放而迟疑于对内开放,对公民政治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的宪法权利,缺乏立法保障,有些地方党政部门还极力加以压制,从而使权力腐败得不到国家权力、社会权力和公民权利的有效制约和监督,甚至使其“稳定”成为权贵们压制人民争取合法权利与自由的大棒。2007年4月9日《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的山西稷山当地党政官员调动公检法对三位举报者予以定罪量刑事件,就是一个恶例。<sup>注8</sup>

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在2005年6月24日做客人民网时透露,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来自工农第一线的代表大概只有100多人,而具有官员身份的代表有1200多人;此外,蔡定剑统计过一个市的人大代表,干部代表超过了60%。

2005年,在全国“两会”期间,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针对我国各级人大代表中官员占70%的构成现状,也曾大声疾呼:“代表中的官员之多是世界罕见的,人民代表大会不是官员代表大会!”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代理主任郑国强2006年12月21日上午在2006年广州市人大制度研讨会上作书面发言时说:“很有必要调整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专兼职比例。目前的代表结构问题比较突出,党员、官员代表比例偏高,农民、工人和外来人口的利益缺少真正的代言人。”<sup>注9</sup>由于选举缺乏透明公正,执政党官员及代表缺少面对公众质疑的经验,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普遍缺失,常常把小矛盾激化为群体性事件。

5. 生态恶化,环境危机。

我国的污染已经呈现出“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中后期出现的污染公害已在我国普遍出现,我国已没有继续支持目前经济增长方式的环境容量。未来15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4.6亿,到2020年经济总量将再翻两番,不断增长的经济规模和人口,对资源和环境造成

巨大的压力。按现在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控制水平,污染负荷将增加4—5倍。这个阶段特别是“十一五”期间,将是我国环境与发展矛盾最为突出的时期。中国正在为环境污染付出沉重代价。

世界银行2001年发展报告中列举的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16个。许多大城市肺癌标化死亡人数增加了8—10倍。据研究,空气污染使慢性呼吸道疾病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疾病,其造成的污染和经济成本约占中国GDP的3%—8%。与环境污染相比,生态恶化是在城市人的视野之外静悄悄地发生的,往往不被人们注意,然而其危害和后果远比环境污染更为严重,因而生态灾难基本是不可逆转的。水土流失、草地退化、沙化和荒漠化、生物多样性消失等等,将危害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近年来我国的生态恶化,既受到全球范围气候变化、温室效应的影响,也由于经济活动和人口压力对环境的影响。2005年1月,评估世界各国(地区)环境质量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在瑞士达沃斯正式对外发布。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按照满分100点的打分规则,芬兰位居第一,中国(38.6点)位于伊朗之后,名列第133位(倒数第14位)。在2002年第一次发布该指数时,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居第129位。<sup>注10</sup>

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社会不公日益突出,当这一现象普遍存在社会生活之中时,现存制度的公正性就要受到质疑;当工农大众日益被边缘化、日益贫困化、丧失话语权,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就会产生动摇。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革开放而形成的权威正面临挑战,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言,“政绩合法性”出现问题。<sup>注11</sup>

## 二、警惕以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为代价换取社会的短暂稳定

中共中央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其中第一个目标就是,“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这表明,中央已意识到,法治建设在和谐社会建设当中处于最核心的地位,靠法治才能使社会走向



和谐。然而,从2009年内几则新闻报道来看,在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公安队伍成了社会和谐稳定的依靠。

新闻一:公安部近期将派出多个督导组奔赴各地,了解关于当地社会稳定的情况。公安部2009年2月10日召开开展维护社会稳定专项督导工作行前动员会议,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部长杨焕宁,党委委员、部长助理黄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新闻二:中新网2月18日电,据公安部网站消息,2月16日下午,全国县级公安局长专题培训班工作人员动员会在京召开。会议要求,用半年左右时间,把全国3080名县级公安局长分批集中到北京进行专题培训。据悉,第一期培训班于2月18日开班。据政情人士分析,应对群体性事件也是此次培训的重点。

实际上,严防死守守不出和谐,警察治国更治不出和谐,社会要实现和谐稳定,就得靠法治做保障,这已被人类社会实践所证实。和谐应该是一种动态平衡之下的和谐,是一种社会各阶层公平博弈状态下的利益均衡的和谐,是一种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和谐共处,是一种政府与民间的和谐共处,是一种执政者与批评者之间的和谐共处,是一种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多元共赢的局面。而这一切必须以任何掌权者(包括执政党)都要受到法律约束为前提,必须以所有公民权利都要得到法律保障为前提,因此,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

当务之急是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法治建设,让制度输出正义。针对目前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必须运用法治的理念和方式来解决,切忌将社会矛盾政治化,更不能将民众合理合法的诉求(包括体制改革的诉求)贴上阶级斗争的标签,予以拒绝敌对。目前,政府从经济到政治仍面临许多困难,但一切困难的解决都取决于政府对民间力量参与制度变革的态度,这也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政治能否实现改革开放的关键。民间力量参与制度变革,并不是挑战政府权威,更不是颠覆国家政权,而是要推动政府变革,实现社会转型。面对民间力量参与制度变革,期待政府富于理性,怀着善意,秉持宽容,多沟通,多协商,多对话。

184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清末重臣李鸿章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则称之为“驶入历史三峡”。当前,中国驶入了“历史三峡”的水流湍急之域,再次处在1840年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关节点上,根本性制度变革已刻不容缓。政治体制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不能以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为代价换取短暂的社会稳定。期望政府国家与民间走上良性互动的道路。

参考文献:

注1 王小鲁:《我国的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比较》第31期。

注2 王春光:《警惕我国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和固化问题》,《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年第9期。

注3 吴忠民:《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问题研究》,《东岳论丛》2006年第2期。

注4 王小鲁:《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研究报告摘要,《财经》总186期。

注5 范亚峰:《治理群体性事件需要宪政新思维》,http://www.gongfa.com/fanyanzhiliquntixingshijian.htm

注6 丁元竹:《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http://www.gongfa.com/2010zhongguo.htm

注7 周永坤:《信访潮与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暨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注8 晋瑛李永岗李慎波:《山西稷山三干部因文获罪》,《民主与法制时报》(2007年4月29日)。

注9 杨涛:《“官员代表”代表官员》,http://tao1991.fyfz.cn/blog/tao1991

注10 人民网:《首部“环境绿皮书”发布我环境生态高危及》,http://forum.edu.org.cn/post/print?bid=15&d=115

注11 [美]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

(作者系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 吴思)

## 启 事

2008年精装合订本 85元,简装 80元  
2009年精装合订本 100元,简装 95元  
2009年简装合订本(上、下册) 105元  
免费挂号邮寄,汇款地址见本刊目录页

# 刘青山张子善事件的再反思

• 张 鸣

很多历史事件，往往会因其表面的征象，被人们赋予特别的符号意义。而其真实的内涵，反倒因而被遮蔽。中共建国初年，在三反运动中发生的刘青山张子善事件，多少年来一直是中共反腐败的一个标本，具有绝对的正面价值。连带着，事件发生的三反五反运动，也罩上了一层不容置疑的光环。眼下，有关刘张事件的描述、回忆甚至演义已经相当多了。但是，无论哪种叙事，都不能否认一个基本事实，即，这个最终导致当事人被枪毙的事件，其实属于典型的“运动案件”，即在政治运动而发生，并得到处理的案件，不仅跟平时的类似案件不同，即使跟那些在运动而发生，但在运动结束后定性处理的案件也大不一样。在所谓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特殊政治运动的惯性操作中，运动后结案和运动中的处理，结果往往大不相同。运动中骇人听闻的事件，往往到了结束后的清理阶段，即使没有从大象变成老鼠，也大抵会瘦身一半。三反运动当然也不例外，许多运动中交待贪污了成吨黄金的“大老虎”，最后核实，可能连一钱都没有。

三反运动是以1951年11月20日，毛泽东转发东北局11月1日的报告，要求在全党开展三反运动为起点的。刘青山张子善事件，则在运动开始后一周左右，就东窗事发。华北局上报中央的日子，是11月29日。第二天，毛泽东即批示严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52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也就是说，此案的发生和处理，均在运动的初期。稍微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习惯于采用运动进行政治运作的毛泽东，在运动初起之时，总是力求让运动升温，再升温。他此时最担心的，是“群众积极性”起不来。为此，即使出现大量的过火行为，也在所不惜。三反运动当然也是如此，毛泽东作为运动的发动和推动者，不断地利用转发报告（形成各地攀比的局

面），严词督责和直接干预等方式加压，促使运动升温。据当时作为运动的领导机构的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负责人薄一波回忆，毛泽东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他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42页）。薄一波还特别提到，1951年12月30日毛接到中南军区的电报后，觉得他们的动作稍缓，“即于元旦凌晨两点起草复电，要求他们对运动要‘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并对来电不妥之处作了修改，派专人连夜乘专机将修改稿送到，以引起中南军区的高度重视”（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47页。此事，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里，也有叙述，不过，那里说的是毛派专人给中南军区负责人谭政送的是一封信。见《毛泽东传1949—1976》，第209—21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其实，大多数政治运动的过火行为，都直接来源于发动者。比如硬性规定各地的运动抓人、捕人甚至杀人指标（镇反运动），各地想不过火都难。

我们再看刘青山张子善的案情。据运动中华北局的报告，刘张二人最大罪行有二，一是挪用二百亿左右，用于机关生产；二是二人私用四五亿元，并向上下级及亲友送礼达一亿三千万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529页）。人民币新币跟旧币比值是1：10000，也就是说，刘张二人的问题是，挪用200万，贪污6万左右。问题是，当时所谓的挪用，并非像今天的贪污犯一样，挪用公款去炒股投机，而是去做机关生产。机关生产，是中共在战争时期传下来的一种积习。那时中共没有统一的后勤供应，各个根据地各显神通，自己做自己的。本事大，人员待遇就好，本事小，待遇就差。这种机关生产，原本就是无法无天的，怎么能搞到钱和物资，就怎么做。当然，中共



夺取政权之后,成了当家人,这种游击习气的做法,是不应该再有了。但是,长期形成的积习,一时半会儿,是改不了的。实际上,机关生产很多地方都在搞,当时中国的计划经济体系还没有确立,社会上还是半个市场经济,搞机关生产,大有机会。实际上所有的机关,机关工作人员,都有动力。单单拿刘张问罪,似乎并不公平。至于所谓的私用,当时其实很难界定。可以肯定,从案件的前后叙述看,刘张二人并没有把钱带回家去。作为一个地方的负责人,一个标准的“公家人”,怎样开销这些钱才叫私用,真的不好说。所以,后来出的《毛泽东传》上,再提及此事,私用一项就消失了,只是笼统地说贪污挪用公款约二百亿元(《毛泽东传 1949—1976》上册,第 217 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也就是当年华北局认定的第一项罪名,挪用二百亿公款。

以今天的标准,即使五六万元被一个地委书记和一个专员放进了自家的口袋,挪用,也切实无误,也只能算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案子。以他们的级别,多半是不会被起诉的。显然,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比照当年,当年这样大金额的案子,的确不算小了。但问题是,这一切都是在运动中发生的。以运动的方式取证,以运动的方式批判,以运动的方式让当事人认罪,最后,也是以运动的方式定案处理,两人丢了性命。凡是经过运动的人不能不怀疑,这样的操作,可信吗?

10 年前,央视开拍一部共和国史的记录片,我也参与了一点工作。当拍到这个很给共和国添彩的案件时,发现在河北档案馆里,根本找不到刘张二人的逮捕证。询问当事人才知道,当时根本就没有逮捕证。当时,甚至连一部相关的法律都没有。民国的《六法全书》已经被废除,而年轻的共和国,则连一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没有。当然,最令人生疑的,是案件取证和确证的方式。中共建国以来历次“整人”的政治运动,取证和确证,都是群众运动式的,三反当然也不例外。为使运动快一点火起来,毛泽东曾经提出过“大胆怀疑”的方针(这个提法,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中,都没有查到,但在某些地方三反史料中,有这样记载。参见《“三反”、“五反”运动》江苏卷,第 131、132 页。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3)。他所特别推崇的解放军六十六军的典

型经验里,指导思想就是“大胆怀疑,追加预算”的八字方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 197 页)。在三反中,要求各级干部“人人下水洗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 95 页)。对五反的打击面也是惟恐不宽。解放军总政治部 1952 年 1 月 14 日,针对西南军区的一份运动简报有个避免斗争扩大化的批示,由于简报里说,有的单位几乎百分之百的人员有大小不同的贪污行为,因此总政要求避免把一般性的公私不分都说成是贪污。但毛泽东看了后认为这个批示不妥,在他看来,当时运动的“偏向”是右,而不是左(《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 64 页)。这种宁左勿右的运动操作,做出的案子,是没法让人信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刘张的案子,无非是毛泽东为了让运动升温火起来,而借他俩的人头的一点权力技术和操作。他效果很好,杀了这两个人,让运动达到了沸点。运动过后,由于反腐败的道德正当性,以及毛泽东亲自过问批示的结果,甄别和纠正实际上都谈不上。于是,这个案子,就成了反腐败的一个经久不衰的符号。

不用说,反腐败无疑是应该的,也是任何一个政权都必须做的事情。但像刘青山张子善案件一样,以运动非法制的方式反腐败,却是有害的,至少是弊大于利的。从根本上讲,没有完善的民主和法制,腐败是反不了的。运动式的整肃,杀鸡吓猴,也许可以一时让人心很振奋,让人们感到很解气。但是,从长远看,却是对国家政治秩序的破坏,阻碍了中国进入法制时代的步伐。更可悲的是,如果我们今天还津津乐道当年的“壮举”,说什么“杀了两个人,管了 20 年”,对此没有丝毫的反思,那么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还是有可能一次次被违法的反腐败壮举所打断。腐败,只能越反越多,越反,腐败的规模越大。

(作者为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 李晨)

## 本刊声明

为保护本刊和作者权益,凡转载本刊文章,请注明“转自《炎黄春秋》”。

## 公告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请将联系地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肖林 电话:010-68525374

# 我参与了抢救胡耀邦

● 王敏清

《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刊登《凭空编造荒诞无稽——评师东兵的几本书》一文（作者为胡耀邦的秘书高勇），写到如何抢救胡耀邦时，有以下叙述：

八、请再看看师东兵是怎样写抢救胡耀邦的。他在第401页写到胡耀邦在中南海怀仁堂突发心脏病被抢救时，他写道：“一位医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锡盒子，倒出两粒药片，就要往胡耀邦嘴里送。‘等等！’赵紫阳走过来，接过那盒药，看了看商标，问‘什么药？’医生说：‘硝酸甘油片，治疗心脏病的特效药。



先让他服下缓解下来后，再作进一步医治。’赵紫阳点点头，把药还给医生。那位医生服侍胡耀邦把药吞下去，接着又给他喂了点水。……接着又昏了过去。‘再不要耽搁了，赶快送医院抢救！’赵紫阳看到这样情景，生怕再出意外，急忙给守在身旁的医生和护士下令。在场的医生、护士和一些政治局委员，七手八脚地把胡耀邦抬上救护车。然后赵紫阳等人目送救护车，看着它缓缓出了中南海……”

坐下。”这时胡耀邦旁边的秦基伟扶他在原位坐下。“快叫医生！”周围的同志们说。怀仁堂的多部电话机同时拨通，三部警卫车同时开动，以最快的速度去接医生。这时，胡耀邦双眼紧闭，已经不能说话。大家万分着急，慌乱中有人问了一句：“谁带了保险盒？”恰好江泽民随身带了，就给胡耀邦口服了硝酸甘油片，嗅了亚硝酸异戊脂。后来，医生认为这一措施对舒张血管，争取时间起了很好的作用。

阅读上文后，极为诧异。不禁使我想起网上另一篇题为《胡耀邦最后的瞬间》的文章来，为节省篇幅，只摘录此文其中的两段：

……工作人员宣读决定草案一共念了40分钟。接着，李铁映发言，向大家介绍这个决定草案的起草修改经过。这时，胡耀邦站起来说：“我胸闷，难受。”他边说边想迈步离开会场。同志们见他脸色苍白，额头渗出汗珠，知道他生病了。时值9时48分。“是不是心脏病啊？千万不要动，赶快

为了抢救胡耀邦，北京医院的主任医师、主治医师，北京阜外医院、协和医院的心血管病专家们也很快被接来了。专家们经过会诊，确定胡耀邦患的是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合并心源性休克及心率失常、阵发性心房扑动、房室传导障碍。经他们全力抢救，胡耀邦的病情稍有稳定。下午4点20分，专家们认为胡耀邦病情初步稳定下来，可以上救护车，经同家属商量，将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

以上两文写得如此活灵活现，似乎作者在现场一样，局外人真无可挑剔。但却让我着实感到莫名其妙。我当时是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局局长、内科主任医师，又是第一时间到达中南海现场的当事人，并处理了抢救胡耀邦的全过程，直到把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病房。怎么对以上所述却全然不晓呢？

在此，我实在有必要把抢救胡耀邦的所见所为记述如下，以正视听：

1989年4月8日中午12点15分，我正在办公室吃午饭，突然接到中南海打来的电话，说：

“胡耀邦病倒在怀仁堂。”我放下碗筷,立即乘车直奔中南海。途中,我用车载电话与北京医院等单位紧急联系着。

当我赶到中南海怀仁堂时,北京医院急救车已赶到了现场。心脏病专家钱贻简主任等医护人员正在紧张地抢救:检测心电图、吸氧、输液、注射急救药剂……胡耀邦躺在怀仁堂的后大厅内,闭着双眼,表情痛苦。

心电图显示:急性心肌梗塞。钱贻简主任依据心电图和临床症状,告诉胡耀邦说:“您患的是心脏病,需要安静。”

胡耀邦听后不以为然,他自信地对我说:“我不是心脏病。我胃痛,是胃病。”

心肌梗塞的疼痛有多种表现形式,不典型者往往表现为心脏以外部位疼痛,如胃痛、后背部疼痛、肩胛痛,甚至有出现牙痛者。胡耀邦不是医生,说“胃痛”,也是实话,我十分理解。但是,我更了解胡耀邦的个性:正直、刚强、疾恶如仇、克己奉公,他经常不知疲劳地连续工作。

此时,我若不将病情如实告他,不引起他的重视与配合,后果是严重的。于是我严肃地对他说:“您确实是心脏病,是心肌梗塞,而且很重!需要住院。”

我一反常态的语句,似乎还有点命令的口气,使半睁着眼睛的胡耀邦为之一震,他感到了问题的严重。

片刻后,胡耀邦问我:“住哪个医院?”这说明他同意了医生的诊断,也答应了住院。我肯定地回答说:“要住,就住北京医院。”

北京医院自1949年以来,一直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基地。况且,今天前来抢救的医护人员都是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更何况急性心肌梗塞病人不宜多搬动,因此不宜再更换其他医院。

胡耀邦听罢未做声,又闭上了眼睛,显然是默许了。

我接着说:“现在您需要安静休息,待血压和病情好转后,再送您去医院。”

下午4时许,胡耀邦的血压与病情稍有好转,我和钱主任等医院抢救人员一起将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北楼402病房。待我把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已是晚上7点了。

由此看来,上述两文所写,都是子虚乌有地编造,太荒诞、太离奇了!

请问上述第一文中提到的师东兵:①“一位医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锡盒子”,是哪位医生?②赵紫阳能指点胡耀邦的抢救吗?又竟能“还生怕再出意外,急忙给守在身旁的医生和护士下令”。这里的“医生和护士”是谁?③“……接着又昏了过去”,胡耀邦始终就没有“昏了过去”!谁能证实胡耀邦昏了过去?④所写“七手八脚地把胡耀邦抬上救护车”,急性心肌梗塞,还敢“七手八脚”?⑤抢救现场就没有赵紫阳在,怎能“赵紫阳等人目送救护车,看着它缓缓出了中南海……”呢?

再请问上述第二文作者:①胡耀邦病初,本人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是心脏病,怎能糊里糊涂地服用不是医务人员给的硝酸甘油片,嗅了亚硝酸异戊脂?②“医生认为这一措施对舒张血管,争取时间起了很好的作用”一句中,是哪个“医生”认为的?又起了怎样“很好的作用”?③为了抢救胡耀邦,北京阜外医院、协和医院来了哪个“心血管病专家”?又是哪些“专家们经过会诊,确定胡耀邦患的是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的?④“确定胡耀邦患的是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合并心源性休克及心率失常、阵发性心房扑动、房室传导障碍”中的“合并心源性休克”等四项诊断,是根本就没有的事!可查病历为证。⑤“经同家属商量,将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一句中,到底是谁“同家属商量”的?又是同哪个家属商量的?当时没有一位家属在场,和谁商量?⑥所述胡耀邦9点48分突然生病,但直到12点多才报告保健局、通知北京医院来人急救,这是中央保健医疗史上从未有的事!又有谁敢负这个责?⑦我在做保健工作数十年期间,无数次的重病抢救中,从未见过有高层领导人在抢救现场指挥。而且,两文中所写的领导人,我一个也没见到!难道他们见我来,都撤离了?

无须再费笔墨了,上述二文所谈,都是不在现场者们的胡编臆造!

写历史问题,特别是重大事件,字字句句应实事求是,对历史和后人负责,要经得起社会和历史的考证。绝不可臆造。

(作者系中央保健局原局长)

(责任编辑 李 晨)



# 右派农场的马克思主义学会

• 吴昊

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反右”斗争,全国划了55万多右派。按当时的说法,右派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于是就成立了一些专门改造右派的农场,把右派集中起来劳动改造。最大的当属甘肃酒泉的夹边沟农场,其次就得数河北省静海县的团泊洼农场了。送到团泊洼的右派,主要是来自国家公安部、北京军区、军委直属机关和河北省直属机关的右派,共800多名。当时农场挂的牌子是“河北省干部建设农场”。这块地原属于河北省公安厅第七劳改队。为了安置右派,第七劳改队把四分场腾了出来,一开始右派们住的就是关押劳改犯们的号子。

这800多名右派,除了个别人年纪稍长外,都和我一样,是二十刚出头的年轻人。我们这些人,身强力壮,精力充沛,思想活跃,差不多都有一点辉煌过去,不是反右斗争的重重一锤,个个被打得晕头转向,原来都认为自己是前途无限美好、会有无限作为的。经过1958年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各种各样超强度的、没日没夜的体力劳动,以及1959年以后粮食定量逐渐减少,副食品极度匮乏,我们这800多名壮汉大多数变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浮肿病人。1961年秋收过后,农场提出“劳逸结合”、“休养生息”、“备战来年”。那个冬天,基本上没干什么活,每半月检查一次身体,每一次都要脱得光光的量体重,每个人的体重都在日益减少,农场养的鸭子成群的饿死,养的猪也成群的饿死,茫茫大地,似乎真的走到了尽头。许许多多的事情让人思考,让人忧虑。

农场基本上是与世隔绝的,虽然右派们劳动没有军人押管,但整个农场的大圈是警卫森严的,外面的人进不来,外面的消息也进不来。有些人有收音机,大多束之高阁,一是没时间、没精力听,二是身边的“拐棍们”总有人打小报告,说你偷听敌台,本来就“罪该万死”了,谁还愿再添新的罪过。但身边的事情、自己经历的事情,也让人不得不想:

首先,饿死人的消息不断传到农场,有些右派的家人也被饿死了,附近的农民成群结伙的到农场的打谷场偷粮食,抢粮食……人们非常恐惧,非常不解:既然是“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为什么连肚子也填不饱了,既然到处“莺歌燕舞”,为什么会出现抛妻弃子、背井离乡的悲惨景象;右派分子发配来农场改造,何时是了?劳改犯人们是有期的,劳改右派则是无期的。这样做,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

其次,“大跃进”白热化了,就连静海县团泊村也放出了亩产25万斤水稻的卫星。农场的领导坐不住了,他们跟风鼓劲,也要放个卫星,于是动员全场力量,用竹子和芦苇搭了一个大棚,有一亩大,周围设几盏探照灯,日夜照射,代替阳光,再架上几十个吹风机,保持日夜通风,地上铺了厚厚的化肥,撒了重重的农药,然后把30亩已经怀孕孕穗的稻秧连根带泥拔起来,移栽到大棚里,一棵挤着一棵,一穗挨着一穗,就像当时某些报刊上登的照片,小孩子上去也掉不下来。领导等着放“特大卫星”,并不时有人来参观采访,结果两周过后,移来的稻秧全部腐烂,大棚里臭气熏天,颗粒无收,上演了一出劳民伤财的悲喜剧。农场领导通知我们,此事绝对不准外传,谁传出去谁就是给大跃进“抹

黑”。

再次按照农业生产季节,春耕夏锄,秋收冬藏,自古皆然。但是农场却不然,越是冬天越是要大干快上,干什么呢?深翻地,广积肥。深翻地就是把地表的好土翻下去,把盐碱土翻上来。广积肥就是把割来的芦苇放在中间,周围用冻土块垒起来,然后把芦苇点燃,用烟把土块熏成肥料。按要求,是不许冒烟的,事实上做不到,到了夜晚,大地上到处“坟堆”,到处青烟,到处鬼火,很像古代战场。到了来年,深翻的土地不能种了,熏过的冻土也顶替不了肥料,人们白白的大干了一个冬天。

还有,大修水库。两山之间建坝,把河水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这是建水库的常识,谁都知道的。可是当时的农场领导却叫我们在平地上修水库。1960年元旦过后,全场人背着行李,直奔北大港,要在荒滩上建一座“北大港水库”。先要修一条大堤,当时正是滴水成冰的寒冬季节,连泥、沙、水、冰都分不开,人们只能用泥水结成的冰块垒大坝,白天大干,晚上夜战,午饭吃在工地,人们冻得发抖,几十天过后,大坝倒是垒起来了,但是谁看了谁摇头,总指挥气急败坏地说:“你们是要叫我去坐牢杀头吗!这样的大坝,春天化冻,就成烂泥了。”于是采取补救措施,挖地三尺,取出土来,补修大坝,当时明令:“谁再往大坝上垒冰,谁就是反革命。”这样又折腾了半个月,“水泥”大坝总算修成了,但是到了春天还是变成了一堆烂泥。当然总指挥并没有坐牢杀头。

想当年,参加革命的时候,人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而今却成了这个样子,像牛马一样的干活,吃的却不如猪狗。拉大便的时候,人人都要用手抠,用小木棍往外掏。农场把稻草烘干磨碎,做成窝头,让人们填肚子,吃是吃下去了,就是拉不出来。患有痔疮的人,大便一次,血染一片红,心惊肉跳,真不知道哪一天就把小命“交待”在这广袤的盐碱地上了。死吧,不忍,生吧,太难,于是悲观,悔恨,绝望,无奈,而每天听到的却是令人不解的空话,套话,大话,假话,废话。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是我们错了呢?还是时代的大船抛锚了?难道人就该这样活着吗?难道这就是党的正确路线吗?难道这就是社会主义吗?国家的光明在哪里?个人的前途

在哪里?一大堆问题令人不解,人们在无奈、无助、无望的情况下,又重新拿起了书本,想在马列主义原著中寻找答案,有些人三三两两地秘密交谈,也有些人酝酿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组织,必要时给台上的执政者献计献策。

1963年1月23日,一个北风呼啸、天气寒冷的日子。上午,场部宣布,今天不出工了,开全场大会。各队各组清点人数,排队入场。主持会议的人,首先宣布会场纪律:不许交头接耳,不许乱说乱动,不许离开会场,不许记笔记。管理干部们如临大敌,除了台上坐的,都分散在会场四周,他们的手始终插在裤袋里,似乎是随时准备掏“家伙”。会场的外面,还可以隐约看到端着枪的战士对会场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右派们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死一般的静寂,死一般的沉默,主持会议的人大声宣布:今天的大会是宣布我场破获了一个反革命集团,这个集团的名称叫“马克思主义学会”,集团的首要分子有杨茁、郝应麟、高锡太……现在我宣布对他们实行逮捕。接着几个战士把一些人用绳子捆了起来,扔在了事先准备好的卡车上。我的脑子“嗡”的一下大了起来,听得见自己心脏“扑通,扑通”地跳,台上的人后来说了些什么,记不准确了,好像是说,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现行的反革命事件,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你们大家每个人都要写出交待材料,你是不是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你和反革命集团是什么关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坚持与人民为敌,死路一条。什么时候散的会,怎么散的会,怎么回的住处,都不知道了。我当时是一个组的组长,队长第二天对我说,他们(指马克思主义学会)的发展对象有你,你要好好交待,想想你自己的问题。不知为什么,听了他的话,我倒反而镇静了,因为我没有参加过什么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会”的事确实与我无关。

在以后的日子里,就是没完没了的开会,写交待材料,今天这个被隔离了,明天那个被监管了。以后又查出了新的反革命组织,一个叫方季安的同志,原是张家口某军校的教官,身体通电自杀了。再以后,又有万正东、钱广柱、李全兴、李少一、朱炳宣、卢志文、陈道沛、徐书麟、崔子恒等人被捕入狱,李由中、李端方、张肆少等人被开除公职(对右派的处理大部分是保留公职的),送大



“难友”杨佑民(左)和姚振华

苏庄农场劳动教养；杨佑民等人被开除公职，限制行动自由，准备入狱。在十分恐怖的气氛中，人们提心吊胆，不知什么时候灾难就要降临到自己头上。

但是，这些反革命集团，这些被捕、被劳教、被开除公职的反革命分子，到底有些什么反革命行为？他们为什么是反革命？他们犯的是什么法？却从来没有公布过。平反后，查看这些人的档案，也没有一条符合法律规定的反革命罪行。随着平反冤假错案，右派改正，当年的反革命组织、反革命分子全部宣布为子虚乌有，活着的从监狱和劳改队放出来以后，他们又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党和人民工作了二三十年，有的人还当了相当大的官。而杨茁——这个被人十分尊敬的长者（我们当时都是二十几岁的小青年，他已是四五十岁的长者了）病死狱中，郝应麟、万正东、高锡太、钱广柱等，这些铁铮铮的硬汉子，分别在不同的狱中被处决，罪名好像是组织越狱，不服管教，现行反革命等。1978年，在宣布“改正”他们的右派结论时，也为他们的冤案平反，他们都被宣布恢复军籍、党籍、行政级别，但所有这一切，只能安慰他们的在天之灵了！这些人大部是军人，多数在朝鲜打过仗，立过战功，即使是在“改造”过程中，也都是好样的，他们劳动积极，心怀坦荡，想早一天回到人民的队伍，他们关心时局，读马列的书，想为我们的党、为我们的国家献言献策。他们始终在实践自己当年的誓言：“要为真理而斗争！”

在这里我想说一下钱广柱，我们都来自河北省省直机关，一去农场就分在一个组，他小我一岁，称我“吴兄”，我叫他“四郎”：他的上唇胡须较重，有点像日本人，不知是受了电影还是书籍的影响，我戏称他“钱广助四郎”，简称“四郎”。他高中毕业，没上大学就参加革命了。他的歌唱得很好，嗓子粗犷、浑厚、深沉，典型的男中音。我爱听他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共青团员之歌》和《解放区的天》，后来我们不在一个组了，但见了面，也总有说不完的话。他生性梗直，为人正派，心地善良，组里有人体力差，劳动完不成定额，他常主动去帮他们；两个人抬大筐，他总是把绳子往自己一边拉一点。他说他家里很穷，只有父母。他入狱以后，我就断想他肯定是回不来了，因为他是桑木扁担——宁折不弯，他不会屈服，不会奉承，更不会谄媚，监狱的管教人员最不喜欢的就是他这样的人，也最不屑一顾他这样的人。据说他被处死的罪名是“组织越狱”，我想这是不可能的，而不服从管教，和狱吏们争长道短，肯定是有的。但他有理性、有知识，不会干非法、非分的事情。宣布右派改正的时候，对他的入狱被杀也同时宣布平反，组织上去他的家乡宣布此事，他的父母早就不在人世了，邻里们好像也没有几个知道他这个人。想去凭吊他，如今连尸埋何处也不知道，留在我的记忆中的，只有那飘荡在浩渺的独流碱河上的歌声。“四郎！魂归何处？”

后来人们回忆，成立“马克思主义学会”，当时确有人在个别“知音”中进行过串联，宣布他们是反革命组织时，说他们的“纲领”是：“认真学习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和分析批判能力。”“争取民主权利，争取言论自由。”“像我们仰慕的前辈那样，在劳役中探求真理，充实自己，准备为社会主义事业，为祖国的强大和人民的幸福做出应有的贡献。”农场的领导们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和党对着干的，都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他们犯的是“现行反革命罪”。

他们的学习成果，心得，笔记，大多没有保留



下来。只有杨佑民留下的两条文革时期的学习心得，曾在改正后的洼地难友中传阅。

杨佑民，湖北省武汉市人。1951年，17岁，从武汉第二中学参加军干校，1952年入朝参战，历任报务员、电台台长，1955年授少尉军衔，1956年入党，1957年回国，划右派。在农场时，涉嫌“反革命集团”、“马克思主义学会”，被开除公职，每月发20元生活费，场里通知他“准备入狱”。他的两条“心得笔记”能够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多亏了同组的姚振华。姚原也是军人，老家四川省巴中县。杨佑民被宣布“准备入狱”后，把两条“心得”交给了姚振华，姚为了让将来的历史证明他们是无罪的，就把这两条“心得”缝在了自己的被子里，以后，姚振华因为交代和杨佑民的“关系”，多次挨整，多次被打得遍体鳞伤，但是他始终没有背叛杨佑民的嘱托，把这两条心得笔记完整地保存了下来。现在就让我们来读一读这两条心得笔记吧。

其一：

……学习班提供了认识当前社会实际的直接体验，非常有益。边看戏，边思考，对社会生活现状的理解深刻多了。用一句话概括：空洞的教条造成了思维的伪诞，思维的伪诞神化了空洞的教条。出于种种需要，人们把毛泽东思想割裂成教条，引用它，赞颂它，神话它的威力与效验，假话——伪诞思维说得越真、越好，越能投机，这是社会生活中普遍扮演的悲剧，也是喜剧、滑稽戏。台上台下，双重人格，两重心理，这要算是当前绝大多数人面临的精神苦闷与危机。除过社会上那些可怜的青年人而外。

可笑的是，万灵药到处可用，降神术到处搬，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早就指出过这种贫困哲学的恶果：“根据一个老早就为大家所熟知的辩证法规律，错误的思想一旦贯彻到底，就必然会走到和他的出发点恰恰相反的地方去。所以经验论轻视辩证法便收到这样的惩罚：连某些最清醒的经验论者也陷入了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现代唯灵论中去了。”这是何等精辟的见解，用它来观察今天的现实生活，能看不出这种现代迷信的虚伪与荒唐吗？

……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这个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在今天被颠倒了，而实际却是徒劳的。理论上的批判需要大块文章，事实却到处都存在。人们十七年的社会存在，整个国家十七年的社会存在是什么？罪与罚，冤与直，真与伪，人们看得清，受得深，说得出，可不得不在意识决定存在上做文章、说假话，为什么？多数人出于无奈，少数人为了超生。而当局可以拿“出色的谎言”请功邀赏，……总有一天，事实要说话的。说出它本身所包含的真理，说出它的血与泪，爱与憎。……从人民与国家的命运着眼，我不希望用刀枪说出真理，然而这要历史本身的机缘和目前这种矛盾发展的状况来决定。

1969年残冬

其二：

……的确，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并不需要什么非凡的阅历，也能洞察社会弊端。只要他的理性良知没有泯灭，只要他不浑浑噩噩混世的话，从普通老百姓到身经百战的统帅和工人出身的老布尔什维克之间，既无联系，且地位悬殊，但在人民疾苦、党和国家的盛衰这些大是大非面前，都有共同的忧愤，都难以保持缄默。或议论于基层，或上书于当朝，或慷慨呈词面斥群奸，不畏淫威，拂袖而去。他们视安富尊荣如同蔽履，甘为真理而遭贬囚禁，这种浩然正气表现了我们民族的伟大坚强，它一定会使更多的人沉思奋起。杀害、监禁、苦役，只能说明他们的卑鄙、恐惧，像蝙蝠一样，害怕真理的阳光。而这种法西斯暴行绝对阻止不了他们的灭亡命运。……这吃人的筵席一定会被掀翻，这些虐人害物的豺狼一定会被人民扫荡干净。……

正如伟大导师马克思曾经召唤的那样：“如果人们是由感性世界和由此世界得来的经验中吸取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么，因此就应当那样地安排周围的世界，让人们从这个世界中认识真正人的东西，让他们在这个世界中，习惯于在自己身上培养出人的本性。……如果人的性格舒畅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应该使环境成为人的！”

我们的共产党，我们党的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理论和千百万人的斗争实践，必然导致这一充满人性的光辉理想实现。决不是像今天这样你杀我砍、争权夺利、灭绝人性、煽动兽性的丑恶社会。今天的现实生活与马克思所阐明的共产主义

理想毫无共同之处,只能是对她的亵渎。

……假如,一场伟大的斗争发出召唤,我们会自觉的投身其中,为共产主义的纯洁,决不会吝惜为她保存的热血和生命。……他们可以利用各种手段对我们进行迫害和剥夺,而我们的生活道路却永远不会屈从于他们的意志。

……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变革、认识发展的决定因素。而现在他们像害怕邪术一样不敢提及。相反地极力强调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中国的变革是不可避免的,目前的倒行逆施只能会从反面促使它加快到来,而绝不可能阻止它的暴发。至于暴发将采取何种形式,则以历史发展的机缘来决定。对外战争打不起来,一是别人不干,二是他们不敢。目前这种喊叫不过是为了向人民进攻的需要。内战倒是可能的,只要太上皇寿终,文争武斗必起。多乱可以兴邦,真理一定会胜利,暴风雨所诞生地将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世界。

1970年2月9日

两份缝在被子里,保存到右派改正,保存到宣布“反革命组织”、“反革命分子”都是子虚乌有的学习心得,抄录完了,我一字未动,连标点符号也未动,文中那么多“……”我弄不懂是什么意思,也不便猜想,还是把它们还给历史吧,因为历

史是真实的,历史是需要真实的!

这两份“心得”都是写在“文革”年代的,但确实是出自1963年就被宣布为“马克思主义学会”成员、“反革命分子”杨佑民之手,而且是在宣布他“准备入狱”的日子里。在那个年代,有着同样行为的,如张志新、林昭、遇罗克都被处决了,杨佑民免于死,多亏了四川好汉姚振华,他为此挨了那么多打,受了那么多非人的折磨,今天应该用四川话大声地说:“小姚!值得的!”因为只有这真实的记录才能安慰杨茁、郝应麟、高锡太、万正东、钱广柱等人的在天之灵:你们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你们的英灵应该就在团泊洼的上空!(作者系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国内政治部原主任)

(责任编辑 李晨)

##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稿一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本刊电话:010-68534879

传真: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yanhcq@sina.com

## 按需出版

2004年我公司在国内率先与出版社合作开展按需出版业务。5年来引领行业潮流,已为300多位国内作者出版了学术专著、回忆录、游记、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也为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华人作者出版了著作赠送亲属友人,精美的按需出版图书深受广大作者欢迎,成为品味高雅的礼物和更有价值的纪念。

按需出版是新的数码出版方式,具备四大优点:(1)解决由于印数少而不能出版的难题。(2)即需即印,总是新书,零库存。(3)避免资金一次投入过多印数过多造成浪费。(4)出版周期短,一般在1—2个月。重印在1—2周。

适用范围:个人著作、老辈遗作;书法、绘画、照片、奖状复制;家庭、家族需要保存、传世的专辑、画册;单位或个人旧书翻新重印;单位少量用书。

印数:100册以下最合适。

## 继续征稿(50本起印)

资金投入:自费。以50本(大32开)为例,基本费用200页2000元,300页2800元。如需加增录入排版、装帧设计制作,则共为4000~4500元上下(含2页彩插)。具体价格视稿件形式、种类、字数情况确定。详细报价可电话或信函咨询。

稿件内容文责自负,但需符合我国出版法规。没有书号,不能销售,仅作为留世和赠送。作者享有著作权。

正文纸张:70克胶版纸(黑白)、128克进口铜板纸(彩色)。印刷质量:上乘。

所有出版的图书均事前签订合同。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缘西里小区1号楼1509号,邮编:100192,热线:13521531088陶女士。

电子信箱(Email):173736757@qq.com

北京地区上门服务,送书到家。外地邮寄。

北京文苑文化发展公司

# 毛主席的芒果到瓮安

● 黄育中

四十年前,我们贵州人没有见过芒果,更未吃过芒果,它在我们的意识中只不过是一种遥远陌生的外国水果而已。可就在一夜之间,芒果却成了名副其实的圣果。

1968年夏,“文化大革命”经过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及“造反派”互相反复夺权,全国陷入了两派严重对立阶段,武斗步步升级,为了控制混乱局面,毛泽东主席向全国所有单位派出了“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工宣队”实际上到各单位掌控运动。

据说,正当“工宣队”进驻各单位之时,不知是哪一位外国友人赠送毛主席一批芒果,毛主席舍不得吃,却把它转赠给了首都北京的“工宣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一亲切关怀,令首都北京的“工宣队”感激万分。

对这种恩赐,首都的“工宣队”不敢独享,又把那批芒果分赠给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工宣队”。各省、市、自治区的“工宣队”对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恩泽,自然要使其被及各地、州、市。但是,给贵州芒果的数量已经少到不可能分给各地、州、市一个的地步,于是省里将芒果制成仿真的蜡芒果,给每个地、州、市各送去一个。各地、州、市的“工宣队”当然知道赠送芒果的重大意义,要把毛主席的恩情迅速往下传,但地、州已无复制蜡芒果的本事和能力,只得将蜡芒果摄成照片送到所辖各县、市。

瓮安是1967年3月19日由“左派”率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1968年6月12日,贵州省革委和黔南州革委、“工宣队”支持在野“造反派”进行反夺权,受压者一下子变成了掌权者;而原先的掌权派一下子又变成了在野派。无论哪一派都声称自己最忠于毛主席,都攻

击对方“反毛泽东思想”,都认为只有自己才有权接受赐予的芒果。

黔南州“工宣队”从都匀送芒果到瓮安的那天,县里的两派各组织了数千人齐集县体育场。事前,双方都作了一些准备,除国旗、战斗队队旗、巨幅毛主席像外,得力干将们还扛着棍棒、锄柄等武斗器械,有的还在锄柄的较粗那一端钉上若干铁钉,好像《水浒》中霹雳火秦明使用的“狼牙棒”似的。

在野派没有行政权,乃采取先行一步的办法,趁掌权派队伍尾大不掉之机,迅速抄近路往南去接芒果。他们代表不了县革委,州“工宣队”当然不能将芒果予之,结果无功而返。他们返回途中在县城南三公里处的富水田一带与掌权派的大队人马遭遇,双方剑拔弩张,杀气腾腾,一场武斗眼看就要爆发。但双方都是以多人抬着的两米多高的巨幅毛主席像为先导,“毛主席”成了各自队伍的前锋,谁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冲撞毛主席像,谁也不敢当着“钦差”的面,承担“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

州里护送芒果的“钦差”当然只认“县革委”,掌权一方自然接到了芒果,县革委主任把芒果接到手里,我们立即簇拥而上,既是护卫,又是抢先上前感受毛主席的恩情与光辉。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张由精致相框嵌着的芒果照片。

掌权派要在县体育场开一个隆重的迎接芒果的大会。主席台的唯一桌子上供着那张芒果照片,两排长椅八字形分摆于主席台的两边,当时县革委的头目们分坐其上。大会还未开始,一在野派的干将跃上主席台来抢夺芒果照片。我当时也属掌权派干将,在主席台上做记录服务,见势不妙,眼明手快,趁他尚未站稳脚跟,便一个箭步



冲上前去,将他从主席台上推跌下去。会场出现骚动,双方就要开打起来,好在我方人多势众,头头们也不想围打对方扩大事端,但大会也不敢再开了,数千人簇拥着“芒果”匆匆回到“县革委”所在的原县政府大楼里。

当晚,我们组织人到照相馆监督,要照相馆将芒果照片翻拍放大,冲洗出48张,又组织七八个木匠连夜赶制48个相框;县革委又组织大小头目分带48组“工宣队”,第二天将再翻拍的模糊不清灰蒙蒙的芒果照片分送到全县48个公社(相当于乡)去,让毛主席的恩情惠及全县的每一个角落。

我带领一组“工宣队”护着一张芒果照片去草圪区太平公社。太平公社的社员(农民)居然也是两派,在太平公社管委会门口分站两堆,怒目

相视,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等口号,都声称自己最忠于毛主席,最有权得到毛主席的恩赐。好在农民离“权”的距离更远,也并未真要为这张照片而打起来。我们说了些“贫下中农是一家”、“要一碗水端平”之类的安抚话,事态就平息下去了。

四十年过去了,我们参与接送“芒果”的人,有的已经作古,活着的也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面对世人,面对子孙后代,我们感到羞愧。过去的一切,都已成为历史。赐芒果这样的花絮,写史书的是不会将其写进去的,但那确实是历史,是中国,是中华民族的当代史。

(作者系原贵州省瓮安县城关小学教师)

(责任编辑 李 晨)

新书推荐

## 走出个人崇拜

### ——一个年代的反思



人类的蒙昧时代,由于无法理解和无力应付某些自然现象的侵害,在恐惧中希望得到神奇力量的庇护,从而产生了最初的神的信仰与崇拜。进入阶级社会,多数人的命运掌握在极少数主宰者手中,于是,人们又把主宰自己命运的人视为“神”。一位革命导师说:“神的观念永远是奴隶状况(最坏的、没有出路的奴隶状况)的观念。”

值得深思的是,在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无产阶级革命中,也曾出现与自身使命极不和谐的造神运动。神化领袖,搞个人崇拜,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种重要现象,曾经先后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中浮现,并且几度泛滥成灾。如苏联20世纪30—50年代兴起的个人崇拜,导致肃反扩大化的灾难降临。中国60—70年代的个人崇拜狂潮,伴随着十年“文革”的悲剧发生。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总结“文革”历史教训中,人们从噩梦中醒来,纷纷走出个人崇拜的迷雾,同时也把领袖人物从神坛请到人间。“领袖是人不是神”,“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响彻云霄振聋发聩的口号,其作用不亚于五四时代的“民主与科学”。

个人崇拜是高度集权领导体制的历史产物,从政治本质上说,就是对个人手中权力的崇拜。一个很长的时期中,不管是苏联还是中国,都曾受“权力崇拜”思潮的影响,所谓有了政权就有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在考虑社会主义前途的问题上,片面强调维护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而忽略了发展经济和扩大民主生活、建立和健全法制。在这种认识下,领袖作为政党和政权的代表,自然就被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变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偶像。这一做法,甚至不及封建社会的“民本”思想,孟子尚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垮台与我国“文化大革命”的破产表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必须真真正正把人民群众当“上帝”,老老实实地做“人民的勤务员”,才能永葆青春。关系颠倒了,就会变成脱离大地的安泰。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种类型的领袖,一种为注重个人权力与权威的“铁腕人物”,一种是更善于运用人格魅力与发扬民主精神的“平民式”领袖。随着世界民主潮流向更广更深度地发展,“铁腕”类型的领袖人物,逐渐成为历史,“平民式”的领袖人物,将更为时代所需要,群众所欢迎。

本书对昔日政坛上的领袖人物们,做出新的考察和反思。

(价格及汇款地址见本刊第47页)

# 在中国上学插队的美国人

· 韩秀

什么事情都有着一些缘由,说到上山下乡,就不能不说到更早些的故事。想想也真是感慨得很,从1982年开始写作,在台湾和美国已经出了将近三十本书,写到作者简介,长长的这一段故事总是被省略掉了,生活在台湾的人们不必懂得“上山下乡”这个词儿是个什么意思,那只是一方面的原因。结果就是,这些被湮没了的岁月竟然被深深地藏进了心底。

我的父亲是一位美国的军人,他在1943年到1945年这一段时间里,担任美国驻华使馆的陆军武官。那时候国民政府设立在陪都重庆,美国大使馆自然也设在重庆,父亲在重庆住了两年,担任的工作是负责滇缅边境的通畅。边境通畅,支持中国抵抗日本的战略物资才能源源不绝地运到中国的大后方。所以,说到底儿,我的父亲,在中国期间所做的事情是真正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战事业。父亲在重庆也认识了我的母亲。1945年,日本投降,二次大战结束,我的父亲带着我的母亲离开了中国,返回美国纽约。所以,1946年,我出生在曼哈顿。而我的父亲,从此以后也就没有任何机会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这样的一段故事,自然不能见容于1949年之后的新政权,中美关系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是敌对而紧张的,父亲不但是军人,而且与1949年之前的国民政府密切合作。他在新政权眼睛里无疑是“敌人”。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驻节新西兰,他奔回曼哈顿,看到了我,然后返回工作岗位。我却在一岁半的时候被我母亲交给一对美国青年,搭乘一艘美国军舰,漂洋过海来到了政权更替中的中国。在上海接船的,是我的外祖母,还有一位便是外婆的远亲赵清阁女士。当我1978年重回美国之后,我才知道,我是在父亲不知情的情形下被送走的,父亲听说他唯一的女儿被送走的消息赶回华盛顿的时候,我已经抵达上海。父亲1968年过世,在我的一生中,我与他竟然只有出生时的那一面之缘,那是深深的无法言表的伤痛,永远无法愈合。

外婆无锡人,出身富裕的大家庭。1937年外公去世后,外婆便考进国民政府的统计部做了一位公务员。政权易帜,外婆为了等我而失去了南迁的机会。她深深了解如若住在南京,恐怕很不安全,所以索性来到北京,在米市大街一个小三合院安安静静地住了下来。我在婴儿时期,乳娘是一位日本妇人,所以我开口学话便是日文,在船上与那对善良的美国夫妇在一起,只有英文,丢掉了日文。与外婆在一起,讲了一口无锡话,丢了英文。到了北京,学了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听得懂无锡话、上海话,却说不利落了。后来,住过无数地方,学习过各种不同的语言,北京话却跟了我一辈子,无论如何,难舍难分。

外婆是一位极聪慧的女子,她深深知道她是我唯一的倚靠,保护好她自己就是保护了我,所以,她留在了家里,修缮珍本书。那时候,许多人仓皇离去,许多的珍本书流落街头,中国书店用麻袋送来残卷,外婆将它们整理成一套套的线装书。这首先需要懂得断句,然后需要修补书籍的工具与技巧。现在,正流行德国作家冯克的一部书,叫做《墨水心》,里面有一位书籍装帧师莫提玛,当他把一卷修书工具打开的时候,我就想到外婆那一卷工具,一个缝得结结实实的青布卷囊,除了大小不一的各式刀剪之外,还有许多厚薄不一的竹片,它们被磨得温润无比。外婆告诉我,她从小就跟着母亲修补旧书,那是一项传了若干代的技艺,可以追溯到上百年前。她手里的这套工具还是她出嫁的时候母亲给她压在箱底的呢。我学到了“艺不压身”这样一条人生路途当中应当谨记的道理。我还记得那一架木头做成的订书机,外婆坐在凳子上,订

书机哐当哐当地响着，线绳整齐地穿过修补好了的书页，将它们装订成板板正正的书册。

其中的一些书在交还给中国书店之前，是我的课本。我四岁开蒙，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当然，我外婆没有进入任何一个“单位”，1949年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也都没有波及到她。外婆娘家和婆家的亲戚们在土改当中都被整肃得七零八落，她却早早就离开无锡的大家族了，靠薪水吃饭，成分便被划为“小土地出租者”，不算太“高”。如此这般，一直到“文革”之前，她都可以生活得比较平静。

讲句老实话，对我来讲，中国古典的文学、哲学实在是一种最为坚强的精神支柱。它们在我最没有指望的日子里让我守住了内心深处的那一块净土，真正非同小可。近些年来，东西写得稍微多些，有人说，这人长了一张西方人的脸，行起事来却是道地的中国人，而且不是现代的中国人，而是古代的中国人。我想，他们之所以一语中的，无非是看到了感觉到了中国古典文化对我的深刻影响。每到这种时候，我都会深深感激外婆当年的睿智。

除了以上所说的这些以外，还有一些际遇，也是很有意思的。我在前面谈到过一位女士赵清阁先生，因为她在戏剧与小说方面的成就，文化圈里的人们都尊称她为“先生”。她是外婆的远亲，我唤她“清阁姨”。她与老舍先生是青年时代的合作者。清阁姨一生未嫁单身住在上海，老舍先生一家人住在北京。50年代中期，我们搬到了干面胡同，学校在灯市口，从灯市西口到乃兹府舒先生家就很近了。我常常穿梭在这一带，有时为舒先生和清阁姨转些信件，这一辈人之间的友谊，深深地感动着我。不但如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也是舒先生的第一“读者”。舒先生讲故事需要一个最好的听众，一个真情流露的听



韩秀高中毕业照

众。他身边有许多人，无论那故事是否好笑，他们都会逢迎地笑。我却不然，我是诚实的，听到好笑的故事，我会笑个不停。听到难过的故事，我会大哭。听到没有意思的故事，我没有反应。舒先生喜欢我，他常说：“这孩子听了会哭会笑的故事，我才会写下来。”那时候，我学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作者将一本书写完，并不等于作品的完成，真正完成这部作品的人是读者。三十年后，我自己成为一个写手，我常常会想到读者，深深了解读者的共鸣是多么的重要。

在外婆的身边虽然有着一些喜欢我的成年人，但是，

在同龄人中间，我却是非常孤单的。我有一张外国人的脸，头发鬈曲，我比同龄女生又都高上一截。更要紧的是，我的父亲可不是与当权者打得火热的西方左派，连孩子们都知道，我的父亲是“美帝”。于是，我被隔到了外边，任何事情都没有我的份儿。我老是被单摆浮搁着，连座位都是单独的，小学、初中、高中，好像都没有同座位的同学，一个人单独的坐在最后一排。

我知道，在这里，我是一个外人，永远是一个外人。这种处境使得我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我比很多同龄人早得多对专制的不民主的不自由的生活有着来自内心深处的强烈的抗拒，对人为的愚昧有着强烈的反感。

“外人”尚不足以形容我少年时代的状况，我还是一个“靶子”。当年的反美情绪多么激烈。但是，美帝远在天边，够不着，眼前这个美帝的后代，收拾起来多么方便！要圆则圆要扁则扁！

我对这个情形有了切身的体会是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八岁。1954年，大约是为了巴拿马运河的事情，“打倒美帝”喊声震天，学校带队到天安门广场，人很多，到处是旗子和标语。不知怎么一来，我就站到了一个圆圈里，这个圈子是用纸做的很难看的美国国旗和被画成漫画的艾森豪威尔头像给堆起来的。口号和歌声



之后,有人点起了火,火很热,有点儿烤得慌。那天天很蓝,蓝天上顿时布满了黑烟,然后便是许多的灰,灰很轻,飘落在我头上、肩膀上、衬衫上。过了不知多久,周围静了下来,人都走了,老师和同学也都走了。我想,他们早就把我忘了。我还站在那儿,一头一脸的灰。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北京市民,骑着一辆唧嘎乱响的自行车儿,在那圈儿外边停住了。他问我:“你知道你家住哪儿吗?”我说:“干面胡同20号。”那时候我才知道我的嘴干得快要张不开了。他又问我:“你会坐自行车儿吗?”我说:“我没坐过。”他把车支住,把我放在后架子上,告诉我说:“车座子底下有两根棍儿,你抓住了,坐好喽。千万别掉下来,你要是掉下来了,我可就没辙啦。”他慢慢地骑着车子,车子还是唧唧嘎嘎地乱响着。到了家门口儿,这位中年人看我推开了院门才离开。

这件事情,让我看到了一个事实,中国的地面儿上,有着好些好些好人。可能,我得和他们一块儿吃苦,一块儿受累,那都不怕的,我们能够互相拉一把,我们能够一块儿挺过去。好多年,我不怎么常常想到那口号声、那些纸灰,我常常想到那个和颜悦色的声音,你坐好喽,千万别掉下来,你要是掉下来了,我可就没辙啦。含着泪水,带着微笑,我想念着那个声音。

这件事情也让我深深地爱上了这面美丽的星条旗。回到美国以后,看到有人莫名其妙地烧自己国家的这面旗帜,会愤怒地站出来,质问人家,人家不懂我何以这么愤怒,我只好告诉他们,你们不知道当你失去这面旗帜的保护的时候,你会遭遇什么。

这件事情让八岁的我草草结束了我的童年,在一天之内变成了大人。我知道,自己随时随地可能变成一个靶子。没有办法摆脱,我必须锻炼自己的忍耐力。

这件事情以后,外婆更加注意我的饮食,她说,你有好长好远好辛苦的路要走,一定要吃好。后来,我更明白必须认真锻炼自己的体力,准备走这好长好远好辛苦的路,于是自觉地锻炼身体。无论刮风下雨,5000米,8000米,在高中北大附中的操场上一圈儿一圈儿地跑着,雷打不动。

我的功课一向是好的,米市大街小学毕业,保送女十二中,初中毕业保送北大附中。1964年

毕业的时候还获得优良奖章。但是,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高潮,农村重新划分阶级成分,城市里“阶级斗争”的弦也绷得很紧。我参加了高考,50位被精选出来的考生集中在一个考场,北大校长陆平在考试之前亲自来到我们的考场,为考生加油打气。他说:“你们是北大附中的尖子,好好儿考,全部进入北大!”但是,这50名学生中只有4名进入大学,其余纷纷落榜,完全是因为“成分”问题。数学老师不识时务跑到招生委员会去打听我落榜的原因,人家将我的卷子丢给他,卷子根本没有看,上面贴了封条,盖了一个章,“此生不宜录取”。数学老师难过得很,倒是我心平气和。我知道,这长长远远的辛苦之路,这就要开始走啦。

等分配工作的当儿,学校找我谈话,是一位党委书记,姓周,她笑眯眯地跟我说:“你写两百个字吧,就写你的父亲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你要永远和他划清界线,和美帝国主义划清界线。你不是挺能写的吗?作文儿不是常得高分儿吗?”我不言语。她又说:“你写了,北大、清华的大门儿就在那儿开着呢。”我问她:“我要是不写呢?”她说:“那你明天就去山西插队落户。”我说:“天不早了,我还得回家收拾行李。”站起来就走了。数学老师急了,在走道儿里拉住我:“你的父亲也好,美国也好,都远在天边地角,你写了,他们也看不见。你不写,可就永远学不了造船啦!”我看着他,当初填志愿,他告诉我,出身不好大连海运学院是不可能录取的,清华的造船系还有可能,所以我填了清华。现在,我清楚知道,中国将少了一个认真负责的造船工程师。这位数学老师一直非常欣赏我,他盼望着我能升学。我只好告诉他:“我不能做对不起自己的事情。”老师没有再说什么,表情却是哀伤的。

我并没有在第二天就奔赴山西,而是被招去开了两天的会,叫做“务虚”。这时候,我才知道,这是北京市第一批集体上山下乡,出主意的人是北京市长。市长是山西人,所以插队地点就选在山西。48个“出身极不好”的学生,来自44所学校。这些学生又都是各校的学习尖子,也就是“白专典型”。当时市里的想法是这样子的,这些学生到了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背叛自己的出身,脱胎换骨,在农村扎下根来,变成新一代的有文化

的农民！这些学生甚至是 24 个女生 24 个男生，就是希望这些学生就这么配成了对，日后就在农村安家、生儿育女，永远地留在农村啦！北京市一位副市长甚至苦口婆心地来到我们中间现身说法，他自己出身大地主，可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经过一番磨炼，他现在不是也成为党的高级干部了吗？大家都静静地听着并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北京市委还派了带队干部和我们一块儿下乡。我和二十几位学生以及一位带队干部来到山西曲沃县林城公社林城大队，另外二十几位则到了侯马公社白店大队。

学生们的年龄都在十八九岁，我只有十七岁。后来，我们林城那位带队干部与一位会唱歌儿的女知青结了婚，有一位男知青娶了一位极为能干的贫农女儿，知青之间论及婚嫁的好像只有两对，但是过了些年，他们也都全部回城了。记忆中有一位女知青早早嫁给了贫下中农协会的主任，她后来有没有回城就不知道了。无论如何，我在林城那三年，男、女学生分别住在集体宿舍，有点儿小内斗，都是些小小不然的鸡毛蒜皮，与我后来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看到的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住在一个挺宽敞的三合院，这地方本来是大队的仓库。北房是女生宿舍，西房是男生宿舍，宿舍里只有一些木板床，行李被褥各自安顿在板床上，箱子放在床头，搁些饭碗之类的零碎东西，脸盆脚盆放在床下，这就是每个知青的那点儿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了。东房是灶间和仓库。开始的一些日子，大队派了一位贫农为我们掌厨。没多久，知青们轮流帮厨，就完全地自力更生了。

大陆作家阎连科在一篇文章中说到，来到他的家乡河南嵩县那些知青如何地游手好闲、如何地吃派饭吃到农民叫苦连天、如何地偷鸡摸狗。这些事情，在我们林城都没有发生过。

虽然十多人住在一间宿舍里，但是高喉咙大嗓子地随意聊天也是不常见的。我的“邻居”姓周，我就纳闷，世界真是那么小吗？难不成她是北大附中那位党委书记的亲戚？询问之下，她果真是那书记的嫡亲妹妹，而且她双眼高度近视，几乎半瞎。劳动中，她根本就在摸索，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赶不上进度。很快，她就进入半劳力的行

列，与生产队的老弱病残在一块儿了。她也不能帮厨，连喂猪也有困难。我一边帮她的忙，一边小心地探问，这样的病弱，怎么不留城呢？她倒是快人快语，直接地告诉我，是她姐姐让她下乡的，姐姐要响应号召，用实际行动支持“上山下乡”这样一个政治运动，至于妹妹的死活当然就不必考虑了。“我家的成分很高，非常高，我姐姐特别积极，我只是一块垫脚石而已。”她笑咪咪的，好像已经做过很多次垫脚石的样子。大约是我脸上的表情带着惊讶，她笑着开导我：“在火车站，你没有听到广播吗？你妈在广播里大谈送独生女儿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那不是拿你当垫脚石吗？”我这才有些明白。后来，我逐渐发现，有不少知青都是被家里人推出来的，他们都充当了家里人追求进步的垫脚石。1977年，我为了回到美国去，与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的工作人员有长时间的非常深入的对话，在我上山下乡这件事情上，“你母亲起了关键的误导作用，她曾经向组织上反映，你需要认真的改造。”这位工作人员非常清晰地告诉了我 13 年前我完全不知情的往事。而且，1976 年，我已经被检查出患有先天性脊椎裂，完全不适合重体力劳动。但是，那时候我已经在山西和新疆劳动了整整 12 年，老伤加新伤，注定了我将与剧烈的疼痛共度余生。

然而，1964 年的我，完全没有任何的对人生的其它的计划，我以为我将终老在这里。有些知青在想法子调到县城、调到省城，甚至回北京。我知道，那都跟我没有关系，我连想都不必去想。我喜欢林城的男男女女，喜欢他们干活的潇洒与帅气，喜欢他们哼唱的晋南小调与戏曲。我想，我能够和他们在一块儿厮守一辈子。

刚下去的时候，正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高潮期间，有许多的批斗会，批斗之余还有游街，最可怜是那些上了年纪的小脚妇女，在街上蹒跚前行，小脚在地上拖出一道道血痕。看得出来，许多农民都是很不忍的，但是，县里派来了工作组，林城的贫协也积极配合，成分高的家庭就受到许多的磨难。但是，这些受到磨难的家庭却是逆来顺受的，随人打骂唾弃，只是低头不语。批斗之后，照样下田劳动，照样干得彪悍，绝不落后。奇怪，这些成分高的人家的劳力全是一等一的好手、快手。好在工作组不久之后就回到县城去了，

运动也就偃旗息鼓了。

没有政治运动的林城是美丽的，虽然地里的活儿相当苦重，我的腰常常痛得好像是断成了两截。带着两手血泡，坐在女社员家的炕头儿上，由着裹着小脚的大娘用一根在烛火上烧过的针穿透血泡，挤出血水，再从一个小瓶子里挖出些油膏涂抹在伤处，我便觉得好多了。年轻的女子们教我用一条家织布裹住手掌，以后，我干起活儿来就更利落了。于是，我有了闲情有了逸致和村里的女青年们相处。她们真是好看，在灯下做针线活的时候，她们的温柔与聪慧更是展露无

遗。要出嫁了，媒人从男方家里拿来婆婆的鞋样，待嫁的女子便精心地做上一双无可挑剔的布鞋。那鞋子简直是艺术品，鞋底纳出花儿来，鞋帮上更是庄重地绣些吉祥的图案。托在手心里，我说：“你那未来的婆婆怎么舍得穿？”女子微笑，淡然说道：“不嫌弃就好了。”她们静静地期盼着将来的幸福。她们不怕辛苦与操劳，只盼望家庭的和美。

来林城之前我连扣子都没有缝过，很快地，我学会了拆洗棉衣、缝缝补补，然后，我学会了做鞋。我请外婆将鞋底放在信纸背面画下来，外婆的脚是半大脚，也就是缠过一下又放开的。这样的脚买不到现成的鞋子，外婆穿的鞋子都是请鞋店做的，前门外的好鞋店总是单鞋棉鞋预备得齐全。文革一起，好鞋店的老传统被打翻在地，老顾客们的鞋样子都被一把火烧光。打那往后，外婆的鞋都是我做的。1983年我从美国到驻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工作，回家看外婆，她老人家脚上还穿着我做的布鞋，很旧了，却还很跟脚。外婆笑眯眯地说：“新鞋没有旧鞋舒服。”那时候，我非常非常想念林城的女子们，满心都是感激。

老实说，林城的人们待我很厚的。也就不到一年吧，他们看我毫无心机地无日无夜地苦干，再加上一口纯正的北京腔，大队梁书记就让我晚



韩秀在新疆

上在广播站给社员们念新闻。白天照样干活晚上加班念新闻，不少知青觉得我傻得可以。1965年推广汉语拼音，在农村展开扫盲运动。我在两天之内熟练了这一套拼音法，不但在“扫盲学习班”教课还主动地“送字上门”。妇女们家务繁重，晚上没法子出门念书，我就走进她们的家，坐在她们的炕头儿上，手把手的教她们；她们对识字这件事的渴望让我感动不已。

在这个亲密的活动里，我又发现了农村女青年对毛衣的热爱，女知青领口袖口露出的鹅黄、粉紫、天蓝每每

吸引着农家少女羡慕的目光，于是在送字上门的同时，我开始教她们织毛衣。没有多久，挑着担子走乡串户的货郎们都知道毛衣针有了市场，曲沃县和侯马市供销合作社的腈纶毛线也销售一空。农家女青年开始走进女知青的宿舍，多半是为了学习新的针法。这是真正的城乡交流，这种交流带来的和乐融融完全超越了阶级成分带来的隔阂，阶级斗争的风雨完全地消失在缤纷的色彩之中。

能够教成人，当然也能教小孩子，这是梁书记的逻辑。1966年初，我开始在林城小学教书，有时候还到邻近的香邑“示范教学”。这种学校要求老师十项全能，因为整个学校只有一位老师，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孩子们都在一个课堂里，叫做“复式教学”，除了语文算术之外，体育、唱歌、图画也都一手包办。学校只在农活不忙的日子开课，农忙时节，老师和孩子们都直奔大田，老师如果干活儿不像样子是无法得到学生的尊敬的。讲老实话，在晋南农村，真正受到人们敬重的都是农村的好把式，游手好闲之徒无论怎样根正苗红都是无济于事的。这样一种经过长年累月建立起来的价值观使得我在林城的生活踏实了许多。外村的亲戚来访，孩子们会骄傲地告诉人家：“咱村的老师是从北京来的！”有一度，乡间横格练习簿



缺货,供销社只有大张白报纸供应,我连夜将纸张裁成练习本大小,拿出我外婆订书的本事,将纸张装订成线装书的模样,内页硬是用铅笔划出整齐的横线。第二天,拿到新的练习簿的学生大为兴奋,甚至主动请缨,在完成课业之后,帮助我制作新的练习簿。后来我发现,许多家长都参加了这个工程,男女老少一笔一划地在白报纸做成的册子里划着整齐的横线。我受到的震动是很大的,农民对他们的子女们寄托着厚望,农民对知识怀着渴求。那时候,我真心地相信,我可以在这里存活,我可以和乡间的孩子们厮守一辈子。而且,我乐意在这里度过一生,我的肤色,我的长相,我的复杂的背景都没有成为农民与我之间的隔阂。

沉醉在快乐之中的日子非常短暂。文革开始了,外婆的家被抄,我父亲的照片等等都被红卫兵拿出去展览。北京市长当年将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放在他家乡的“一揽子计划”更被视为“阴谋”。红卫兵们叫嚣着,要把躲在山西的狼崽子们揪出来!最早听到风声的是劳动模范王德合,我曾经帮他整理过改良玉米品种的实验报告。这时候他还是县长,他找到我,要我“远走高飞”,要我走得“越远越好”。正在县里勘查水力的一位工程师给我提供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建农三师的消息,他的妹妹已经从上海被发配到那里。当时人人自危,县长和工程师都面临被揪出来的命运。王县长给我开了“支边建设”的证明之后,第二天就被勒令靠边站了。梁书记为我开了户口证明之后也马上被剥夺了一切身为基层支部书记的权力。我是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逃离山西的。大家说得很有道理:“留得青山在,先逃出生天再说。你在这里肯定是第一个靶子,武斗高潮无理可讲。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什么都慢半拍,等到他们那边弄清你的来龙去脉武斗高潮兴许已经过去了。先保住小命,其它的,日后再说。”

事实证明,这一切都不是杞人忧天。后来,我在新疆听说,白店一位王姓知青被南下的红卫兵暴打致死,原因似乎是因为他的父亲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对于我的离去,知青们漠然,不表示任何意见,也许他们想到新疆就头皮发麻。乡亲们却都感觉到文革这股风“不善”,都催我赶快动身。随

身的包袱里放着大娘们给我烤的锅盔,我在天寒地冻中上路了。车到大同,我买了另外一张车票,回到了北京。外婆已经被扫地出门,住在一间小屋里,房内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都是从我原来的屋子里搬来的。地中央一个蜂窝煤炉子,烧饭取暖全靠它。我从包袱里掏出锅盔放在炉板上,掏出我为外婆做的一双新布鞋,双手捧到老人面前。泰山压顶面不改色的外婆老泪纵横:“正是念书的岁数,却学着做鞋了。”我笑着跟她说,书是可以自己念的,什么样的高压也挡不住我寻找书籍。

我的双手布满了老茧,我的双臂结实有力。我跟外婆说,山西的乡亲们教会了我求生存的十八般武艺,再苦的环境,我也能够活下去。这个时候,我忽然明白了,今后的一个重大的人生目标就是活下去,绝不把尸体留在戈壁滩上。

1967年初的北京是疯狂的,一片红海洋,一片打倒与砸烂之声。我在外婆身边呆了两天半。外地人来北京三天必须报临时户口,我没有报户口的路条,我只有一纸“支边建设”的证明。我必须快快离去,虽然我对外婆的处境十二分担心。

我踏上了西行的列车,那时候,完全不知道南疆兵团的生活环境是那样的残酷,人际关系是那样的险恶。我甚至无从想象,在林城的那三年竟然是我在中国三十年的生活中“天堂”般的一段岁月。后来,我在暗夜中,曾经那样刻骨地怀想过林城男女老少亲切的笑脸,怀想过在麦香中挥汗如雨的日子。那一段被长时间湮没了的日子。

写于2009年4月11日

美国华府近郊维也纳小镇的春雨中

(本文选自《无声的群落》,发表时略有删节)

韩秀(Teresa Buczacki),出生纽约市,在海峡两岸度过三十余年。目前居住在华府近郊维也纳小镇,读书写作,自由撰稿人。曾任教于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并撰写录制语言语音教材。曾任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国际关系研究院。曾两度担任华府华文作家协会会长。为台北《联合报》《幼狮文艺》《国语日报》《自由时报》、美国《世界周刊》《汉新月刊》等海内外华文报刊撰写20多个专栏。2003年应邀担任台湾佛光大学驻校作家。1996年获第四届万人杰新闻文化奖(纽约),2001年获第四十二届中国文艺协会文艺奖章(台北)。

(责任编辑 李 晨)

# 《无声的群落》最后的古代故事

● 王克明



我刚刚知道,1967年的湘南贫下中农造反派文革大屠杀中,约万名死难者里,有文革前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其中一位叫王百明的知青,因为出身算“反革命”,在街头饭铺里,被他不认识的农民枪杀。行凶前,造反派只说了两句话,一句

是“谁是王百明”,另一句是“打死你这个地主狗崽子”,就抬起枪口,对着王百明的脸扣了扳机。王百明享年22岁。

我在邓鹏主编的《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一书中,读到了这件事。文革前到湖南江永县插队的七千老知青,多是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在那场惨绝人寰的“彻底清除阶级敌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屠杀中,他们经历了饥饿、恐惧、逃亡、追杀,走过了“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制造的人间地狱。

《无声的群落》文集中近90篇文章的作者,都是1964年、1965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这是被遗忘了的一代老知青。远在水统论“血统论”出现之前,他们就早已被血统论政策所伤害。高等院校和高中升学录取时,对“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一刀切”地“不予录取”。唯有上山下乡,他们才可能脱胎换骨,不被歧视。但是,在改造思想的乡村岁月里,阶级斗争的高危压力,如影随形地伴着他们惨淡的青春。后来死于屠杀的王百明,便是因为家庭出身,三次高考落榜。他下乡后小心翼翼,积极表现,力图忠诚,却仍因家庭出身而被屠戮。

文革前全国一百三十万老知青,很多是因出身“剥削阶级”而失去了升学的资格,走上了苦难的脱胎换骨之路。在文革的血腥阶段,他们中很多人成为下乡所在地的专政对象,遭受了折磨。他们

那一代人的上山下乡经历,是一段看不见黎明的苦难长夜。

后来的知青运动有所不同。有最高指示后,上山下乡被大张旗鼓地主旋律化,如阳光普照。经过了文革洗脑的知青,在上山下乡中,眼前的真实可能被信念掩盖,人间的苦难也不成为主题,知青往往会认为自己在踏着主旋律的步调,光荣起舞。以至今日,仍有“青春无悔”的高调,而知识青年的苦难经历,有被重新谱写为主旋律的可能。

《无声的群落》这部百万字的文集,为我们讲述了闻所未闻的上山下乡真相。文革前从重庆下到水洋坪林场的百余知青,在1969年被集中骗到一个旧监狱高墙内,在军人荷枪实弹看守下,上级要求知青学习毛泽东说的话,同意改到农村插队。两三个月间,捆绑批斗十几个知青,逮捕八个知青,制造恐怖高压,迫使全体知青不敢抗拒,最终被装上卡车,押送农村。南江县几位文革前老知青,安置时遇到困难,上级没人管,只好砍杨树做小家具,与村民有了冲突。有人便以谎言挑动起群众,聚众将三位知青活活打死。其中一位知青被抬到荒野,还没断气,便被推下山崖,仍没断气,便被乱石砸成肉泥。

这是一本让人不忍卒读的书。老知青们真实苦难的经历往往让人泪水盈眶,让人哽咽不已,让人想闭上眼睛、把书合上。因为这是一页不忍听闻的历史。挑动阶级斗争的受益者们,为了任何目的,可以任意指定敌人。而他们这一代知青,虽然也怀着革命的信仰和迷信的虔诚,渴望被革命的群体接纳,但这些被血统论政策歧视的贱民,不过是被专制政权储备的敌人而已。血统论其实是为了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的需要,储备敌人。

可想而知,这一代老知青经历的坎坷、曲折、苦难、磨砺,比阳光灿烂的一代知青更多,更深刻。因此,他们在书中的讲述,往往浓缩了共和国公民被阶级斗争的历史。王百明死后几年,成为他死因

的“反革命”父亲也去世了。又过了几年,一份打字的油印通知说,原判他父亲的反革命罪一案系错案,予以撤销。却原来,王百明和他的父亲,这对死去的父子“敌人”,只是临时指定而已。至今,没有人对他们说过一句道歉的话。这事儿已经算过去了。

如果不是这本书,这事儿就永远过去了,没人还能知道这段历史真相。真相是历史的第一要素,坚持真相才有可能坚持真理,掩盖真相不会只是不好意思。制造仇恨和斗争,给人类带来了无尽苦难。了解苦难真相,才能比较出自由思想、社会宽容、民主平等、终结仇怨的社会意义。在这一点上,《无声的群落》这样的书,有重要的作用。从书中可以看见,作者们那些苦难的叙述,是对历史的记忆,但不是对历史的记恨。没有这些记忆,就不会有对极权专制的反思。同时,没有这些记恨,才不会重演仇讎斗争的历史。

少年壮志时大家都满眼敌人,以为历史全是对敌斗争。其实,我们身边哪儿有敌人?我看古代,觉得敌人的出现有两种条件,一是蛋白质匮乏,二是政治家需要。皇权可以为了政权利益抑富没产,把人扫地出门,也可以为了政权安全而指定敌人,“以事诛之”。古代那些讲不完的发配故事中,可以想象,有过无尽的冤屈、恐怖和凄惨。那些故事并没有在政权更迭后结束,我们的继续革命、对敌斗争,不过是在重复古代的故事。

那些年,知识青年亲见亲历的生活习俗、劳作方式、土地依存、家族宗亲、抑富没产、实边垦荒等等,以及极权对所有个人的强力控制,那些从乡村生活到政治安危的几乎一切,还有像杀戮王百明那样对生命的轻视,都跟古代差不多。所有的知识青年,其实都在乡村亲历了最后的古代,文革前老知青更是亲历了株连。直到改革开放,我们才有了走出古代的可能。

《无声的群落》讲述的,是最后的古代故事。虽然古代未必已经完全终结,古代的故事还有发生的条件,但毕竟,现代在一步步走来。当一代知青垂垂老矣之时,让他们感到安慰的是,那些从中原到岭南的苦难迁徙,从大槐树到四方的被迫移民,从家居到边地的凄惨流放,从城市到农村的上山下乡,都已终结了。

(本文为《无声的群落》序)

(上接 74 页)的中国知识界诸多学者对新文化运动的“过度反思”,实在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本来,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有的与之有联系,有的与之并无联系,而邵建先生等人却一古脑地将其追溯到新文化运动,似乎新文化运动成了后来一切问题的渊藪,应对其后的一切苦难负责。在“过度反思”的作用下,给 20 世纪中国留下最重要思想遗产的新文化运动变得面目全非,后来人对之已到了无所适从的地步。不客气地讲,对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过度反思和过多指责,反映的是当下知识界的一种“犬儒主义”心态。

(作者为资深编辑)  
(责任编辑 吴 思)



## 2010 年第 2 期目录

书屋讲坛	国家建设视野下的清末宪政改革 社会性“造反有理”批判 ——《水浒传》小逻辑质疑	郭绍敏 刘再复
流年碎影	令人扼腕的两个被暗杀的中国文化栋梁 “熟悉的陌生人” 寻找伏尼契	散 木 刘 超 盛禹九
域外传真	《诸蕃志》译注:一项跨国工程 合著黄金铸老翟	顾 钧 郝 稷
书屋品茗	对我而言,你是整个世界 ——人文关怀视野下的独生子女政策 良医,让我如何识别你? 规则、变通及其他 思想的生成 我看中西自然观与人生观 “平其情”、“思其反”,还原黎氏历史公正 ——点评裴高才著《首义都督·黎元洪》	万 里 陈心想 周莉华 郭铁成 郑佳明 章开沅
灯下随笔	“于不疑处有疑” ——以一位伟人的一段名言为例	傅白芦
书前书后	《聂绀弩旧体诗全篇》序 《问茶》跋	王 蒙 秦燕春
人物春秋	玉璧与天安门 ——关于国徽设计的回顾与思考 失行孤雁逆风飞 ——激进与自由之间的张若名 金毓黻日记所见民国学林遗事	李兆忠 桑 农 张晓唯
编读往来	对《陈丹青的优越感》一文的批驳 一封来信	陈 东 庞嘉季
史佚佚篇	市场经济果真很“自由”吗?	摩 罗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 6.00 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 410007 电话:0731-85791300 85486812 传真 0731-85790197 邮箱 nlh5314@263.net		



# 为 国 为 民 心 坦 荡

## ——读《李昌传》

● 杨继绳

李昌是我十分尊敬的老学长，他比我早三十年在清华大学就读，他在抗日时期的卓越表现记录在清华大学校史上。他的一个女儿和两个女婿都是我在清华的同学，他老伴冯兰瑞是我学习经济学的良师，也是我办报纸和办刊物的重要作者。老太太曾对我说：我家有四个清华的，你常来聊聊啊。但遗憾的是，我很少有时间去看望。我对他的一家是熟悉的。但是，我对李昌却有高山仰止的感觉，加上他晚年听力不好、交流困难，所以我没有跟他直接交谈过。最近读《李昌传》，并与冯老多次交流，才对他有了较深的了解。

### 追求真理 踏实苦干

李昌原名雷骏随，1914年生于湘西一个大户人家。早年随长兄到上海求学，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投身革命，1933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加入共产党。他是“一二·九”运动的代表人物，他先后担任清华大学民族解放先锋队大队长和北平民先队总队长，1937年2月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几十年来，李昌转战南北、三赴延安，为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李昌已是中共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团工委书记，主持华东青年工作。他给刚解放的家乡人民政府写信说：我家是大地主，一切土地财产均交人民政府，并预祝家乡土地改革取得成功。

2002年和2003年，我在评论李普和李慎之的文章中提出在—批革命老人当中有“两头真”现象：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抗日救亡，真诚地参加革命，晚年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现实，用良知推动中国前进。他们饱经沧桑，久经历练，他们晚年的思想是对20世纪实践的提炼，是中国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没想到我这种“两头真”的说法

引起了一些老人的共鸣，连张劲夫这样的高官也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说：“我也是个两头真。”

其实，“两头真”现象不是我的发现，在我之前就有其它表述方式作过描述。戏剧家黄宗江，曾用一个“之”字，来描述他一生所走过的路。史学家蔡仲德提出了“冯友兰现象”，认为冯氏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回归自我。中国社会科学院前院长胡绳八十自寿铭写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稍知天命。廿一世纪，略窥门庭。九十无望，呜呼尚飨。”这“惑而不解”的30年，就胡绳的年龄而言，大致在195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这些革命老人中间一段时间困惑甚至失真，其原因就在这30年的历史当中。

我原来以为李昌也是一个“两头真”的人物，读了《李昌传》，再和冯老多次交流以后，我才知道，很难用“两头真”来概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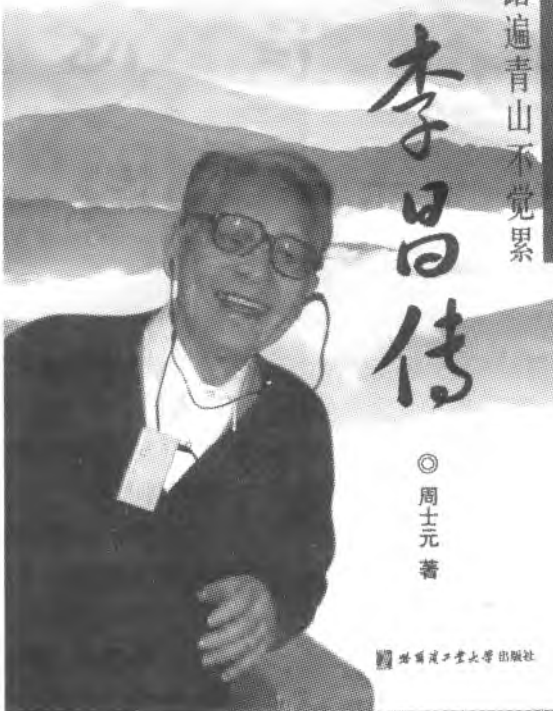
李昌是做实际工作的。在胡绳“惑而不解”的那30年，李昌不能说理论上完全清醒，他的思想认识也不可能超越那个年代，但他凭良心办事，在实际工作中力求唯实。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作为哈工大的党委书记、校长，他尽可能地缩小打击面。据《李昌传》记载，哈工大机械设计教研室报上了5名右派预备名单，全部被李昌保下来了，没有一个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在苏联留学的章绵，被定为右派，开除团籍，遣送回国，转来的右派材料被李昌压下，章绵得以幸免，几年后还评上了副教授。在苏联读博士的青年师范范崇惠，被开除团籍，遣送回国。李昌十分重视他的申诉，派人调查，最终平反了这桩冤案。1990年代曾任黑龙江省省

长的邵奇惠,早年以一名普通工人报考哈工大夜大学,由于他戴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招生工作人员不敢录取。李昌得知后坚持录取,使邵奇惠跨进了哈工大的校门。1960年,李昌看到26岁的吴从忻能力出众,要破格晋升,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吴从忻在吉林大学进修时因“大鸣大放”中的言论受了处分。李昌力排众议,亲自出面向有关部门说明情况,终于让吴从忻越过讲师,直接当上了副教授。现在吴从忻是著名的数学家。

李昌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实干家,他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能够开创新局面。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说:“李昌是一部推土机,一股劲地把事业推向前进。”哈工大一位校领导有一个更生动的比喻:“一般人给他一件缺扣子的大衣,他可以配上扣子;而给李校长一枚大衣扣子,他可以拿这枚扣子配一件大衣。”1953年,他从团中央调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在位11年,把这个问题成堆、难以为继的大学办成了国内著名的重点高等学府,培养出数以万计的科学技术人才,享誉海内外。他也因此桃李满天下。在他九十岁的时候,不少学生来信祝寿。李继耐上将来信说:“今天是您的九十华诞。南山不老,寿比松鹤。在此,请接受学生对老校长最诚挚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1961年,我刚进校不久,便参加了您亲自主持召开的新生座谈会,当您了解到我学习的专业是液体火箭发动机时,您深情地说,苏联的加加林今年4月12日已经上天,中国人有志气,有能力,在不久的将来,也一定能用自己制造的火箭把中国的加加林送上天!没想到的是42年后的今年十月,我竟有幸真的参与了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工作,并担任工程总指挥。”

1964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任命李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党组书记、



副主任,主持工作,同时还挑起了第二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的职务。他依旧以他那种开拓精神扎实地工作着,不料一年多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被划入了“彭真反党集团”,在“牛棚”里关了6年。其间,除了在对外文委受批斗以外,还被揪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批斗,被打得头破血流。直到1973年邓小平出山以后,李昌才真正获得自由。

## 在中国科学院

文化大革命将中国科学院糟蹋得不成样子,大批

科研人员受到迫害,科研几乎停顿。1975年邓小平主政时,派胡耀邦、李昌、王光伟进中国科学院,全面负责中科院的党政工作。他们要在三个月内完成邓小平提出的三项任务:调查研究,向中央反映科学院的情况;搞一个科学院发展规划;向中央提出科学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名单。李昌等在调查中发现,北京地区的170名高级研究人员中,有131人被列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或被审查,全院被迫害致死的科研人员达229人。大批科技人员下放“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各省市的中科院分支机构的科研队伍受破坏的情况更加严重。

胡耀邦、李昌等到科学院,首先克服重重困难,为知识分子解决“五子登科”的问题。“五子”首先是位子,科学家原来的位子没有了,要给岗位;票子,科学家工资很低,要涨工资;房子,扫地出门,家人下放,回来后要给他房子;另外是户口本子,夫妻两地分居,要解决户口问题;还有炉子,做饭没有煤气,也要解决。在当时条件下真正解决“五子登科”是很难的,李昌等只能尽力为之。

当时毛泽东有“两个估计”: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

## 在中纪委

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科学院上述情况和“两个估计”有直接关系。1975年《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张春桥署名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篇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全国各地、各条战线“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口号叫得震天价响。面对科学院被糟蹋的现状，面对知识分子受摧残的情况，李昌毅然提出：“在科学院不要讲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科技战线不要提全面专政，对科学不能专政。”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阶级要占领上层建筑”的号召下，科研单位知识分子受到排挤，李昌说：“在科研领域，专业队伍是主力军，研究所里研究员是中心，科研人员搞科研就是结合实际，不一定到工厂去。”李昌这些话如电光石火，具有强大的穿透力，迅速传播开来，给知识分子以很大的鼓舞，也使一些人切齿痛恨。

根据邓小平的要求，李昌协助胡耀邦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这个“汇报提纲”全面否定了文革中在科技战线的指导思想，揭露了这些指导思想造成的严重破坏，因此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强大的冲击力，受到了科技人员的热烈欢迎。报上去以后，毛泽东不让下发，“胎死腹中”。

1975年11月下旬，中科院当时掌权的人柳忠阳连续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告胡耀邦、李昌的状，12月28日，毛泽东批示：“柳忠阳同志第二封信，并附材料，印发政治局（并给科学院党组一份）。”1976年1月，《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文章，开展了对《汇报提纲》的批判。“汇报提纲”成为全国重点批判的“靶子”。大批判却使《汇报提纲》得到了广为传播的机会。会上批判，会下称赞。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中科院当时掌权的人召开批判胡耀邦和李昌的万人大会。有一次批判大会胡耀邦因住医院没有来，只有李昌一个人到场。会上有人递条子说：“我们不认识李昌，让他站起来亮亮相。”主持者就让李昌站起来。谁知李昌一站起来，全场掌声雷动。主持者不知有意还是无意，还让李昌下到群众中绕场一周示众，李昌走到哪里，掌声跟到哪里，还投以亲切的目光和微笑。批判会开不下去。

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上，李昌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陈云为第一书记，黄克诚为第二书记，王鹤寿是常务书记，王从吾、韩光、李昌、马国瑞、韩天石为书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且十分麻烦的职务。一方面党内腐败开始蔓延，需要大力整饬；另一方面，改革中出现很多新问题，需要新思维和胆识。李昌面临很多敏感的、棘手的事，党员雇工问题是其中之一。

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对于长期受共产主义教育的广大群众来说，用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是一件欢天喜地的大事。所以，每一次公有制的胜利，总是敲锣打鼓，进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在改革前的1978年，私有企业在中国已经绝迹。改革，对私有经济来说，是一个逆过程，1950年代被消灭的私有经济逐渐恢复起来。随着私有经济的恢复，雇工问题随之而来。

改革前的政治教科书中有一个定论：雇工就有剥削。几十年政治教育，使这个看法深入人心。1979年二三月间召开的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会议，在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报告中说：“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1980年中共中央75号文件，是农村改革的一个好文件，但其中仍然规定“不许雇工”。然而，只要允许发展私有经济，雇工是不可避免的事；如果不让雇工，私营企业就不能扩大规模，就不能发展，就不能解决就业问题。所以，政策开始让步：1981年国务院颁发的《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规定》和1983年的《城镇非农村个体工商业若干规定》中都规定个体工商业可以请一两个帮手，最多不超过四五个学徒，合在一起可雇七人。为什么只可以雇七个人呢？有人说马克思的《资本论》里有这个界限，这完全是对马克思的歪曲，实际上《资本论》里根本没有这个说法。当时的改革一面在超越马克思的理论，一面还千方百计地在马克思那里为这种超越寻找根据。以为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一个字的根据，就可以减少一分政治风险。



在雇工问题上，最为敏感的问题是党员雇工。既然雇工就有剥削，而党章规定党员是不能有剥削的。当时有很多从事个体承包企业的党员，为了发展企业不得不雇工。争论反映到中纪委，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从事个体承包经营的党员，其雇工人数超过了7人，要不要开除他们的党籍？1983年秋冬之交，中纪委开了多次常委会，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会上，多数人坚持要开除这些人的党籍。唯有李昌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不仅是某些人的党籍问题，而是关系到党的农村政策，关系到要不要发展私营经济的问题，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大局。如果开除了这些党员的党籍，整个党的农村政策会受到巨大冲击。李昌是面向实际的，他不迷信教条。他说，短短两三年内，个体私营经济解决了几百万人就业问题，我们不能置广大老百姓生存而不顾去坚守某些教条。李昌回忆说：“（中纪委）常委会开了六次，争论激烈，无法达成统一意见。我虽然陷于孤立，但一直坚持不能开除雇工党员。由于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中纪委常委决定将不同意见一起上报中央书记处。后经书记处讨论，同意了不开除的意见。”显然，李昌的意见之所以被采纳，是因为符合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邓小平同志说：“雇工问题，先不要随便发表意见，现在问题还不十分严重，可以稍微缓一缓，等两年再说。”

## “四老风波”

1989年北京出现政治风波，一批革命老人忧心如焚，李昌也是为平息学潮而寝食难安。1989年4月22日和5月3日，受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委托，杜润生邀请了李锐、李昌、于光远等老人在科学会堂开了两次会。在会上大家对学学生反腐败、要民主的爱国热情表示同情，建议政府采取坦率、公开、真诚的态度和学生对话，按法制渠道解决问题，提出了“防止矛盾激化，不宜压制，绝对不能流血”的希望。他们还建议趁此机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推进民主，制订新闻出版法，以及取消干部特殊供应，压缩特权，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解决高干子弟以父兄的权力谋私的问题。杜润生向中央写了一封信转述了大家的意见。但他们的意见没有

起作用，矛盾继续激化。5月13日发生绝食以后，李昌坐立不安，他连续不断地给几位老同志打电话，商讨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平息学潮的办法。5月25日，他给中央一位领导人的秘书打电话，提出他想约几位原来在大学里做过领导工作的老同志，劝说学生返回学校，部队不进城，尽快恢复秩序。但他的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

1989年秋后，开始进行清查和党员重新登记。中顾委宣布李昌、于光远、杜润生、李锐四人“缓登记”。接着组织对四人的批判。说他们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批了几个月之后，中顾委常委做出决定，他们四位老同志暂不履行党员登记，并上报给中顾委主任陈云，只待批准。1990年5月25日，陈云给中顾委常委各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只要检讨了，这就记录在案了，不要扭住不放。”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在常委会上把这封信念完后说：“同志们啊，这个事情一风吹了，没事了。”事情虽然“一风吹”了，“四老风波”仍留在很多人的记忆中。

李昌年轻时投身革命，希望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进入暮年，李昌冲破了几十年的思想禁锢，反思自己曾经为之而奋斗所建立的体制。2006年12月10日，李昌92岁寿辰与老友小聚时，有过一番痛切的表述：

中国有一个封建附庸的等级体系，这个体系最上面是帝王，下面都是奴才。解放后封建附庸思想影响还很深。不民主，搞文革，使人胆战心惊。构建和谐社会是正确的，但这个封建附庸等级体系还在，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共产党只有真正做到以人民为本，让人民做主，才了不起。

2009年12月12日，李昌年满95岁，他已年迈体衰，因病住院，再不能为国家做什么事情，但他还在思考，还在期待，他期待着一个真正以民为本，让人民做主的政治制度。他忧国忧民，从无个人考虑。1996年，在李昌的老朋友于光远81岁生日那天，李昌写了一个条幅送给于光远：“为国为民心坦荡，办法总比困难多。”于光远说，这十四个字正是李昌自己的写照。

（《李昌传》，周士元著，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 读 《 聂绀弩 旧体诗 全编 注释 集评》

姚锡佩

2009年夏,我听说侯井天先生历经二十多年注释集评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已交北京汉唐阳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策划,正式出版有望了。我打从心底里感到高兴。因为早在1990年,侯先生注解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即因无出版处,只得在获得准印证的条件下,由子侄资助印刷600册,自行营销。结果竟如注者所期待的那样,书一销而空,好评不胫而走。注者又因搜集到了60多首佚诗,便决心再加注释。然而正当他为增注本的出版奔波时,竟横遭车祸,但他依然坚持注释。其后又因不断发现佚诗,欲罢不能地再三印刷了六版。南京大学程千帆教授盛赞侯井天颇有墨子精神。诚然,这位高大的山东汉子的作为和遭遇,恰似鲁迅《故事新编·非攻》中的墨子:他为了救宋,前往楚地,不辞辛劳,待到归来时,力乏脚疼干粮吃尽,却在进入国界时遇到了晦气,不准他进城。为此,我不由在报章上呼吁:愿我们的国人和出版界非“宋”也。

而今出版界果真隆重推出了侯注聂诗。三个月后我在上海得到消息说,11月15日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新书发布暨出版座谈会已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召开,虽则家居济南的注者因年届八十有五,身有隐疾不能莅会,虽则京城早寒奇冷,但与会者却热情高涨,更有九旬老人李锐先生抱病而至,作长篇发言并献诗云:“聂绀弩是至高人,诗骨文风众妙门。独守良知有火气,自由自在最精神。”引起强烈共鸣。

这些消息让我感慨万分。回顾聂绀弩身系逆境忧天痛史涌血成诗的曲折心路,侯井天自掏腰包胼手胝足呕心集注的艰难历程,心头不由呈现聂诗名句:“泪倩封神三眼流”,或能倾注本人对两位前辈执著精神的深深敬意。

当我手捧这部有着王蒙先生作序,分为上中下三册的厚厚诗集注评时,封套上鲜明的聂绀弩手迹、印章和隐约其间的众多名家评语,无不吸引着我。特别是书角上那个浓眉长须,头披长发,身着红袍,低首沉吟于江边的高士,让我又想起了1981年7月21日诗人亲笔题赠于我的诗集《聂绀弩旧体诗集·三草》。那是罗孚先生为诗人八十寿辰,假托香港野草出版社之名在当年6月出版的第一本铅印的聂绀弩旧体诗集,它的封面上就是这位让我凝眸难忘的高士——形似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心灵的伟大诗人屈原。事隔近三十年,两代出版人都以此画做封面,似乎均意在哀叹二位诗人相距两千年的类似命运,均意在称颂“三草”诗人所具有的屈原精神。

不过,我的脑海里又浮现一件曾让我困惑的事。当诗人赠我《三草》时,我指着封面画对他说:“这是把您比为屈原哪!”斜靠在床上的绀弩老人瞄了一下画,竟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我仍坚持说:“明明是嘛。”老人却闭上眼,了无表情。我想这也许是老人的谦虚吧。因为就在这本《三草》的《南山草》中收有两首歌咏屈原的诗:在《端午怀屈子》中讴歌屈原“奇气胸中久郁盘”,“骚卷长撑天地间”,显然绀弩作旧体诗,亦有着尽吐胸中“郁盘”气的苦吟味道;他又在另一首《诗人节吊屈原题黄永玉画〈天问篇〉》中向“风雨雷霆都不怕”的屈原“倾肺腑”:“我曾梦非天所宠,夜深不敢仰天眠。前怕狼,后怕虎,怕灶无烟锅无煮,怕无首领入先茔,怕累一妻和两女,自笑梦胆空如鼠。”这是真正的大实话。

绀弩的后半生似乎都处在这种“怕”的忧患中。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新中国

成立后,像他这样一个被人视为“左翼”文人的赤诚共产党员,竟也会因做统战工作被怀疑为革命分子,还差点被打成胡风分子。无休无止地被迫写自诬的反省材料,正经工作不让干了。他似乎已梦自身“非天所宠”,所以到了1957年党中央号召整风时,决意缄口不谈。可是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妻子却被动员起了积极性,发言批评肃反扩大化,还责问“胡风算啥反革命?”因为《人民日报》要刊登她的发言稿,便请索居在家的绀弩略为修改了近百字。不料霎时风云变幻,夫妻双双被打成右派。接连的噩运,使年过半百的绀弩更明白自己“非天所宠”,干脆远离天威,主动要求随右派大军流放北大荒。又不料党组织命令人人写诗歌颂劳动,绀弩当遵命提笔,岂知一发而不可收拾,甚至在他过去所否定的旧体诗中获得吐露心声的快感,以至在摘帽返京任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文史专员”闲差时,于无聊中更以旧体诗相伴。恰如他后来所说:“我做诗只是一种文字游戏,说得漂亮一点,是一种不须惊动别人而自得其乐的文娱活动。”不过,文人习性难改,总想把诗作示于人,除了与友好唱和外,还自编诗集《马山集》,抄于一本秦汉古玺印谱的空白页上,署名疍翁,有1962年3月写的《序诗》云:

古有《牛山四十屁》,此册亦近四十首。题咏投赠,于人于物,颇伤于马,其有牛者,盖偶然矣。故题曰马山,以马怀沙云。诗曰:

山外荒山楼外楼,吾诗非马亦非牛。  
金人自古三缄口,玉女而今几洗头。  
不问何之皆胆落,迄无知者乃心忧。  
怀沙哀郢吾何敢,偶在牛山冠马猴。

编得后竟未示人,以至今人意外获得这唯一的抄本后,对诗人所谓的“马”和“牛”,顿生歧解:伤于“马列”乎?“马屁”乎?或二者兼有乎?“牛山体”系“打油诗”,而诗人自谓“吾诗非马亦非牛”,乃是在“三缄口”、“几洗头”后,仍心存“不问何之皆胆落,迄无知者乃心忧”,忍不住“偶在牛山冠马猴”的另类。“哀莫大于心不死”矣!他不断修改《马山集》中的诗篇,并在友人的鼓动下,请人手抄《北大荒吟草》赠人。然而在那比屈原时代更为可怕的文化专制年代中,一到“运动”风声紧时,他就不得不亲自焚诗,还须叮嘱友人焚诗。即使如此,文化大革命甫起的1967年1月,他即被捕入狱,罪名

之一便是书写反动诗词。岂料他在狱中依然默咏心中的诗草,十年后他奇迹般地出狱,次年即油印了《北荒草》、《赠答草》、《南山草》赠人,因而有了香港友人铅印出版的《三草》,甚至有了他的挚友高旅写的《序》。

1982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版他的诗集,加了胡乔木的“序”及“自序”,诗人增加“第四章”,将诗集名改为《散宜生诗》。令我奇怪的是,他在对《三草》诗篇作增删调整时,竟把向屈原“倾肺腑”的诗篇删除了。更奇怪的是1985年该社出《散宜生诗(增订、注释本)》时,他又将《端午怀屈子》(已改题《端午节陶然亭诗会因病未赴率成一诗》)删去。幸而后来有罗孚、侯井天这样的锲而不舍的搜求聂诗者,我们方知绀弩曾有四首咏屈原的诗。然而,他缘何在自己最后定本中不仅一首未收,还再三删除呢?他那不以为然的摇头在我心中再也挥之不去。绀弩老人究竟想的是什么呢?

这难道是“谦逊”和“怕”吗?然而,据说《散宜生诗》初版时,编辑抽走了《赠周婆》二首中的第一首,诗人得知十分恼火,对友人说:“这是我最好的诗,这样的诗抽走,还出我的诗集做什么?自由平等遮羞布,民主集中打劫棋”是言我夫妻之事,难道家里就不许自由平等,民主集中?”他坚持要在新增版中恢复这一首出自真切感受,融思辨哲理于婚姻生活的佳篇。又如新增版中增加的《水浒人物》五首中的《林冲》其二“题壁”,是原来《三草》版中原有的,只因原题可能会让人联想某人,故初版时删去,后感到惋惜,才又让“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这样令人清醒,充满了信念和正气的名句存世。而《董超薛霸》末句“佞京侏贯江山里,超霸二公可少乎”,真可谓是当今云南“躲猫猫”案件引发的反思先驱,揭示了在无法制的社会里,“超霸”之类“牢头狱霸”及“躲猫猫”案件不能杜绝的根本原因。

鉴此,诗人在《散宜生诗》中抒写的心声,已远不是屈原“忠臣”式的悲愤。鲁迅曾评屈原:“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绀弩删除了早先咏屈原的诗篇,表明他已走出了屈原的心路,也使他的诗集更集中地涵盖他那个隐喻着伤痛的“散宜生”之名——“无用(散)终天年”(适宜于生存)。但这已不只是体尝个人的遭遇,恰如他



在《自序》中所说：“半个多世纪以来，目睹前辈和友辈，英才硕学，呕尽心肝。志士仁人，成仁取义。英雄豪杰，转战沙场。高明之家，人鬼均嫉。往往或二十几岁便死，如柔石、白莽。或三十来岁便死，如萧红、东平。命稍长者亦不过四五十岁，如瞿秋白、鲁迅……有时悲从中来，不知何故，所谓‘泪倩封神三眼流’（拙句）者，人或以为滑稽，自视则十分严肃。且谓庄子的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思想亦未尝全无所见，然真人类及历史之大悲也！”故有赠人伐木句云：“高材见汝胆齐落，矮树逢人肩互摩。”《散宜生诗》诚是此种世相可怕、可恨、可惊、可笑、可痛、可惜、可念的“大悲”写照。

## 二

王蒙先生在《序》中说：“现在，中文圈子中聂的旧体诗是一座奇峰。从伟大中华历史来看，这样的诗篇也属空前绝后。屈原的《离骚》当然绮丽繁华，忧愤沉郁，但没有聂的芜杂中的真挚，俚俗中的古雅，纷纷世相的真切刻骨，荒唐经历的难信堪惊。他老先生是无事不可入诗，无词不可入诗，无日不可入诗，无情——愤怒、无奈、叹息、感激、惭愧、戏耍、沉痛、悲怆、惊讶、坚忍、豪兴、大方——不可入诗。他的诗如怪石，如荆棘，如黑云，如刺刀，如泄洪，如号哭，如骷髅造型，如古树参天，如碾压，如旋风，如断了线的风筝，不知将冲破几重凌霄宝殿。”

此诚为真知灼言。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中的诗横贯近五十年，然，如高旅先生所言，聂诗“绝大部分作于1960年至64年”。生活相对平静，但仍有三年自然灾害和“四清运动”的前奏，“几洗头”的诗人心有余悸地在诗中自叹：“感恩赠答诗千首，语涩心艰辨者稀”；“老想题诗天下遍，微嫌得句解人稀。”是以今日爱聂诗者不仅想了解诗中典故，更想明白其中许多与当代人、事相关的“今典”和诗的“本事”。侯井天注本恰恰满足了读者的需要，他把自己多年来孜孜以求的调查、研究、请教、学习的全部成果，



聂绀弩手迹

倾囊献给读者。而且在不少志同道合者，特别是舒芜、罗孚、朱正、熊笑年、王存诚、郭隽杰、李玉臻等的协力下，不断发现佚诗，他注释的聂诗亦从最初的393首，25万字，增至这一版“注解集评”已653首（包括异本、残篇、断句等），100万字。由于大大超出诗人亲编的262首《散宜生诗》，所以他乘正式出版之际，特请王存诚教授协助，按原诗集体例，兼顾写作时

间先后，将佚诗分为六个部分，同时又重新对照原始资料，进行通校，并尽量注明每首诗的来源和写作时间，使这一版本更便于读者欣赏和研究。

在当今一切向钱看，学术造假歪风频传之际，侯井天秉持操守，以编注态度之认真，工作之细致，搜集之全面，注解之明白，令不少专家学者刮目相看，钦佩之至。李慎之先生曾高度赞誉说：“侯井天先生编辑聂诗，搜集之富与用力之勤，令人惊叹……其精神真可感天动地。所以《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之细密丰富亦为自来注家所未有。”周有光先生在给注者的信中说：“中国传统，大学问家的学问是写在注解里的。朱熹给《四书》作注解，成为一代儒宗。您给聂绀弩诗集作注解，实际是给这个时代作注解。从聂诗的一斑，使今天和明天的青年读者能知道这个时代的大局，这是了不起的历史导航工作。这是井天先生不朽之作。”

然而，在他工作之初，我对他并非全能理解。

1987年和1989年他曾两度携带已编就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释本来到京城，经绀弩夫人周颖介绍找到我，因当时我辑录了悼念聂绀弩的挽诗、联《落在心中的陨石》并参与纪念集《聂绀弩还活着》的编辑，他希望得到这些材料，并结识与聂诗有关的人士。我听了他的自我介绍，不免产生怀疑。因为这位从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离休的老人，终究不是诗词界、学术界人。虽说1958年他曾因被批判为“中右分子”下放北大荒时，在农垦局一所闲置房里与聂绀弩有一宿之缘，不过只是互通姓名后各自睡觉而已，难道就凭这奇缘，在退休后就能为内容纷杂，典故繁多，本事隐秘的聂诗作注解？况且，我很不明白政途坎坷的他何以如此执著地在党内“三出四进”？他的

思想和绀弩老人相通吗？再说他要“详注”诗中的人、事、词，让中学生都能看懂，这好像也是我的导师李何林先生注《鲁迅全集》的主张啊，可是至今仍未实现。对他逐词逐句翻译的做法，我更是大泼冷水。没想到隔年就收到了他的赠书，因是自费，纸张和印刷都很粗糙，在注、译上仍有窃以为的琐屑之处，但读罢全书，大受益。聂诗多为写人、赠人，大都是有名无姓，或仅留姓氏，后加尊称，前加老、小，或以字、号、斋名称之，更有爱称、戏称或讳莫如深的，甚至有错写的等等。过去我也曾因不解其人而不明诗意，未想井天先生竟将集中的110余人解得百人，其中名不见经传者，是他行走于东西南北大街小巷，或鱼雁传书，上穷碧落下黄泉，辗转千百度，碰了不少冷软钉子才找到了其人或亲属。我惊叹老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意志、勤奋和功力，感激他让我看到了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和他们坎坷的命运，得识更多的诗意，更得识聂诗的“史诗”价值。

井天先生把注释“聂诗”称之为他退休后想办的“这么一点点正经事”，不少人正是从这层意义上协助他，互通有无，不讲代价，至为感人。尤其是舒芜先生不辞辛劳地为他看稿解诗，这些都被一一记录在书中。井天先生力求言必有据，刻求最确凿、最权威的根据；又以宽广的视野，广泛收集书报杂志乃至网络上有关聂绀弩及其诗的文字，钩稽多家评说，参照着论述聂诗的艺术，还有着自己画龙点睛的“按语”，竟使这部有丰富注解、集评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不仅如一部人物志，还如一部当代社会风情志，现代知识分子劫难志，更如一部诗论，读来引人入胜。而他所搜集的文章，完全可以再编一部内容更为翔实的纪念聂绀弩的文集。所以尽管他一直是自印自销，但影响不小，连国外学者如日本的木山英雄等先生也托人邮购。

其影响还不止在文化界、诗学界，甚至波及法律界。由于井天先生过人的敏锐力，从收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一首聂绀弩赠朱静芳的佚诗中，发现“急人之急女朱家，两度河汾走飞车。刀笔纵横光闪闪，化杨枝水洒枯花”四句诗，似隐含着聂绀弩奇异的获释之谜——何以被“四人帮”判为无期徒刑的他竟在1976年以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之名被特赦，终于经他八方探寻，找到了隐匿其事

的“女朱家”。由此又引出了爱好聂诗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玉臻，得以从聂绀弩的刑事档案中找到50余首佚诗。这位法官又以寓真之名发表惊动人心的《聂绀弩刑事档案》，不仅让人看到了一个内心丰富、思想锐利的聂绀弩，也痛心地看着他和朋友遭劫后的无奈交代和检举，更震惊地看到了长期来安插在知识分子身边的“卧底”“密告”，引发了对我们生存的社会政治环境更深的质问，对知识分子在逆境中品行和良知的拷问，也造成了一场不小的争论，一时间，成为网络传媒的热点。档案材料的公开，有益于推动我国民主化的进程，可惜大约出于某种顾虑，“档案”交代不完全、不严谨，也造成了人们对一些人事的误解。这恐怕与绀弩写诗的初衷有违吧，如果他看到因他又造成错案和不当的指责，恐怕更要“泪倩封神三眼流”了。

绀弩有名句云：“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不止于肉体，更是心灵的折磨和摧残。如王蒙先生在本书的《序》里，首先就说聂绀弩“这个名字我所以记得，最早是在批判胡风的高潮中，我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了聂先生的批胡文字。”他又说：“我无意在这里哪壶不开提哪壶，更无意在这里丧尽天良地横扫一切，我只是说我们并没有假装全部忘记了我们的昨天，我们也不会因为某些人的毫不腰痛地站着说风凉话就信了他们的胡说八道。”幸好，聂诗和它的“侯注本”就记着“昨天”，若认真细读，庶几能廓清一些问题，有的误传也就会迎刃而解了。甚至也会让“未曾经历上山下乡插队劳动的70后、80后读者”，乃至明日之明日的未来爱诗人，都能读懂并记住这个“昨天”，得以赏识绀弩诗中不少名篇佳句，体悉别具一格的意境、情趣、讽喻，甚或引起共鸣。这，大概亦是诗人绀弩和注者井天的希望吧。相较之，时下有人以捍卫中国诗学传统者自居，杞人忧天地呼喊“聂绀弩体有鲜明的时代烙印”，须予以“彻底清算”，凡此云云，总归仍是“文革”式的唬人之声矣。

我相信，这本《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释集评》终会被学术界重视、研究，产生更大的影响和价值。

（作者为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李 晨）

# 还原真相是走向正义的第一步

● 郭道晖

“被忽略的历史会变成被否定的历史,甚至导致重演。”

这是美国《洛杉矶时报》2009年12月5日发表的一篇社论《韩国勇敢地回首过去》的开头警语。

该文表示高度赞赏韩国“真相与调查委员会”对50年前朝鲜战争期间数万名左翼人士遭屠杀的细致调查。该委员会最近宣布已找到韩国军队和警察在朝鲜战争(我们称为“美国侵朝战争”或我国“抗美援朝战争”)最初几个月被军方处死的4834名平民的证据(这个数字可能只占全体遇害者总数的10%)。这些平民先是被勒令参加由韩国政府安排的“再教育培训”,而后予以杀害的。据有关证人指称,屠杀的命令是来自“最高层”。最近解密的美报也显示,当时美国军官对这些屠杀知情,而且至少在其中一场屠杀中露面(转引自《参考消息》2009年12月7日第三版《一切战争罪行必须曝光》)。

据报道,数十年来,讨论这些杀戮在韩国是禁止的(这大概也是所有专制统治者的通病)。很多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一直保持沉默,担心遭报复。历史学家是依靠相关的口述和书面纪录,才得明真相。近几十年来,已有超过35个国家设立了真相委员会,直面历史创伤。表现最好的有秘鲁、东帝汶、摩洛哥和南非的委员会。

美报社论指出:“还原真相是走向正义的第一步。韩国人已经勇敢地迈出。”

我在《五七风云:追求与打压》一文中(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8期)曾列举过国际社会近年来的一种新动向:许多国家都在回首该国过去的统治者在历史上实行奴隶制、种族屠杀或恐怖暴行给本国人民或他国人民所造成的伤害,并进行政治道歉和经济赔偿。其中最著名的事例是,前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1971年访问

波兰时,在被德国纳粹杀害的波兰人的纪念碑前下跪。有的国家或地方领导人甚至为几百年前国家的罪错道歉。如美国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议会通过决议,向200多年前该两州贩卖人口和实行奴隶制度表示“极为遗憾”,认为政治道歉将有利于采取措施“消除奴隶制度至今对人们的影响”。2008年美国国会还正式通过决议,为200年前美国实行的奴隶制道歉。在澳大利亚,1998年人权组织发起设定每年5月26日为“国家道歉日”,以反省18世纪70年代被英国殖民者掠走10万土著儿童的罪行(将他们抓去英国,让白人家庭进行所谓“欧化教育”,图谋从思想文化上征服土著人,他们被称为“被盗窃的一代”)。

即使在我国台湾,在上世纪50年代“政治受难者”的“秋祭追思会”上,国民党主席为当年国民党当局镇压人民的“白色恐怖”,郑重地三度向受难者公开道歉。他说:“虽然那时我还是小孩子,但既然现在身为国民党主席,就必须承受国民党过去的责任。”(据中新网2005年10月31日报道和龙应台《国民党的反省》,2005年4月24日)2006年西安事变70周年纪念日,国民党主席办公室通过台湾的党史历史馆长邵铭煌,为上世纪40年代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杨虎城的惨案,代表国民党向其亲属道歉(见新浪网2006年12月12日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报道)。

国家罪错由国家领导人出面向人民、向受害者作政治道歉,有利于抚慰受伤害者的心灵,获得社会公平感,化解民怨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解。这已成为文明国家的一种政治道德惯例。更根本的目的还在促使领导人反省导致损害的政治经济根源,汲取历史教训,检视制度和具体体制上的问题,加以改革。再说,勇于承担政治责任,不会损害、反而会提高领导人的威信。勃兰特的道歉使他获得197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就是



明证。

可惜我国政治文化中,历代统治者缺乏这种传统、责任感和勇气。人们很难寄希望于当局的道歉和赔偿。

我曾参观过设在美国华盛顿的“大屠杀博物馆”,是以记载希特勒法西斯暴行为内容的。其中就有许多当时留下的电影和照片及其他实物,令人见了触目惊心。当看到成百万群众高举右手,狂热地欢呼拥护希特勒时,不禁联系我国文革时天安门广场红卫兵高举红宝书三呼万岁的情景,如出一辙!才知人类的疯狂愚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马克思说过,人民也可以被腐化。在长期的愚民政策教育下,人民群众既是专制统治下的顺民、奴隶,也可能成为统治者的无知愚昧的帮凶。文革中红卫兵虐待、杀戮“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的暴行就是如此。法西斯德国希特勒的上台,也是得到其工人群众的狂热拥戴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战争也曾得到其民众的强烈支持。

近读某山寨历史刊物所载,上世纪50年代曾任职中共昭通地委党校支部书记的一位同志的长篇实录,揭露了1957年云南省昭通地区有关当局迫害被引蛇出洞打成右派的两千多名干部和教师以及近千名在校高中生,不少人被残害致死。并溯及解放后以谢富治为首的宗派集团,忠实执行对云南地下党、边纵的“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十六字方针,通过所谓反地方主义运动、三反运动、肃反运动,对地下党和边纵干部加以整肃,打击迫害当地地下党干部,导致许多革命干部或自杀,或被冤杀、暗杀的惨剧。1957—1958年整风反右时期,昭通全专区共划右派614名,而其中云南地下党员、边纵干部就被划610名,占99.38%。这一情况,揭示出反右运动在有些地区被借用来成为排挤打压异己力量的手段,露骨地暴露了他们反动的宗派恶行。

更令人发指的是昭通地区的反右受害者被发配大坪劳教所劳改,在1959至1961年底短短三年内,在饥饿和泡肿病的双重折磨下,死亡人数占大坪劳教所本部200人的百分比达30%—50%。作者就其所知,一一列出了死者的姓名和惨死情况。这是一个血淋淋的名单和铁的证据。

反右运动在全国划了55万“右派分子”(一说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这一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文字狱,固然归根于始作俑者及主其事者的罪错,而各地具体执行者也难辞其咎。特别是那些借运动谋私、排除异己、大施法外迫害者,各地各单位也是不乏其人的。

近读一篇有关判例,值得借鉴:1992年2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审判柏林墙推倒前两年东德一个守墙的卫兵,他开枪射杀了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的青年克利斯。这个士兵的辩护律师称,这些士兵是执行命令的人,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不过这样的辩护最终没有得到法官的认可。因为类似的辩护,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纽伦堡审判法西斯战犯时,已有先例。当时各国政府的立场不约而同:不道德的行为不能借口他们是奉政府的命令干出来的而求得宽恕。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界线。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法官这样对被告解释他的判决:“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行为准则,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卫兵之前就知道,即使东德国法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这“最高的良知”(或正义)就是法理学上“超越实在法的法”,而违反正义的立法就是“实在法的非法”。依这种“法”去执法,也是犯罪。

违反人类良知的法律最突出的表现是纳粹德国时代的法律。其中像“告密权”这一法定权利,导致大批犹太人和正直人士死于纳粹屠刀之下。二战后联邦德国司法部门在处理这类告密罪行时,被控人犯辩称他们的告密行为是根据当时政权的法律的行为,并不是非法的。“对这种答辩的回答是,他们所依据的法律,由于违反基本道德原则,因而是无效的。”当时有这样一个著名判例:被告是一名妇女,1944年为(下转第45页)

# 大地主刘文彩 集体记忆的重构

王永华

刘文彩(1887—1949),四川成都大邑人。曾几何时,在中国,不论是通都大邑还是穷乡僻壤,都流传着刘文彩这个名字;在语文课本、小人书、忆苦思甜图片展及电影电视中,刘文彩小斗放贷、大斗收租、私设地牢、草菅人命、喝人血、吃人奶以强筋壮骨的种种暴行让人领略了旧社会的暗无天日。以刘文彩的故事为原型的大型雕塑《收租院》作为一个时代的典型文化符号,与《长征组歌》、《回延安》等一起镌刻在历史上,恶霸地主刘文彩也因此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反派明星,他几乎代表着中国人民推倒的三座大山中的一座,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恶霸地主的总典型。在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刘文彩不折不扣地是一个恶魔。

但刘文彩的家乡——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在当地人和他的儿女们的记忆中,刘文彩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目。学者笑蜀经过数年实地调查,寻访了诸多刘氏家庭的后裔及相关人士,以大量第一手材料为依据,挖掘出众多鲜为人知的史料,于1999年著成《刘文彩真相》。其后十年,他又做了大量考证和修订,一部严肃的史学专著《大地主刘文彩》(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得以问世。作者尝试着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揭示历史的真相,复原刘文彩的本来面目:一个既搜刮过民脂民膏、助长烟毒,又慷慨兴学、济困扶危的复杂的刘文彩,以取代传说中面目狰狞的恶霸地主形象。

据《大地主刘文彩》介绍,刘文彩晚年热衷于维护地方公益事业,俨然是地方上的开明绅士。刘氏家族保持了传统社会中尊师重教的家风,刘湘病故后当局按遗族之意办了“甫澄中学”,刘文辉在成都办过“建国中学”,刘文彩个人出资2.5亿元和3000亩田产兴办了其时全四川师资设备最好的“文彩中学”。从1945年到1950年,文彩

中学共培养毕业生700多名,1951年大邑县人民政府接管该校并改校名为“安仁中学”。“以当时‘文彩中学’的校园设施建设和师资力量的配备,如果中国后来的政权更替不对教育发生如此巨大的影响的话,‘文彩中学’一定能为中国的现代化贡献出更多的人才。”(赵诚《读〈刘文彩真相〉札记》)从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视角观之,此话是比较中肯的。如果联系到而今国家对陈嘉庚、包玉刚、曾宪梓、李嘉诚等著名实业家因慷慨办学所给予的崇高政治地位,那么,倾家兴学、曾两获国民政府教育部与行政院嘉奖的刘文彩最后竟落了个“在劳动人民的白骨堆上建立了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骂名,就不能不让了解真相的笑蜀等人之为之抱屈鸣冤了。

上面的叙事表明,过去单一的恶霸地主模式的官方的解释和宣传,现在正经历着巨大的挑战。其标志就是,在刘文彩的故乡,“刘文彩神话”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受到当地人们的怀疑,很多人都宁愿把刘文彩视为开明绅士,笑蜀们更是将这种感性上的怀疑提升到理性认识的阶段。从恶霸地主到开明绅士形象的转变,这中间隐含着一种对于社会历史事件真实性的质疑,而这种质疑会引发新的思考模式的出现。两种说法当中的哪一种更接近事实真相,自然会有水落石出之时。倒是一种新的思考模式,即人们关于历史事件的记忆是如何改变的、这种改变会在什么情景下被提出、提出者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论证其看法更值得关注。《大地主刘文彩》对于刘文彩原型的挑战方式是迂回的,质疑者提出了许多从前不为人所知,或者是被遮蔽的历史细节,一些往事被以“历史真相”的名义重新挖掘出来,成为一种“重新发现的记忆”。“重新发现的记忆”是挑战旧有历史记忆的核心杠杆和有力手段,一旦新的至关重要的事实被回忆起来,则整



《收租院》雕塑

个记忆的基本模式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如同法庭上的辩论,一个关键的事实可以改变人们对整个事件的理解方式。

在强调阶级斗争的社会中,对于恶霸地主这类人物的记忆,情节几乎是按照国家话语中对于他们的描述来记忆的。彼时,只有一种历史重构模式,相对而言人们对历史真实的怀疑也不太强烈。如今出现了另一种模式——对固有的恶霸地主模式的挑战,人们开始反思过去恶霸地主人物历史的真实了。因而在人们的社会记忆中,一方面是在重构历史,另一方面也可以反省这种记忆重构的真实性。造成这种原有恶霸地主模式受到挑战的最根深蒂固的原因,可以归结为社会情境的改变,即由一元文化、政治经济高度集中的社会向多元文化、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的变化。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受一元文化语境所支配。这种一元文化语境的产生要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文化机制一体化,让所有的信息渠道都传播同一种声音;二是对知识界进行思想改造,让社会头脑都以同一种方式思维。前一个条件的形成比较容易,可以通过社会体制加以强制性的实施;建国后中国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催生了一体化的文化机制。而后一个条件的形成虽然卓有成效,但却付出了巨大代价。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胡风事件、反右运动与“文革”等多次冲击后,知

识分子思想的勇气和能力被阉割。人们的思想只知道肯定而不会怀疑,更遑论批判和否定了。

“刘文彩神话”是在阶级斗争狂飙激进的年代被制造出来的。它的出现,迎合了当时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需要。1958年四川省文化局文社(58)字第79号函指示说:“关于大邑县大地主刘文彩,在剥削和压迫农民方面,在我省较为突出。为了用具体而生动的事实说明旧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决定将该庄园保留,设立地主庄园陈列馆。”(地主庄园陈列馆档案:全宗号67,案卷号G1)其后,政府两次改建了庄园陈列馆。1964年第二次改馆之后的展出内容,完全是“革命浪漫主义的结晶”,远离历史的真实面貌了。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B4卷保存的主管领导的一些指令,就很说明问题。改馆前夕大邑县委宣传部部长批示:展出内容“必须旗帜鲜明,对地主阶级的揭露,没有保留的必要。一事一物都要服从这一点”。如果说这个批示还比较含蓄,改馆之后温江地委宣传部部长的批示就坦率得丝毫不加掩饰了。那份批示非常简明扼要:“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

随着阶级斗争的急剧升温以至于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国家对阶级斗争典型的需要愈加迫切,对刘文彩问题也就愈加重视,刘文彩这才由四川一隅走向全国,并终于在“文革”期间“走向世界”。在“单向度”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与刘文彩相关的文学艺术作品如《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人》、川剧《水牢仇》、泥塑《收租院》等等纷纷面世,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连作为社会良心的文化人也表现出了高度的认同。中国美协秘书长华君武称:“《收租院》是雕塑界的大革命,……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雕塑方面的创新,值得向全国宣传。”郭沫若观看泥塑《收租院》后当场题诗:“毋忘阶级仇,斗争旧战场;雕塑革命化,准备建天堂。”“文革”中被诬陷为“三家村”的著名作家邓拓看了泥塑后,断言:“从西洋雕塑史上看,即使是最著名的作品,也不能和收租院相比。”(笑蜀:《刘文彩真相》,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2页)在“文革”前夜那种特定的政治氛围下,对《收租院》态度如何,已经不是一个个人爱好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阶级立场问题,



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中国政坛正在发生大分化、大组合,处于政治漩涡中的文化人需要一定的场合来亮相、来表白,来说明自己的抉择。《收租院》展览则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场合。谁都不愿意自己的调门低于他人,于是无论主观感受如何,都得对《收租院》大唱赞歌,而且要比别人唱得动听。你追我赶,谁也不甘人后。《收租院》就在不断高涨的大联唱的声浪中冉冉上升,直逼云霄,成了中国文艺界的霸主。随着《收租院》在中国文艺界霸主地位的确立,《收租院》主角刘文彩的“中国几千年地主阶级总典型”的身份也得到正式确认。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多元文化语境的社会逐渐取代一元文化语境的“单向度社会”。阶级斗争为纲让位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个人的权利也日益得到国家和社会的维护和尊重,逐渐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具有了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理论走向现实的可能。在这个文化日益多元的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敢于说出事实的真相了。这无疑是社会的巨大进步,由此极大地影响着历史的重构方式。因为在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容易形成一种浓厚的社会

(上接第 42 页) 陷害其正在部队服役的丈夫,向纳粹当局告密后者休假在家时曾发表有损希特勒的言论。根据 1934 年纳粹政府的一项命令(其中规定凡发表不利于第三帝国的言论是非法的),其夫被判死刑(未执行)。1949 年该妇女被控犯有 1872 年刑法典规定的非法剥夺他人自由的罪行。联邦德国班贝格上诉法院最终判决其有罪,纵然其丈夫是按纳粹政府的法令判刑的,但该法令“违反了一切正直人的正当良知与正义感”,因而是无效的。这一判例被西方法学界认为是自然法学说的胜利,是二次大战后自然法学与人权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也引申出一个重要法理原则:对恶法、恶行的抵制,不仅是公民的权利,也是不容推卸的义务。这警示人们:在政治风波中要秉持社会良知,恪守道德底线,切不可随波逐流,助纣为虐。

在昭通专区蓄意将云南地下党、边纵干部 610 名打成右派(占被划右派总数的 99.38%)的人、在大坪劳教所听任 30%—50%的右派囚犯饿

氛围,“它不仅强大到可以消除任何公开的怀疑,而且足以让个体把所有的不敬都认为是一种对神圣的亵渎而严厉地驱逐到无意识深层”(颜敏:《历史记忆与英雄传奇——“十七年”战争小说论》,《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 年第 4 期)。然而在开放的社会环境里,人们敢于对过去习以为常的东西怀疑了,开始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反思或重构。这种反思与重构,往往意味着改变过去的集体记忆。于是乎,一些明主、英豪被从神坛请下来,成了暴君、欺世盗名之辈,恶霸与军阀被还原其本来面目,成了开明士绅和爱国人士。《刘文彩真相》、《大地主刘文彩》等系列文艺作品的问世就是一种努力:试图改变过去几十年制造的关于刘文彩的集体记忆,还原刘文彩的真实面目,从而完成对这个有争议的复杂的地主人物的重构,以建构新的集体记忆。我们这个民族如能在集体记忆的重构中获得一种自觉反省和深刻批判的能力,那“刘文彩神话”之类悲剧抑或闹剧也将获得一种独特价值,即超越其本身历史范畴的永恒的警示价值。

(作者系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与党建教研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李 晨)

死、累死的负责人,就明显地属于故意违反“最高良知原则”的罪人,何况反右本身只是执政党的决定而于法无据。

就近取喻,只要看看地方上那些官僚,面对反抗野蛮拆迁而英勇自焚的居民,不但无动于衷,继续野蛮摧毁他们的住房,而且还给他/她们泼上“暴力抗法”的污水,人们就可以看出他们是怎样灭绝良知和人性!

我们深信历史是人民写的,总有一天真相将大白于天下;也相信在日益强大的人民力量的催促下,未来明智的执政者会作出历史的交代。希望终有一日,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历史博物馆,也才可望把一切反人道反人类的暴行永远关进历史博物馆,从而可望不再有这样悲惨的历史!

(2009 年 12 月 22 日于清华大学荷清苑)

(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导师组成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责任编辑 李 晨)

# 反右欠下的良心债

• 王 瑛

2004年1月22日晚22点45分,父亲走完他76载的人生之路,心脏永远地停止了跳动。奇怪的是,父亲的眼睛久久不能合上。我用手轻轻摩挲着父亲的眼皮,默念道:“爸,您就放心走吧,妈妈有我们五个儿女照管抚养呢。”念叨了多次,可父亲眼睛仍然不闭。倏地,我想起父亲晚年跟我说过的一件事,就又默念道:“爸,您放心走吧,李娴(李工的老伴)的300元生活费,我们保证按月打过去。”听完这个默念,父亲才慢慢地合上眼睛,仿佛了结了一桩永远的心事——

什么是父亲永远的心事呢?

父亲一生中心中最痛、良心永远不得安宁的一件事,就是在1957年把一个业务技术骨干打成“右派”,并殃及后人。

晚年的父亲常常被这件冤案错案折磨得坐卧不安,夜里难以入眠,以至死不瞑目——

那是1957年,父亲担任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党委书记。起初是搞“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岂知,这是“引蛇出洞”。《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于是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抓“右派”运动。

当时抓“右派”,上级都按知识分子的人头给基层单位下达比例指标。既然有人为制定的比例就不是实事求是,就是不顾客观实际,那肯定有冤屈的,有倒霉的。凡完不成“指标”单位的一把手(党委书记)轻则摘乌纱,重则要戴顶“右派”帽的。

父亲所在的企业是个生产任务很重的单位,“鸣放整风”基本上走了个过场。因此想从言论和文字上抓出“右派”是根本不能的。而上面又催逼得很紧。一个逾千人的大单位不可能没有一个“右派”吧?英明领袖早就有科学论断: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

那些天父亲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抓不出“右派”,不仅乌纱帽难保,而且还会被扣上包庇“右派”帽子,以致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那段时间,父亲一回家就心事重重的样子,阴沉着脸不说话,独坐在一个角落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无奈之下,父亲就从人事科调阅全厂所有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档案,要从档案里抓“右派”了。父亲的原则是:“现行言论”没有就查历史,历史没有问题就查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父亲查来查去,只有一人符合以上条件。此人就是厂里的副总工程师李万钧。他是建国初期清华大学毕业生,只是家庭出身资本家,舅父又在台湾空军任上校军官。父亲对他实在是下不了手啊。因为李工是单位的技术权威。全厂生产中出现的技术难题,唯有他亲自下手才能解决。

父亲单位“右派”名单迟迟报不上去,而上面一催再催,以至下达最后通牒:当下抓“右派”就是政治任务,就是大局,今天18点以前抓不出“右派”来,拿你这个党委书记是问。父亲看看表,已经是16点多了。父亲的思想激烈斗争经历了一个多小时。那是痛苦斗争的一个多小时,是天使与魔鬼的争斗,是人性与兽性的争斗,是个性与党性的争斗……

最后,父亲一咬牙,在18点整时,把李万钧推出去了。然后父亲对着苍天祈祷着:李工实在对不住了,我也是被逼无奈,走投无路啊!

父亲是解脱了,李万钧倒霉了,祸事接踵而来。先是被戴上“右派”帽子,驱赶到农村接受监督劳动改造。最倒霉的还是他的独生女——李平,当年高考,分数超过北京大学录取线20分,只因受父亲“右派”问题的株连,政审不合格,被退档,不予录取。

“文革”当中,李万钧这个摘帽“右派”又被拉出来当作死老虎遭到暴力批判。等到1979年被平反昭雪后不久,李万钧已到了肝癌晚期,不多久就在剧烈的疼痛折磨中离开了人世。

从李万钧走后,父亲每月就到邮局给他的老伴寄20元生活费(一直匿名)。随着物价上涨和薪酬的增加,从2000年以后,父亲每月给他老伴卡上打300元,雷打不动。逢年过节还要多打200元或300元。父亲以此来化解良心上的不安,抚平心中的痛。

李工女儿李平的日子过得更凄惨。李平中断升学

之路后,只得到一家街道办的手工作坊上班。一个“右派”的女儿,在政治上株连的社会里,遭受到的只能是歧视、冷眼、伤害……你再有才华又能怎么样呢?

一个三五十人的街办小厂,说塌就塌了,李平失去了工作。她的婚姻也很糟糕,丈夫是个酗酒狂徒,喝酒就要撒酒疯、打老婆、摔家具……李平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

弥留之际,父亲沉痛地说:“无论做什么事,做之前都要摸着心口想一想,自己做的事能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人,不能做亏心事,做了亏心事,一辈子都会心痛和不得安宁的……”

(作者为大同铁一中高级教师)

(责任编辑 李晨)

## 代购代邮

书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费
吴江文稿(全三册)	俞可平主编	200.00	18.00
李昌传	周士元	68.00	8.00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正	26.00	7.00
中南海人物春秋(上、下)	顾保孜	78.00	7.00
元帅大将的最后岁月	李立宁 孟新	48.00	7.00
历史大转折中22个首任省长、市长和自治区主席纪实	孟庆春	49.80	7.00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全三册)	侯井天	98.00	11.00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	金冲及	128.00	12.00
告别饥饿——一部坐封十八年的书稿	胡国华 傅上伦 冯东书 戴国强	15.50	5.00
牛棚杂忆	季羨林	29.00	7.00
沧桑十年——共和国内乱的年代	马识途	38.00	7.00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张树德	69.80	8.00
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上下)	刘刚 李冬君	58.00	9.00
1978大记忆	苏峰	35.00	7.00
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	钟庆	28.00	7.00
问史求信集	阎长贵 王广宇著	58.00	8.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锐	29.50	7.00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吴思	28.00	6.00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思	28.00	6.00
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上下册)	邓鹏	97.00	10.00
《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	徐庆全	45.00	7.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揭秘(上下)	杨天石	60.00	8.00
国史札记(事件篇)	林蕴辉	40.00	7.00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辉	38.00	7.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克 李锐 龚育之等	28.00	7.00
经历——我的1957年	和风鸣	29.00	7.00
让民主造福中国——俞可平访谈录	闫建编	35.00	6.00
父亲的战场——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	章东磐著	32.00	7.00
流逝的岁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回忆录	李新著 陈铁健整理	39.00	8.00
官场怪圈定律	李茗公著	46.00	8.00
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	张化 苗采青等	59.80	9.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	薄一波	88.00	11.00
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张秀山	43.00	7.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沉思录	马可·奥勒留著 何怀宏译	20.00	5.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2.00	6.00
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傅国涌	30.00	6.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煌	21.00	5.00
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	闫健编	35.0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锐著	22.80	6.00
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台前幕后	于光远	36.00	7.00
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	鲍·斯拉文著 孙凌齐 李京洲 李桂兰译	26.00	6.00
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王光美 刘源等	20.00	6.00
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	张广友	32.00	7.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锐	18.00	5.00
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	叶维丽	30.00	7.00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 100045 收款人 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 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虽然我们不再因为思考与表达成为“右派”,但那段历史我们仍不敢忘记。作者因提出“神化与特权”问题,开始了长达21年的“右派”生涯——一段疯狂、荒唐与阴暗的岁月在这里定格,一段惨痛、悲苦与抗争的生命历程在这里展开……

《李锐反左文选》 1957—1978年的20年,中共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直到十年“文革”灾难。历史上“左”造成的恶果甚多,其中整人(往死里整)是最大的恶果之一。

了解中国政治,必读李锐文章。

《经历——我的1957》 这是一段沉重的历史:1957年的反右斗争,作者和丈夫共同被划为右派分子,劳动教养。在1960年的大饥荒中,丈夫被活活饿死在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里,作者的大半生经历了家破人亡的不幸和痛苦、受尽各种凌辱委屈,经受了—一个女性所难以承受的各种情感遭际与心灵创伤。这是血和泪写就的历史。

《苏共亡党十年祭》 通过反思苏东剧变,深刻剖析了苏共因失人心而失天下的历史悲剧,文章针砭时弊,“实话实说”,有很强的思想震撼力,在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共鸣。

《问史求信集》 这是一部由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阎长贵、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合著的问信文革史研究著作,书中他们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将亲身经历和了解的“文革”中的一些事情回忆和记录下来,供读者参考和研究。

《直言》 尝忆50年代,为鼓励放胆直言,毛泽东多次谈及,共产党员应有六不怕:不怕扣机会主义,不怕撤职,不怕开除,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六者除头颅犹在,其余皆已身历。自谓因祸得福,筋骨耐劳,心志耐苦,世事洞明,胆气犹壮。今年80有余,回首平生,行止无愧天地,得失从不萦怀,素与“左”倾无缘,足以自慰矣!来日无多,请问尚有何眷恋?关怀莫过后来者,忆旧体忘左祸殃,但愿一言堂永绝,神州遍地百花香。——李锐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这是一部回忆并带有研究性质的书,但不同于个人回忆录,书中不少情节是历史档案中所没有的,作者将了解的情况如实写出来,留给今人和后人探讨。



# 抗战胜利后中共的地方自治思想

· 赵铁锁 肖光文

地方自治属于民主政治的范畴,是指“在一定的领土单位之内,全体居民组成法人团体(地方自治团体),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并在国家监督下,按照自己的意志组织地方自治机关,利用本地区的财力,处理本区域的公共事务的一种地方政治制度”。<sup>注1</sup>抗战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主张地方自治,对于争取解放区政权合法地位,推动政治民主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一、中国共产党主张地方自治的历史背景

首先,中国共产党主张地方自治的政治逻辑。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政权与国民党政权并存局面,是中共提出地方自治主张的政治生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建立了十九块抗日根据地,其政权与国民党政权并存的局面,历经整个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始终高举争取民族解放的大旗,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坚持团结全国最大多数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而博得了人民的信任,巩固和发展了自身的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政权一直属于地方性政权,并未取得国民政府的真正认可。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政权并存的政治局势为中国共产党提出地方自治主张提供了历史际遇。

其次,中国共产党主张地方自治的历史逻辑。抗战胜利之初,中国共产党主张地方自治是对抗战时期地方自治主张的相承和延续。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共合作的特殊背景之下,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边区政府形成了特殊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于是,中国共产党把地方自治作为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论依据,并将其纳入自身施政纲领之中。在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各抗日根据地按照地方自治的原则进行各级政权建设,真正实行民主政治。中国共产党力图以自己的模范工作影响全国,从而推进全国的地方自治进程,推进全国政治民主化,促使国民党早日实行宪政。在1938年7月,毛泽东在同世界学联代表团谈话时就明确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讲道:“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国有利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就是边区在全国的意义和作用。……边区是中国之一部分,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之下,与中国其他部分是一样的,但有一点不同,这里是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区域,这就是边区的特点。我们希望这个特点普及于中国。”<sup>注2</sup>中国共产党始终拥护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旗帜,用地方自治同国民党政府进行斗争,揭露国民党一党专政、片面抗战路线。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民主政治,早日实现和平,继承抗战时期的地方自治主张,同国民党进行政治斗争。

再次,中国共产党主张地方自治的现实逻辑。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这一根本愿望出发,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力图避免内战,争取和平道路来建设新中国,逐步实现中国社会民主政治改革,发展中国的民族经济。但

是,由于抗战胜利前后国内外存在的蒋介石是“抗战建国领袖”的舆论,使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相当一部分人对他抱有很大的幻想。美苏两大国也承认国民党政府这个“唯一合法政府”,希望中国能在蒋介石处于“领袖地位”的前提下实现统一。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高举和平、民主、团结大旗,地方自治是政治斗争中政治民主化的纲领,是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继承抗战时期国统区人民宪政运动的精神,为力争和平民主,利用地方自治向国民党要求民主,争取解放区政权的合法地位,提高共产党自身在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

## 二、中国共产党地方自治的思想主张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避免内战,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了重庆谈判。1945年8月30日,毛泽东提出了同国民党谈判的十一条意见,把“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作为政治民主化的必要办法之一,坚持地方自治的主张。<sup>注3</sup>经过谈判,国共双方于同年达成了《双十协定》,关于地方自治问题,“双方同意各地应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惟政府希望不以此影响国民大会的召开”。<sup>注4</sup>1945年11月5日,中共发言人关于交通问题驳斥吴国桢撒谎中讲到:“承认一切解放区之人民民主自治,中央政府不得委派官吏,实现双十协定之规定。”<sup>注5</sup>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向会议提出了《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其中第五项为地方自治,具体包括:“(甲)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废除现行保甲制度,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成立自省以下各级地方民选政府。(乙)中央与地方之权限,采平均主义,省得自订省宪,各地得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丙)全国各地凡已实行普选的地方政府,应承认其合法,并定期实行普选。(丁)未能立刻完成普选的省区省政府,应由各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商,先成立地方性的、临时的民主政府。(戊)收复区的各级政府,应与当地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商,先成立临时的、民主联合的省、市、县政府,再筹备经过自由普选产生正式的省、市、县政府,在少数民族区

域,应承认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及其自治权。”<sup>注6</sup>这就把地方自治正式提到了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面前,提到了全国人民面前。

实际上,不仅中共主张地方自治,第三党、民盟、民建等各党派都主张地方自治。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纲领规定:“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迅速普遍成立省、县(市)参议会,并实行县长民选。边疆少数民族所在之省、县应以各民族人口之比例,确定其实行选举之省、参议员名额。(七)自治县政府,对于其辖区内之国家行政,应在中央监督指挥之下执行之。(八)中央与地方之权限,采均权主义,各地得采取因地制宜之措施,但省、县所颁之法规,不得与中央法令抵触。”<sup>注7</sup>

在国共两党谈判中,在宣传方面,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不断抨击解放区是“破坏统一”,是“封建割据”、“制造分裂”,应该取消。针对国民党这一企图,中国共产党以地方自治理论为武器,与国民党进行了坚决斗争。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重庆谈判的经过。谈到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如地方自治,在纪要发表后,我们提出省府民选,可以找出根据来的,因为孙中山说过。”<sup>注8</sup>同年10月19日,毛泽东提出:“东北、华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实行孙中山民选地方自治,不得委派人员。”<sup>注9</sup>1946年1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称中共所领导的地区为“民主自治区”、“解放区的地方自治”,是人民自己选举的政府。不是中共搞分裂,而是“蒋介石不承认人民有选举地方政府与决定地方法令的普通权利,蒋氏及其一派就造成了中国今天的政治分裂”。<sup>注10</sup>1946年3月18日,周恩来《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讲道:“如说孙先生遗教的一个字也不能修改,那么,国民党今天所做的,就违反了建国大纲。根据建国大纲的程序先实行县自治,然后实行省自治,在全国有过半数省自治后,才可以召开国大,实行宪政。”<sup>注11</sup>1946年10月9日,周恩来在致马歇尔备忘录中说:“地方政权问题,应依照和平建国纲领之规定,暂维原状,以待政府改组后实施地方自治。”<sup>注12</sup>1946年12月18日,他又在《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中强调:“整军方案还有它好的一面,这就是

地方自治。人民武装是地方自治的东西,六十个师只是用在国防上的。地方自治要依靠人民的武装的自卫,我们已经自治了,不再需要国家的军队来防匪了”。<sup>注 13</sup> 这充分体现地方自治在捍卫人民政权、同国民党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作用。

在其他解放区已经成为中共所控制的既定事实下,对东北的争夺是国共双方斗争的焦点之一。在争夺东北的过程中,中共以地方自治为武器,同国民党进行激烈的斗争。1945年10月26日,彭真在《我们的任务是争取全东北》中讲道:“总之,工作要放手,要武装工人、农民,在政权问题上实行东北人民自治,武装问题上实行东北人民自卫。”<sup>注 14</sup> 1946年1月14日,他又在《掌握政权,发动群众》中说:“各县、市应迅速成立或加强临时县、市议会,切实改造县、市政权并加强其领导,只要各县、市政权真正为我所掌握,则村政权即容易彻底改造,在东北各省将来民选自治政府中我便容易取得优势。”<sup>注 15</sup> “对国民党概不以共产党或八路军名义出现,应以地方人民武装或民选自治政府人员名义出现。进行此类斗争,名义越小越属地方性、局部性,则国民党便越没有办法,对我便越有利。”<sup>注 16</sup>

1945年11月4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兵东北之部署,要求“一俟苏军撤退,我方即宣布东北人民自治。现已任林彪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sup>注 17</sup> 其后,由于形势的发展,我军决定撤出大城市,刘少奇在1945年11月指出:“可以在人民中公开宣传,我们为了避免内战、和平解决国共争端而退出城市,但我们要求东北人民实行民主自治。”<sup>注 18</sup> 同年11月28日,朱德在回答国外记者关于中国共产党对东北问题的态度时说:“我们赞成东北人民成立地方性的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不但因为这是人民的意志,并且因为国民党中央政府现在已经再三允诺它将结束一党专政,实现还政于民,推行地方自治,在这样的時候,当然更没有理由在东北这样过去没有实行过一党专政的地方去开始一党专政。”<sup>注 19</sup>

这一时期中共的地方自治主张还体现在对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层面上。1945年10月23日,中共在《中央关于内蒙工作方针给晋察冀中央局的指示》中指出:“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首先从各旗开始,争取

时间,放手发动与组织蒙人的地方自治运动,建立自治政府(在乌盟、锡盟等纯粹蒙古区域可以自治政府的形式出现,在绥东、察南等蒙汉杂居地带,则以蒙汉联合政府的形式出现),准备建立内蒙自治筹委会的组织,统一各盟旗自治运动的领导,党内亦有统一领导与政策。”<sup>注 20</sup> 这个文件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原则的转折点——由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的原则向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的过渡。1946年1月16日,中共代表在政协会议上提出:“在少数民族区域,应承认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及其自治权。”<sup>注 21</sup> 1946年2月18日,中共中央针对东蒙自治问题指出:“根据和平建国纲领要求民族平等自治,但不应提出独立自决口号。”<sup>注 22</sup> 这表明中共的民族区域思想已经发展到趋于成熟阶段。1946年2月24日,中共中央在给东北局的指示电中对东蒙问题的态度作了进一步解释:“在今天整个国内国际形势下,成立这种自治共和国仍是过左的……东蒙今天应依和平建国纲领第三节第六条实施地方自治,在辽北省与热河省省政府下成立自治区。”<sup>注 23</sup>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东蒙不搞自治共和国,而是搞地方自治。

总之,抗战胜利初期,中国共产党不仅肯定了地方自治的价值,而且在各解放区实行了真正的地方自治。这一事实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解放区本身,它带有影响全国政治的性质。中国共产党的地方自治理论主张,无疑是刺向国民党以党训政体制的一把利剑,对于揭露国民党的独裁本质,维护解放区政权的合法地位,推进全国的政体民主化进程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

地方自治是民主宪政基础,有利于实现政治民主化。抗战胜利之初,中国共产党利用地方自治的有力武器,同国民党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国共产党是追求民主的党,代表了全民族的利益,在解放区实行有效的民主地方自治,得到了广大民众及各民主党派积极支持和拥护,民主力量不断壮大,政治地位不断上升。反观国民党,借自治之名,行独裁之实,是假自治,扼杀民主政治,其他各阶层党派、团体的利益得不到切实保障,于是它逐渐失去可以依靠的民心,政治上日益处于孤立境地。1946年,当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悍然发动内战时,它就已经为全国人民



所唾弃。国共两党关于民主政治态度与行动的鲜明对比,昭示了国民党后来失败的历史必然性。

参考文献:

注1 《中国大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注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注3、4、5、6、7、12、19、20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党内文献),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

注8、9、10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注11、13 《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上接62页)队员和少年儿童为对象编写的,我当时曾写信请胡锦涛同志在书前题词。当时他已离开团中央,调到贵州省、西藏自治区担任领导工作,后到党中央任书记处书记,他一直关心少先队和少年儿童,但他非常谦虚,由秘书传话称自己年轻不便于题词。我们都觉得非常可惜!

胡锦涛同志与大家相处,总是热情关怀,平等对待。他去西藏自治区任党委书记时,我给他写信并寄去我们编写的有关少先队历史的书,他在百忙中给我回信,说到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少先队员”,并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在艰难困苦条件下,少儿工作都纳入了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今天我们在执政的情况下,完全应该可以为孩子们多想一点,多做一点,这是关系到我们党的事业千秋万代后继有人的大事”。

我后来又有两次写信并寄我们编写的有关少先队的书给他,寄到中南海,但想他日理万机,十分忙碌辛苦,我怕打扰他,请他不必回信。但我知道,他无论怎么忙,心里总是记着少先队工作,记着祖国的下一代的。2003年到2004年,受全

(上接71页)不让升高中,在街道一小厂当童工。恢复高考后,她自学高中课程,读完大学,又读研究生,曾在海外银行工作了6年,现任某市银行行长。儿子初二文化,在农村插队8年,上了大学数学系,并从研究生班毕业,现在联想公司工作。

2002年12月中旬,老赵应邀去南昌大学讲学,我陪同前往。“高山仰止”,我俩专程赴共青城胡耀邦墓地谒陵。

墓地气势磅礴。老赵深有感慨地说:“耀邦一

注14、15、16 《彭真文选》(1941—1990),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注17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注18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注21、22、23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本文作者赵铁锁,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党建研究;肖光文,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党建。)

(责任编辑 吴 思)

国少工委、少先队工作学会委托,我和薛樵荒、李启民同志一起编写了一本《中国少先队工作50年大事记》。这可能是我为少先队编写的最后一本书了。还和过去一样,寄到中南海,还请他不必回信。

我不能忘记,他在少先队建队45周年纪念活动结束后和我们相见的情景,他兴奋地看完了孩子们在舞台上活泼精彩的表演,接着便向负责接待的团中央少年部长艾玲同志问起了我,我便和一些老少先队工作同志们一起赶去相见,他和大家亲切交谈并拍了照片。这珍贵的照片,我永远珍藏着。

写得太长了,但是似乎还有千言万语没有说完,还有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没有写尽,我还是再引胡锦涛同志信中的话作结束:

“人总是要老的。……但我们的少年儿童工作、我们的事业却永远年青!”

(作者为团中央老少先队工作者,原为《中国少年报》总编辑、《辅导员》杂志顾问、中国少先队工作学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 李 晨)

身正气,两袖清风,浩气长存。”我凝视着墓碑上的遗像,默默地思念着耀邦同志,当年,你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挽救了无数个苦难家庭,挽救了无数的人才。你不愧为当代的伟人,人民心中的丰碑。你的名字将载入史册,永放光辉。

(作者系中国少年报社高级编辑、知心姐姐[1954年至1995年]现已退休)

(责任编辑 李 晨)

# 我看历史上的朱毛之争

——听余伯流教授讲《井冈山斗争与井冈山精神》有感

● 李尚英



毛泽东

朱德

关于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的争论及其后来的影响,虽在一些历史书籍中有所记载,但对其争论的由来与实质却语焉不详,而这件事却常在我脑际中思考。有幸的是,2009年7月12—15日,我参加了“文化部文化管理清史办干部井冈山培训班”,赴革命老区井冈山,学习井冈山斗争史和井冈山革命精神。其间,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特聘教授余伯流先生给培训班全体学员讲了一堂生动的《井冈山斗争与井冈山精神》的课,使学员们深受教育。他在谈到1929年红四军“七大”前后有关井冈山革命道路的开辟者和奠基人、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争论一事时,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他如何根据和运用中央档案馆的档案,实事求是地介绍了以往为党史、历史课本讳莫如深的这一段历史,并说“实事求是”是他多年研究中国革命史的最主要的经验。听了这段话,学员们对余教授做学问的精神都肃然起敬,并由此引发了一些感想。

余教授是这样叙述1929年红四军“七大”前后有关毛泽东、朱德之争的:

朱毛之争原委要从1929年初朱毛率军离开井冈山谈起。朱毛下山后,一路行军并不顺利。毛

泽东感到,在国民党军队穷追不舍的情况下,红四军党内再照过去那样,遇事层层讨论、层层汇报,直至前委最后定夺,太麻烦不说,还会贻误战机。于是做出了“停止军委办公”的决定,取消了以朱德为书记的军委。对此,朱德无意见,陈毅表示同意。2月,中共中央去信,莫名其妙地要红四军分散行动,并令朱毛到上海“学习”。此信在红四军内引起了混乱。毛泽东不愿意去,并劝朱德也不要去,红四军上下也不希望他们去。毛泽东为此写信批评了中央的决定,中央后来也不再提及此事,但却派了刘安恭到红四军任职。刘安恭一来,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刘安恭与朱德同为四川籍,两人又同在德国留过学,关系不错。他受党中央委派,到红四军后,毛泽东出于红四军内部对刘安恭本人资历、经历的尊重,征得朱德、陈毅的同意,决定恢复临时军委,让刘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位在毛、朱之下,陈毅之上。由此引起了一场朱毛之争。刘安恭一到任,即与毛泽东争权。他召开红四军军委会议,并做出决议,撇开党中央关于军委统辖于前委的指示,由军委统辖红四军,要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只管地方工作”,并提出要反对红四军中存在的“家长制”。毛泽东看了这个决议后,大吃一惊,非常生气,立即召开前委会议,取消了临时军委。刘安恭激烈反对,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斥毛泽东和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毛有“家长制”作风。朱德赞成刘的观点,他提出,“党管一切为最高原则”,但应“通过无产阶级组织,起核心作用”;并批评毛泽东在实行“由上而下的家长制”,说毛“强调党员行动受限制,但他自己的行动是自由的”,“不听中央调动”。而毛泽东则坚持己见,非要废掉临时军委不可。由此朱

毛之争持续了半年之久。

说到这里，余教授颇带感情地说“这不影响我们对朱老总的热爱”。随后，他接着说，朱毛之争在雷湖和白沙两次会议上依然激烈地进行着：

1929年五六月，红四军在雷湖和白沙举行了两次前委扩大会议，就设立军委等问题进行讨论。双方依然争执不下。毛泽东见会议无结果，愤然表示要辞去前委书记职务。在白沙会议上，毛的观点得到36票赞成，朱、刘等5票反对。但毛在会议后，还是表示要辞职。陈毅在朱毛之间始终持调和立场，

希望两人从党和革命的立场出发团结一致。他说：“你们朱毛两人，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你们两个大国天天在吵架，我这个郑国在中间不好办。跟哪个走，站在哪一边？我就是怕红军分裂，怕党分裂。我是希望你们两个团结。”陈毅的调解未能起作用。后来在红四军“七大”上，经全体出席者的表决，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被撤，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林彪在雷湖会议后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毛不要辞职。他还在信中说，朱德整天“无所事事”，“有当领袖欲望”，毛看了信后“若有所思”。（余教授的话经录音整理后择要写成，下文不注出处者同）

我们要问：朱毛之争的焦点和性质是什么？

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指出：朱毛之争“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01页）。从余教授的言谈中来看，确乃如是。朱毛之争的确缘于“军委”的废设，这是千真万确的。朱德和刘安恭都认为毛泽东在废立“军委”问题上实施一言堂的“自上而下的”“家长制”作风。刘安恭还在给中央的信中声称朱、毛已“分成”两派。

我认为，刘、朱反毛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前面已说过，刘是因为毛剥夺了他的权力而恼羞成怒，进而反毛的。而朱德则不同。许多历史事实充分说明，朱德从一上井冈山，就把自己的命运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了，对“朱毛”一词是十分珍惜



1931年11月，毛泽东（右二）同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在瑞金合影

的。所以他决不会反毛的。但朱德为什么这次“反”毛呢？先就朱反对“党管一切”言，朱德认为，“党管一切为最高原则”，但应“通过无产阶级组织，起核心作用”，这正如余教授所说，朱德只是“主张党不要包办代替”，并不是反对党的领导作用。至于说朱德批评毛泽东“不听中央调动”，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朱德长期以来就是一位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一直深深地扎在他的脑海中，也是他在旧式军队和革命队伍中始终遵行的原则。谈起毛泽东的“家长制”，朱德批评毛泽东“强调党员行动受限制，但他自己的行动是自由的”，是在实行“由上而下的家长制”。这句话体现了朱毛之争的主要内容。由此，我们也完全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朱毛会师一年多的实践中，毛没有“由上而下的家长制”作风，那么忠厚老实的朱德决不会批评他。不是吗？毛在设立红四军军委这一问题上出尔反尔，刘安恭来红四军任职前，毛泽东为加强权力，取消了以朱德为书记的军委；刘安恭到任后，毛泽东违背自己的言论，随心所欲地又设立“临时军委”。等到刘安恭不听他话时，又自作主张地提出和取消了“临时军委”。毛泽东在这里不是实行“由上而下的家长制”又是什么？再有，毛泽东在雷湖会议上声言要辞去前委书记职务，在白沙会议上得到了压倒多数的赞成票后依然还要辞职，这显然是非要朱德向他屈膝下跪不可。难怪红四军“七大”会议上的



口号是“闹个人意见的滚出党内”(余教授提醒听讲者注意这句话),矛头所指也是明显的。

1930年,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红四军巡查后做了一个“巡视工作情况报告”。他说:“朱德同志很坦白的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指毛泽东继续任前委书记)无条件的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法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朱毛之争“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毛泽东传》第207—208页)在当时战争的特殊情况下,这种和稀泥的态度可以理解。但说朱毛之争“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那么,试想如果没有具体内容,个人之间是不会无缘无故地“争论”半年之久的。

由上所述,我认为,朱毛之争的实质,是民主集中制与家长制或称集权制之争。

朱毛之争在中共党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后来的党史和我们共和国史也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即就主要当事人或出头者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个人来说,影响也颇为巨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朱德、陈毅都受到了严厉的冲击和批判。当时,“打倒三反分子朱德”、“打倒大军阀朱德”、“朱德是黑司令”(朱德在朱毛之争中批评毛的话成了“文革”时他反毛的主要证据)、“打倒三反分子陈毅”(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上取代毛成为前委书记,被认为是反毛的主要证据)等标语铺天盖地而来,陈毅多次被批斗,朱德的批斗大会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进行中,后因毛泽东的干预,陈毅的批斗大会被中止,朱德也幸免于难。林彪却因此次朱毛之争中看准时机写信向毛泽东表忠诚,诋毁朱德(按礼说,林彪是跟朱、陈上井冈山的,朱德非常欣赏林彪这个年青军官的军事才能,遇有军事问题也经常请林来商议,还提议林彪任红四军28团团长的。但林却另有打算。他利用朱毛之争的时机,通过给毛泽东写信,讨好毛泽东和诬陷朱德,暴露了自己的丑恶嘴脸),取得了毛泽东的好感。后来的事实证明,林彪以后又多次能抓住机会为毛解难,而被选为接班人,成为被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祝福为“身体永远健康”的“副统帅”。然而,曾几何时,说别人“有领袖欲望”而实则自己有强烈领袖欲望的林彪叛逃摔死;此后,毛泽东的健康每况愈下。记得上世纪

50年代我在北京一中念初中时,校长徐楚波一次在全校大会上说:“苏联专家说毛主席能活到148岁。”但毛泽东只活到83岁,这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不可否认的是,林彪叛逃是他“早逝”的一个重要原因吧。这也说明长久以来被誉为“洞察一切”的伟大领袖,对有强烈领袖欲望、见机行事的林彪确实看走了眼。不管怎么说,朱毛之争为林彪后来的发迹铺下了一条道路。林彪是朱毛之争最大的赢家。

这次朱毛之争后,朱德在党和军队的作用再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1929年11月底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后,朱德向他赔礼道歉说:“我在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给您在精神上带来了创伤,请您原谅。”(毛秉华主讲《天下第一山》,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0页)此后,朱德在党内、军队内,能少说则少说,能不说则不说,一心一意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权威。这次在井冈山参观大井朱毛故居时,听工作人员说,上世纪60年代,朱德上井冈山,有关人员问他在大井住地的具体位置,朱德说:“有毛主席的故居就行了。”这固然说明朱老总的谦虚,但同时也说明了朱毛之争带给他的影响。

我们说,朱毛之争不仅“不影响我们对朱老总的热爱”,相反,朱老总的举动更增加了我们的崇敬心情。我认为,朱老总反对“家长制”,实际上是要从革命一开始,就在党内树立一种“民主集中制”的正确的党风,使党内政治生活能走上正轨。如果毛泽东和当时的党中央(当时的党中央明显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声称红四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朱毛之争是“极端民主化”要代替“民主集中制”,见《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36页)能从这次朱毛之争中吸取经验教训,采取一些力所能及的限制“家长制”的措施,并能形成文件,那么建国后党内许多不正之风(包括专制集权、个人崇拜)也许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避免,至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轻,党和人民也许不会遭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从这一点来说,朱毛之争是朱老总对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重大贡献,值得在党史、中国革命史上书写一笔,也是朱老总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思想财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责任编辑 李 晨)

# 解放区审判外国人第一案

• 刘向上

1947年5月,在山东解放区烟台市,发生了一桩美籍职员纵车轧死中国黄包车夫杨禄奎的交通肇事案。随后,烟台市向有关国际组织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最后,有关国际组织不仅足额包赔了受害人家属的损失,这名美国肇事者也被烟台市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这桩看似普通的交通肇事案,却因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审判外国人第一案,更因为受审和被判刑的是名美国人,从而震惊国内外。

## 美籍职员撞死黄包车夫

1947年5月23日下午5时40分,当时驻在烟台的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工作人员史鲁域琪,驾驶着一辆中型吉普车,自大马路东森林路向南疾驰。这时,人力车夫杨禄奎拉着车正好相对而来,史鲁域琪见状并没减速,仍纵车疾驰。杨禄奎虽然按例忙靠马路右边躲避,但仍遭史鲁域琪超速驾驶的吉普车猛撞,人力车当即被轧毁,杨禄奎被撞倒在地,胸、腹、腿均被轧伤,后脑壳被轧,形成一个丁字形2寸长的口子,血流满地,脑浆外溢。此时,史鲁域琪不仅不立即停车施救,反而掉转车头企图逃逸。这一情景,恰巧被跟随山东《大众日报》第一任社长匡亚明在烟台出差的其勤务员李万槐遇到,李万槐持枪追喊,迫使史鲁域琪停车,并强迫史鲁域琪送杨禄奎到附近的法国医院抢救。

中共党员、烟台市市长姚仲明闻讯后,极为重视,亲往医院探望杨禄奎,并请求院方尽力抢救。杨禄奎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向姚仲明哭诉,要求市长为他们做主。姚仲明向他们保证:民主政府一定依法给予人民生命保障。

随后,姚仲明安排人向史鲁域琪询问案发经过。不料,史鲁域琪依仗自己是外国人和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工作人员,态度十分蛮横,并扬言:“不就是撞了一个穷拉车的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过去撞死几个人不是什么事也没有吗?”

姚仲明接到报告后气愤地说:“烟台现在有了民主政府,不是旧政府了!”他立即责成公安局将史鲁域琪本人及其驾驶的汽车扣押,等待依法惩处。史鲁域琪见政府来了真的,态度不再强硬了,但还是不服气:“我要看看你们要怎样?”

当日夜11时03分,杨禄奎终因伤势太重,抢救无效死亡。消息传开,烟台市工商界、文协、妇联、教联和学联等相继提出严重抗议。

次日,烟台市民政府和洋车工会的领导,给杨家送去30斤白面、10斤苞米面,并安慰杨妻说:“政府是给人民做主的,中国人民是不会白白死在洋人的汽车底下的。”杨妻痛苦地说:“我一家子全靠他拉车糊口,这不是要了俺的命吗?”

因为史鲁域琪的身份特殊,处理起来要涉及外交方面,中共烟台市委和烟台市民政府对这一案件十分重视,他们立即将这一案件报告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和胶东区党委。上级很快做出指示,由中共烟台市委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精神,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处理。

联合国救济总署(简称“联总”)成立于1943年,是周恩来、董必武在上海与他们达成协议后,在烟台设办事处的。该办事处人员多为美国人,团长是美国国务院官员李普尔。

## 各界公祭杨禄奎

5月24日,烟台市民政府就杨禄奎惨死事件向联总提交了严重抗议书。同日,联总总工

会也向联总烟台办事处递交了抗议书,并提出五项要求:(1)肇事人史鲁域琪应依法偿命;(2)贵处负责安葬死者;(3)被难会员医药、治疗、治丧等一切费用,概由贵处负责;(4)抚恤被难家属,保证其一定之生活水准;(5)登报郑重声明,保证贵处人员今后绝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并向解放区人民致歉。

24日下午2时,为处理这一事件,姚仲明与联总烟台办事处主任李普尔举行了首次谈判。姚仲明问:“烟台总工会所提抗议书及要求的各项条件,你们看到了吗?”李普尔回答说:“只是粗浅地看了一遍,并未详议。”姚仲明严肃地说:“联总与解放区人民的友谊,本应一天加深一天才是,可是不幸得很,联总的朋友们经常用刀子来刺杀这种友谊……自昨日不幸事件发生后,烟台市街头巷尾议论纷纷,有些人甚至计划请愿游行。然而,政府为了维护与联总之友谊起见,已予以极力劝阻。政府希望且相信,此事定能获得迅速而圆满的解决。”

姚仲明说:“站在我的地位来讲,要尽量使双方都说得过去。对于肇事人,我的意见,为了维护我们之间的友谊,愿从宽处理;另一方面,则又要照顾到激愤的市民及安抚被难者家属。如能将其

家属照顾得好,死者安葬得好,然后再对肇事人从宽处理,才能说得过去。”

李普尔频频点头称是。他首先表示,尊重姚市长以往对联总外国朋友的好意,而后他以驻烟联总负责人的身份,对此次事件表示口头抱歉,并承认:“过去联总人员中确有或多或少使得相互关系不大好的行为。”但他又提出异议说:“在总工会所提抗议书中,有些地方似乎结论下得过早。”

姚仲明随即重申我方严正立场:“解放区政府确保人权,执行为大多数人民所拥护之法令……政府与总工会抗议书结论是否下得过早,我以为应该结论的已下了结论,不应结论的尚无结论。如此次事件的发生,在史鲁域琪思想上,对中国人生命的轻视是肯定的。假如他把该洋车夫生命视如自己生命一样宝贵,此事绝不至于发生。再者,抗议书中五点要求,基本上是对的。”

李普尔要求待他们重新研究讨论后,再作答复。姚仲明同意李普尔的要求,但提出一个不能延缓的问题须立即解决,即组织杨禄奎治丧委员会。李普尔沉默了一会儿,见姚仲明完全没有松口的意思,只好接受。双方遂决定组成5人治丧委员会,以李普尔为主任委员,烟台市民主政府外事办公厅主任赵野民、东山区区长刘绩卿、杨氏家属杨禄喜和刘仲春等为委员,负责处理一切治丧事宜。

5月25日,治丧委员会经协商后发出讣告:“事情发生后,政府即将凶手史鲁域琪拘押,依法惩办,并向联总提出书面严重抗议。后经外交谈判,除凶犯由政府依法处理,家属按情抚恤另行谈判外,双方协议灵柩举行公祭,并当由三方(联总、政府、家属)成立治丧委员会主持丧仪。决定于本月26日上午10时在东山区坤山路22号举行公祭。为此讣告各界,同晓事概,共慰英灵!”

26日上午,烟台市党政军民代表及联总的有关人员500余人,隆重公祭杨禄奎。灵堂庄严肃穆。灵柩置于后堂,上有杨禄奎相片,柩前供放祭菜火烛,前堂饰满花圈挽联。最醒目的为烟台市政府送的挽联,上联是:解放区乃民主



杨禄奎殡葬仪式。联总烟台办事处代表李普尔夫妇、烟台市市长姚仲明执绋引灵,肇事者史鲁域琪(第二个穿孝服者)为杨禄奎披麻戴孝。



圣地,决不许草菅人命;下联是:中国人有民族自尊,岂能容外人逞凶。联总代表李普尔也送来一幅挽幛,上写:“对死者家属致以吊唁。”并像与会者一样,他戴上招待员送上的黑纱和白花。

公祭由主祭人姚仲明市长读祭文,联总代表李普尔致悼词,山东省职工总会孙会长代表全省工人对杨禄奎工友的死难表示哀悼,山东救济委员会主任李澄之致词。公祭最后,由杨氏家属杨禄奎之亲侄致谢词。

## 两次赔偿谈判

5月27日上午9时,姚仲明等与李普尔在外事办公厅举行第二次正式谈判,谈判中心议题是关于死者家属的抚恤问题。

姚仲明说:“在我们处理这个问题时,必须要重视解放区人民的生命价值和照顾到死者家属的生活问题。一个老婆快50岁了,大孩子15岁了,小孩才2岁,现在家里就等着吃,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来研究。另外,对李普尔先生来讲,为补救解放区人民与联总朋友的友谊,应把尺度放宽一些,表示出对解放区人权的尊重,对死者家属的关心。”

李普尔认为:“在过去联总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而赔偿的数目为250至600美元。”但我方坚持,这个数目恐怕只是在国统区行得通,而在解放区则不行。姚仲明明确地说:“解放区人民的价值要超过国统区,因为这里的人民都是主人。我也在国统区住过,在那里外国人轧死人,蒋政府对凶手照例不加惩办。但在解放区可不成,这是两个世界,解放区是新中国的典型,是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圣地。”

李普尔表示:“我马上打电报给上级,这电报包括抚恤金数,但不敢保证一定能照办。”姚仲明郑重声明:“李普尔先生在上海有许多困难我知道,但民主政府也有许多困难。因为民主政府是根据老百姓的意见办事的,社会人士都在注视着我们的谈判。如果问题未有结果,老百姓会表示愤慨和不满的,事情再扩大起来,也不是政府的希望。关于抚恤问题,现在得不到圆满的解决,我们可先解决一部分,作为杨先生家属目前生活的照顾,其他问题暂且保留另行谈判。”最后协议:

先由联总出100美元,维持杨禄奎家属目前生活急需。全部抚恤问题,待李普尔先生向上级请示后再另行谈判决定。联总公开登报声明道歉。姚仲明和李普尔分别在协议上签字。

5月28日,李普尔就杨禄奎惨死事件在《烟台日报》公开声明道歉,保证不再发生同类事件。29日下午,李普尔偕同烟台市民主政府外事办公厅赵主任、东山区刘区长,前去杨禄奎家慰问家属,送交暂时生活费100美元(兑换75000元北币)。

6月7日下午,姚仲明与李普尔和上海联总总部来烟台的法律顾问达理棋举行第三次正式谈判,解决杨禄奎家属抚恤费问题。姚仲明说:“抚恤问题解决后,政府再依法处理闯祸的肇事人。解放区的法律与国统区不同,恐怕与其他国家也不同。解放区的法律包括一个高度的民主精神,广大群众的意见就是法律的根基,所以只要抚恤问题处理得圆满了,老百姓心平气和了,政府在法律的执行上可以宽大。所以我盼望这个问题能有圆满结果。昨天李普尔先生给了我一个文件,上面提到联总对死者家属抚恤的最高限额为烟台市一个洋车夫48个月的收入,我想咱们就可以谈这个问题。”

达理棋问一个洋车夫的生产力能有多大?姚仲明说:“过去我们主张,按杨的家属生活费、孩子教育费来计算,确定抚恤的款数,那是一个很合理的原则。贵方提出按一个洋车夫的月收入计算,我们认为这个原则不合理。不过我们为了增进与联总的友谊,也可以通融一下。据我的调查,烟台一个洋车夫买卖好时,一天能挣到2000元(以北币计算),不好时每天也能挣到五六百元,平均每天可挣1000元。但烟台洋车夫除了拉车外,有的还兼营副业,如做小买卖或给人家做点零活,这个收入就很难计算出来了。我希望按他每天的洋车收入计算出后,再附上一部分兼营副业所得,总起来就叫一笔抚恤费。不知阁下是否有意见。”

达理棋表示赞同,认为兼营副业这一事情属实,不能不予承认。最后的协议是以每天拉洋车收入1000元为标准,再附加50%,按56个月计算,共为252万元;再加轧坏洋车的赔偿费3万元,总计赔偿255万元(约3400美元)。



阿力克·史鲁域琪接受审判

签字时,李普尔忽然又提出,以前给杨家临时维持生活的100元美金也应算在赔偿费里面。姚仲明笑称:为数很少,我的意见是不必再刺激群众的情绪了。达理棋也感到不好意思,连说:“算了,算了。”

## 法庭判决史鲁域琪有期徒刑

6月16日下午4时,烟台市地方法院在市府大礼堂组成临时法庭,对史鲁域琪交通肇事一案进行审判,各界旁听代表达300余人,李普尔等人也被邀请列席旁听。法庭布置简朴严肃,一条紫红色的幕布上贴着“烟台地方法院临时法庭”十个大字。监审人姚仲明,主审推事林蔚,陪审推事吴俊卿、王哲,检察官姜文章,书记官李岩、高伟,翻译潘廉之、谭天等依次就位。

法庭在下午4时正式开庭。监审人姚仲明在各界代表的掌声中首先致词,他简述了审判的意义是为了保障人权,这次审判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民主政府第一次审理外国人在中国的犯罪案件。

姚仲明说完后,主审推事令肇事者出庭。在两位法警的押解下,史鲁域琪颓然缓步走上了法庭,低头站立在一边。检察官随即起诉事件经过,指出肇事原因是由于史鲁域琪在马路上纵车疾驰,看见迎面过来的洋车仍未减速,以致洋车夫虽紧靠路边躲避,却仍遭不幸。这样的行为,显然是藐视解放区民主政府法令,草菅中国人命。然后,主审官征询杨禄奎家属意见。杨妻说:“我丈

夫死得冤枉,希望政府依法处理。”接着,主审人令证人李万槐出庭,讲述他当天见到的史鲁域琪肇事情景。最后,主审人问史鲁域琪,对检察官和证人说有的有关他的犯罪事实有何申辩?史鲁域琪简单辩解后,对所犯罪行全部承认,并请求中国地方政府宽大处理。

法庭休庭10分钟后,主审官宣读了判决书:“被告阿力克·史鲁域琪,过失伤害致死一命,判处有期徒刑两年。被害人杨禄奎家境十分贫苦,其妻要求的赔偿部分,已经由政府与被告所属机关总历次谈判,其负责人付给

被害人家属赔偿抚恤金255万元,以维持生活,法庭不再就此作出判决。”

7月5日,史鲁域琪写了一封悔过信,在《烟台日报》上公开发表:

“烟台日报社社长先生:倘蒙你慨许把这封信在贵报上发表,我将感激不尽。我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公开地向解放区政府表示深挚的谢忱。不久前发生的不幸事件,是由于我对中国人民之人格与生命重视不够,并一时疏忽大意,致使一人丧命。而政府当局却给予我公正宽大的处理,真出乎我的预料……我希望解放区人民对我有所饶恕和谅解……”

由于史鲁域琪确实有悔过表现,烟台地方法院不久发布了缓刑令:“查伤害致死人命犯阿力克·史鲁域琪,业经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在执行中,该犯表现悔过深切,并经联总驻烟代表李普尔函请保释,本院为了增进解放区人民与联总的友谊关系及恢复其救济工作,特根据缓刑制度的基本精神,核准保释。”至此,“杨禄奎事件”画上了一个句号。

这一事件,中共中央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作了多次报道,世界上许多有影响的通讯社也相继作了报道,一时在国际上产生很大反响。美国合众社记者葛兰恒女士亲自赴烟台旁听了该案的审理,后在她发的一篇新闻评论中说:“美国人为了轧死的一个中国苦力而被判刑并作公开的道歉,在中国许多世纪的历史上,这是第一回。”

(作者为《京九晚报》菏泽记者站记者)

(责任编辑 李晨)

# 我在少先队的工作经历

• 吴芸红

我在少先队工作前前后后近六十年,其中有许多事和人可写。可是漫长的六十年,竟不知从哪里下笔!从解放前地下少先队写起?那不行。应该从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0月13日团中央发出建队决议亦即少先队成立之日,或是从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会议写起?那是1950年4月我们第一次到北京参加会议,那是一次难忘的会议,也是少先队组织在全国范围广泛建立和发展的开始。

## 第一次进京“赶考”

那时,我在上海团市委少年儿童部工作。我们接到团中央的开会通知,决定进京参加会议的人不少,有团市委少年部长蒋文焕,少年部的干部吴芸红、段镇,还有一位辅导员,有华东团市委少年部长蔡怡曾,有《新少年报》总编辑胡德华。大家欢欣雀跃,高兴非凡,这是进京赶考呀!我们大都是第一次上北京,都是年青人,当然乘的是坐席,也是慢车,两天一夜的路程。4月正值春光明媚,沿途绿树红花,景色怡人,对于我们这些第一次出远门的青年人是多么新鲜的事,哪顾得一夜未睡,依然精神十足。

开会了,听报告,听讲话,是必有之事,谁也没有想到听完工作报告以后竟是朱德总司令来讲话。朱老总,这是我中学时代参加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学生界抗日救亡协会(简称“学协”)时就听到的最崇敬的名字之一。当然,朱总司令不是讲战争故事,而是讲关心下一代的重要意义,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和信心。更想不到的是,我们有幸到中南海怀仁堂去参加党中央毛主席的接见,我们坐在会场上,远远望见台上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中央领导同志在谈笑,大家兴奋极了。我们

事先就推举蒋文焕同志向毛主席献礼物:一把恭敬地写上献词的折扇。毛主席笑容满面接过扇子,同蒋文焕握手,我们热烈拍手,把手掌都拍红了,等老蒋从台上走向座位,大家争着热烈握他那只和毛主席握过手的手,露出无比幸福的笑容。这是年轻时代多么难忘的一幕啊!

我们始终 with 热烈饱满的欢乐情绪参加会议,其中有一项难忘的内容:颁发第一次经过修改正式公布的队章、队旗、红领巾,我们这些参加会议的全体少年儿童工作干部按照队章规定举行列队仪式,宣誓入队,戴上红领巾。我至今还珍重保留着这条布质的红领巾。我们这些从上海来的青年人少不得还满怀喜悦,参观游历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合影留念。





## 胡耀邦领导少先队的黄金时期

1953年秋,我调到团中央少年儿童部工作,1964年夏调离少年儿童部,我忘不了这整整十年的时光。

我忘不了50年代开始就在团中央担任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他领导着青年团和少先队两代人健康成长的大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可是栽培党和国家接班人的大事业。他从来都是非常重视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工作,我们也先后听到过他青少年时代就在红军时期做过少先队、儿童团工作的传闻,心里对他十分崇敬。他对少先队工作“花了无限心血”(引胡克实同志的话),作出了许多重要决定政策指示,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箴言。

耀邦同志在1953年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上做的题为《热爱新一代是共产主义的美德》的总结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爱护儿童教育儿童是具有国家意义的任务,也是新中国人民的一种共产主义的美德”的名言,影响深远。

在1955年第三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的报告中,针对那时不许少年儿童调皮,要求儿童斯文规矩的习俗,他批判了旧的教育思想,指出“不许少年儿童‘调皮’会使他们变成不知思索只知盲目服从,唯唯诺诺,毫无生气的‘小大人’”,他强调“共产主义事业的继承人,应该是朝气蓬勃、不怕困难,乐观而富于创造性的人”。所以要注意从小培养少年儿童坚强开朗勇敢活泼的性格。

1955年底,在建设社会主义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少先队开展了“小五年计划活动”,耀邦同志在《辅导员》杂志上发表《现在做小五年计划,将来做大五年计划》的文章,鼓励少年儿童“学习做计划和执行计划,从劳动中学习实际知识”。小五年计划活动是少先队工作结合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一次首创活动,开展栽培植物、饲养动物,帮助学校制作教具,植树种草绿化环境和做小先生扫除文盲等活动。持续时间很长,在少年儿童教育中有很大影响。

1959年10月18日,北京市召开了建立少先队十周年大会,胡耀邦同志在会上讲话,题目

是《预备队的任务》。他激动地给少先队员们讲到了三支队伍的重要论述:“第一支队伍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这是领导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先锋队,第二支是战斗的共产主义青年团,这应该是一支不知疲倦、不怕任何困难、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英勇奋斗的突击队;第三支就是你们少年先锋队,应该是一支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积极进行准备的预备队。预备队的任务就是毛主席号召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第一应当学习知识,第二应当学习劳动,第三应当学习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这是多么令人难忘,多么重要又多么深刻的话!整个人民大会堂欢声雷动,掌声不断,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

这一时期又有多少五彩缤纷有声有色的少先队活动:

第一次全国少先队夏令营于1953年在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举行,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无比欢乐的假期,还有朝鲜、越南、保加利亚三国的少先队员参加,也可以说是一次国际少先队夏令营。

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音乐歌唱表演会于1954年在全国24个城市举行,参加演奏和表演的儿童达20万人,全国85%的中小学参加了这项比赛活动,促进了儿童音乐歌咏舞蹈的广泛开展,活跃了少先队的的生活。

1955年8月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科学技术和工艺作品展览会,展出了孩子们创作的1000多件自然、地理、生物、物理和工艺作品。展出20天,观众达十几万人。当时,周恩来总理和宋庆龄副委员长也来参观,勉励孩子们:从小就能学习掌握科学技术知识,长大一定能把社会主义建设成功。

1956年8月在青岛举行第一次全国少年体育运动会,有27个省市自治区1800多个14岁到17岁的中学少年运动员参加,决出田径、体操等男女少年等级运动员1013人。孩子们还参加了团体操、小足球比赛、骑马、射箭等表演。

这一个个第一次都是不容易的,也是令人难忘的。那时的学校少先队组织还开展了新创的各式各样的“主题队会”,例如“四十五分钟的价值”、“算术多么重要”、“我们祖国的心脏——北



胡锦涛(前排左六)、李克强(前排左三)、李源潮(前排左二)等会见少先队工作老同志时合影。前排右四是本文作者

京”、“书是知识的源泉”、“玩到天上去”等等。还组织参观、旅行、爬山、野营和攻山头、找路条等军事游戏,访问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斗英雄和战天斗地的劳动模范,和作家艺术家见面会,组织各种“巧手小组”,缝扣子编篮子、做布娃娃,订书补书,做风筝放风筝,举行有趣的比赛,唱歌跳舞天天有,说不完道不尽的欢乐幸福的童年!

应该说胡耀邦同志在团中央的这几年,是少先队工作从无到有的打基础的时期,也是少先队工作一个辉煌发展的最初的黄金时期。

## 我们的好少年部长陈琏

我忘不了50年代我们少年儿童部的部长陈琏同志,她斯文,秀气,软语少言,但原则性强,工作高要求重质量,以身作则,亲自动手,但又亲切随和,与人平等相处。

我刚调来不久,便随她去北京近郊通县下学校,我们当天走了两个小学,和校长、辅导员教师都谈了话,也和孩子们交谈、讲故事,回到县团委已过了下班时间,人去锁门。当时她正怀孕,挺着大肚子走了不少路,我很替她担心。下班了,人去楼空,也不能在团县委过夜了,我们的行李被子还在里面呢(那时出差是要带行李的)!幸好窗子未上锁,我推开窗子爬进去,取出行李,和她一起

急急赶到长途车站,总算回到市内。第二天同志们都笑我们这般狼狈相,陈琏同志也和大家一起哈哈大笑。

接着正是召开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前夕,我立即投入会议的筹备工作,被分配做经验介绍部分的编写工作,即将一些地方上交的工作经验介绍的初稿做文字整理修改。陈琏同志负责整个会议的领导工作,并主管这项工作,她还协助团中央分工主管少年儿童工作的书记胡克实同志撰写会议工作报告,任务繁重。第二次少年儿童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告主题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由主管书记胡克实同志作报告。报告申述少先队的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即要注意少年儿童年龄特点和发挥少先队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命题,在社会上和教育界影响都很大,这次会议贯彻下去后,少先队工作有了很大发展。

两年后紧接着召开了全国第三次少年儿童工作会议,仍由胡克实同志做工作报告,题为《为少先队工作的蓬勃发展而斗争》。这次会议主要解决少先队组织发展迟缓、少先队活动不够活跃的问题,通俗的说法就是要把少年儿童组织起来,要使少先队生活活跃起来。这就要进一步明确少先队组织的性质任务,少先队活动的内容要求和方法原则,以及少先队组织的发展方针和基

本知识。会前和会中,陈琏同志亲自指导我们列提纲,写出了一本《中国少先队基本知识》(初稿),内部印发给各级团委少年部,作为指导和培训少先队辅导员和各级少先队工作干部之用。应该说这是一本最早的阐述少先队工作基本知识的书,对初创时期少先队工作的发展起过很好的作用。

陈琏同志在少先队工作上是有远见卓识的,她日常组织部门同志学习中外教育学、心理学等著作,以提高工作水平,坚定工作理想与信心。那时候,当社会各方面还轻视儿童工作为“小儿科”的时候,我们少年儿童部的同志大都十分热爱少先队工作,以从事这项作为荣。她还曾在当时的教育部下属的师范院校讲授少先队工作的基本理论知识,扩大社会影响,为少先队工作的发展热情鼓与呼。

陈琏同志很重视下基层调查研究,取得第一手的真实情况。有一次我随她去南京江苏团省委了解情况,团省委少年部召开大会邀她给省里少先队干部作报告。给少先队员们讲话,她亲自起草报告和讲话,直到深夜尚未休息。我看时间已是深夜三点多钟,快天亮了,不睡觉怎么行!我即起床,劝她休息,我来接着写完。第二天她顺利做完报告,我们都很高兴。接着又随她下江苏句容县农村,乡团委的同志安排她在农家吃饭,有鱼有肉很丰盛,她拒绝去吃。乡团委同志劝说“下不为例”,她还是不去,她说我们应该与农民同吃同住,他们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你说了下不为例,我若吃了,下回别人下来,你还要这样做,我们青年团干部更应讲艰苦朴素,不能搞特殊化。她终于没有吃这顿饭。我牢牢记住这件事,记住陈琏同志的高贵品质。

万分可惜的是,陈琏同志没有逃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为她不幸的家庭出身——她是蒋介石亲信陈布雷的女儿,遭受凶恶无情的批斗折磨。在1971年11月的一个深夜,舍下三个儿女,含冤抱恨,在上海从居住的11层高楼上跳楼自尽!我永远怀念她!

## 胡锦涛: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少先队员

我也忘不了进入80年代新时期的欣欣向荣的少先队工作。那时团中央书记处主管少先队工作的书记是胡锦涛同志。第六次少先队工作会议后要准备召开五年一次的第七次少先队工作会议期间,他让我和几位省里调来的同志一同起草会议工作报告,他和我谈了一些对工作报告的初步设想。当时,他的谦和亲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即刻列出提纲和那几位同志分头去写。后来会议的开法改变了,改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和辅导员代表会议”,报告由胡锦涛同志重新改写为《面向二十一世纪努力培养共产主义一代新人》。报告中充分阐述了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重要思想。会议于1984年7月25日召开,会上选举产生了少先队全国工作委员会(简称少工委),由胡锦涛同志任第一届全国少工委主任。

胡锦涛同志在团中央工作时间不长,但他给我们留下的思想道德和作风的影响却很深刻。

那时候,我实际上已经离休,因工作需要,还担任着顾问的名义。我曾向他提出想向各省市征集有关少先队的历史资料,编写成书。他很赞成,同意我起草的用团中央办公厅的名义下发的通知,以便各省市将有关材料和资料寄来。

于是我便和颜学琴、薛樵荒同志分头到福建、江西、广东、湖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北等省市收集有关少先队的历史资料。我和颜学琴同志去福建时,当时任省委书记的原团中央书记项南同志十分支持,派了一辆汽车供我们使用,一个星期里每日一地接连走了闽西龙岩、古田、上杭、连城、长汀直到江西苏区时期的红都瑞金六个县市,收集抄录了不少资料,还访问了当年的儿童团员、少先队干部等老同志,收获甚丰。回京后编了八本少先队历史资料,并和颜学琴、薛樵荒以及部分少年部同志一起编写了《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话》、《少先队的辉煌历程》、《闪闪的火炬》、《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教材),包括早先编写的《少先队工作手册》等书,供少先队辅导员、少先队员、少先队工作干部以及中小学教师阅读使用。

这些资料和书,原是在胡锦涛同志关心支持下先后编写成的,其中《少先队的辉煌历程》一书是纪念少先队建队45周年,以少先(下转51页)



# 思 想 者 陈 乐 民

● 朱尚同

去年底,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欧洲研究所前所长、资深学者陈乐民先生逝世后,我于今夏收到三联书店编辑寄来陈乐民先生百来幅书画作品的照片。乐民先生研究的是西学(重点是欧洲思想和欧洲文明史),但他对于“旧学”(沿用五四时期的说法)无论是文、史、哲都有精深的造诣,而且知书善画。在乐民先生周年祭将近之际,三联决定出版乐民先生的书画集——《一脉文心》,这些我都早知道。但当我拆开邮件,将近百来幅作品的照片摆在案上,“书卷”气扑面而来,作者的旧学修养和对传统文化的爱,作者的个性和情趣,作者隐隐约约的出世情怀,宛若暗香疏影,依稀可见,我确为之惊诧了。

听说三联熟悉乐民先生在中西文化研究方面成就的几位资深编辑,在先生逝世后,看到了这些书画,长叹息说:“这样的人将成绝响了!”

我曾写过一篇纪念乐民先生的文章,但还有更多话想讲,谈他的书画前,我想先说说我作为一个生物化学学者所理解的乐民先生对世纪之交欧洲学研究的“奠基”和“启蒙”作用,说说他是如何“站在中国看欧洲”,如何看中、西两种异质文化各自的长处和短处的。我认为要知道乐民先生之所以为乐民先生,才会明白“这样的人将成绝响”这句话的忧思是如此的沉重!

我想,乐民先生早就明白,遥远的欧洲文化与我书案上的中国书画二者之间是有“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深层通感的,这项研究正是他已开始做而来不及完成的“牵挂”之一。

八十岁的从事生物化学工作的我,就想照这样的思路写了。

去年读到过乐民先生谈胡适之先生以骚体译《哀希腊歌》的短文。说的是上个时代有些二十岁上下的小青年,旧学的底子就已经很坚实了,

很通透了。惟其坚实与通透,便深知旧学的性质及其弊病。有了这种学养再进入西学,便能把他们所涉及的中、西学问吃得很饱、消化得很透,得其精髓。这些人后来的政治倾向虽各有不同,但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上,心里都是比较明白的。这样的大师从严复开始,可以开出一个不短的名单。

王国维先生早就指出:“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令人惋惜的是,经过这五十年来,这样的人在中国大陆已寥若晨星了。

就年龄而言,我同乐民先生是晚年才相识的朋友。就专业而言,我是研究生物化学的,七十岁以后才不时读一些研究欧洲和研究美国的书,很自然也认同乐民先生和中筠先生(资中筠,陈乐民夫人,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的许多卓识和远见,视他们为师友。我在和他们交往中,知道他们每当“书到用时”,常叹息自己虚耗年华三十年,与前辈师长有着不可追补的差距。我却以为在治学道路上,乐民先生与这些前辈倒有些相似,即他们在进入西学之前,都是在上个时代先奠定了扎实的旧学基础的。

2005年乐民先生戏作《仿孔夫子、胡绳院长自述铭》称自己:“十有五而志于学,二十而误,一去三十年;三十未立,已成‘信徒’;五十初惑,惑而求解;六十迟知天命,粗解自由;七十而从心所欲,回归自然……”

乐民先生是在上个时代完成高中学业的,童年由家学(母亲、兄长)启蒙,一边读小学和中学,一边另师从有旧学根底的先生(当年一个县有名望的中小学里,每有这样的学者),读完了《孟子》、《论语》、《左传》、《战国策》、《古文观止》、《古



陈乐民教授参加学术活动时发言

文释义》、八大家文章、唐宋诗词。四五岁开始练字，由楷而行草，间以隶篆，十余年未懈。国画十岁从师，十三四岁即参加过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的画展，从习王石谷始，转向宋、元、明的文人画，如米芾、倪云林等，尤其是遍观了当时故宫画展，专注揣摩，对一些画派的精微处和区别了然于心，融会为自己艺文修养的源泉。这种诗、文、书、画四者的全面熏陶，是从今日任何学校无法得到的。直到晚年，他写文章，一本稿纸，一支毛笔，全凭腹稿，一次成文。

早在中学时期，乐民先生就立定志向，一不从政，二不经商，而要像胡适之先生一样，潜心学问，写书，写“大书”。“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是他二十岁以前，和近七十岁以后为学的宗旨（抗日战争中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他很失望）。但大学毕业后，这种澹泊宁静的志向，在现实政治中一再出现了裂缝。他经受过多次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他说，我也曾多次努力往好处想，但尔后又又是更深的失望。他说，他大学毕业后的三十年，是“平平庸庸、忙忙碌碌、勤勤恳恳、唯上是从”的三十年。自认颇有些“傲气”，说“这三十年没有自我，是人生中‘大材小用’的一段，或者准确地说，是‘材无所用’的一段”。我从他写的随笔中懂得，他说的“用”，不是“辅弼之臣”或“翰林学士”（今之自封或官封的智囊之类）；他不仅不担心“不才明主弃”，恰是“求弃”。由于从1953年开始的这半个多世纪说不清的风雨苍黄，他只能在无可奈何中保持一片心灵的净土和人格的尊严。

他在送给何方先生的纸扇上题了唐朝诗人

李商隐的《安定城楼》，借诗言志：“永忆江湖归白发，欲迴天地入扁舟。”“永忆江湖归白发”，流露了他的某些“出世”情怀，他常引陶渊明《归园田居》，慨叹自己“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请人刻过一枚闲章“云无心以出岫”，从表面看俨如一个魏晋风骨的五柳先生。中筠先生以为这是他与顾准、李慎之、李锐等革命先辈异趣之处。这些革命先辈都是思想型的政治家，或政治型的思想家，都首先着眼于促进现实政治的改革。他是地地道道的读书人，还自承颇有些“学究气”。当然，他和那些前辈一样，同是对我们这个民族刻骨铭心地真放不下，同有“欲迴天地”之志，所欲“迴”的同是以人道主义和自由为核心价值的“五四”民主和科学的精神。那么“异趣”，异在哪里呢？诗中说“欲迴天地入扁舟”，异在“扁舟”的含义罢！那些前辈的“扁舟”，是李锐老人诗中说的：“关怀莫过朝中事”，而乐民先生的“扁舟”，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他是“以出世的情怀，作入世的事业”（朱光潜语）——乐民先生一生别无他求，只求做一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只求给他一片自由自在研究学问的天地而已，岂有他哉！

幸而有了改革开放，从1987年到2008年，在政治形势因改革开放时或有所宽松之际，他以“皓首穷理”的精神，一连出版了二十本有关欧洲与中西文化方面的专著和文、史、哲、艺文方面的随笔集，我粗略估算，共达五百来万字（杂见于各报刊未收入集子的未计在内）。乐民兄走了以后，他的遗著《对话欧洲》和《启蒙札记》已由三联书店出版。中筠大姐整理遗稿时方始发现，他还留下了数十万字研究中西文化“边角料”（生前自称），一页页用毛笔小楷写就的文章，自题为“碎石集”稍加整理，即可出版。

除了文章，他还留下了数百幅完全属于中国传统的书画作品，全是六七十岁后的寄情之作。显示了乐民先生厚实广博的文化底蕴。

这十来年，是乐民先生在人世间的最后一程。我清楚记得，四年前我和妻子去北京，与他和中筠先生，还有朱正、徐庆全先生一起到餐馆去，他撑着手杖，带着和蔼、含蓄的启蒙绅士风度，慢步走在稍后。我知道，经过十来年的血液透析，他的体能正日益走下坡路，但我却是怎么也想象不

出,如此老病衰年,乐民先生却能宛如“明月出天山”,苍茫游刃于中、西和今、古文化之间,将其迟发、厚积的学养潜能,昂扬喷薄而出,并将其“出世”情怀升华于治学之中,取得了如此重要的成就,他是如何做到的?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智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陈寅恪《王国维先生碑铭》),乐民先生已经“从心所欲,回归自然”了,外物与我何有哉!

1983年6月,乐民先生转入了中国社科院西欧研究所工作,这是一个大可纪念的日子,一去给他的任务是什么都不用管,写有关欧洲的书。这才开始进入“粗解自由”的年月,为将一生所学回馈社会作准备了。

此前,乐民先生虽名为从事了三十年与欧洲有关的工作,又因此在欧洲生活过好些年,但说真的,他除了自己学习和领悟外,只是在五十年代刚进入清华头一年多,对西学稍有涉猎,来不及登堂入室。当时院系虽尚未调整,大师尚在,但清华园非复往日,已是山雨欲来了。

乐民先生去年8月16日给我的一封很长的信中,说自己在离开大学三十多年之后,直到80年代后半以及90年代,受了王国维和冯友兰的启迪,才从“国际问题”转向文明史(着重于思想史),这是他在“文革”中彷徨十年后惑而求解之际,正从宋明理学转弯抹角通向莱布尼兹、康德哲学的时期。他说:“发现西方文明史(或说文化史、思想史)是一扇大窗户,推开来望去竟是一片绚丽夺目的、色彩斑斓的风景。我在其中感到陶醉,不能自拔。”他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新旧约、阿奎那,读到培根、霍布斯、洛克、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斯密、康德、黑格尔,以及圣西门、欧文、马克思、蒲鲁东,直至尼采等人,狼吞虎咽、如饥似渴地读了这许多。这番阅读补了50年代大学不敢教的课,为他自己系统地勾画了西方文化史的大致轮廓,帮助自己从“国际关系”进到历史文化的新天地。

有了这些,他在写《东欧剧变和欧洲重建》时,开始感到所谓“国际关系”只是最表面的层次,尽管这“表层”非常丰富多彩或惊心动魄,只有历史文明问题才是深一层的问题。为什么有

“波匈事件”?为什么有“布拉格之春”?只有论从“史”出,史因“哲”悟,让“精神的历史”浮出水面,才能懂得这都有一个东、西欧洲本来共有的“同源文明”,在东欧被野蛮政治遮盖住了的问题。而真正要将国际问题往深处做,研究者本身必须是通才,有一种“历史哲学”的视野。他以自己的研究为例解释说:“国际舞台上演出的戏剧虽然很感动人,如我写勃兰特‘新东方政策’的前前后后,一波三折,十分有戏剧性。但仍然反映不出欧洲文明和文化丰富的、变化多端的内涵。也不能满足我在对历史长河探索的一种‘冲动感’,我不可能在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中感受到我所向往的美学价值,那实在是太‘功利’、太‘形而下’了,它远远不能满足我的心智上的欲求。”看得出,乐民先生已经在理性学术之路上蓦然回首,准备登上“灯火阑珊处”自己所追寻的“启蒙号”扁舟了。

恰逢其会,这时巴黎大学一次学术会议,题目是“欧洲:文化的内在同一性和现代性”,副题是“同一性中的多样性,多样性中的同一性”。乐民先生由此悟到,“欧洲观念”反映的是两种含义的交织。一方面欧洲有自己的认同性,即从两希文明发端,经过许多世纪由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启蒙运动形成的,以人道主义和自由为核心价值的自由主义传统,即所谓“欧洲精神”,这是同一性;另一方面欧洲又是由不同民族的国家组成的,例如英国,它和欧洲大陆仅一海峡之隔,但民情迥异,这就像丘吉尔始终坚持欧洲大陆与英国的关系是“欧洲与英国”,而不是“欧洲的英国”,欧洲的“民族主义”始终坚持这一方面,这是多样性。上升到理论,“欧洲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悖论,是欧洲古往今来的一种“常态”。欧洲问题复杂就复杂在两个相合而又相分的悖论,这种无介蒂地承认在一致中的多元,和在多元中的一致,是欧洲优秀人文精神的体现,亚洲办不到,非洲也办不到。我以为这较之当年在处理国际关系的“求同存异”,要高一个理性阶梯;因为“求同存异”按当时毛泽东坚持的哲学原则,是只承认“一分为二”,视“合二为一”为异端邪说的,“存异”后怎么办?历史事实俱在,不是求同的余音未了,又“斗”起来了吗?

欧洲的这种悖论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特别在欧洲成为工业欧洲之后,欧洲“认同”和“趋



同”意识,相当大的程度上取代了历史上民族对立以至“世仇”的情绪。今天法国中学生读都德举世闻名的小说《最后一课》,肯定不会有他们先辈那样的感受了。这种历史文化发展的理念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柏林墙终究要被具有“欧洲精神”的东、德老百姓共同冲垮,东欧也终究会走向欧盟和欧洲议会,历史的脚步本来就是这样走的,反对有什么用呢?

乐民先生说:“当我发现欧洲历史上的思想上的时分时合,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现象时,我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高兴。我觉得我找到了理解欧洲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线索和门径。”

此后,他由治欧洲史转向问津欧洲哲学,又因“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为研究中、西文化史,再一次浏览了中国哲学。乐民先生进而游刃于文化的中西之间、今古之间,一是把欧洲作为一种“文明概念”进行贯通考察;二是对中西文化思想作一番通解,即先从严又陵“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明白中西文化二者之异,知道决不能再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路;又从钱钟书“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明白了如何去寻求中西文化思想这相反又相辅两方面的“深层通感”。察其异,会其通。循此下去,顿悟于如何用康德的“二律背反”来做学问。他以为康德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非常之讲道理,他根据欧洲当时的现实进入观念,把历史(过去)和未来二者本身的两面都说到了。康德具有“唯心”和“唯物”的两面性,是一个彻底的唯理主义者,他最终关注的是“人”的命运和“人”的社会应该朝向什么方向发展,他的“世界政府”和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在深层次哲学上是可以相通的。“东西融通之桥梁乃在康德”(牟宗三语),康德逐渐成了乐民先生研究欧洲的启蒙者。

乐民先生在去年8月16日给我的同一长信中说:“我由此沿下来通向了康德以及马克思‘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我后来弄懂了对人的认识是西方思想史一条‘不可须臾离也’的认识路线。由此我自觉大开眼界,此已是90九十年代,岁月蹉跎,朝闻道,夕死可矣。”看得出自20世纪90年代始,他的心境和治学已都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2003年6月乐民、周弘先生的《欧洲文明的进程(修订版)》一书,由北京三联书店印行(第1—3章是周弘先生写的),虽然他自己对这一版“仍不满意”,仍是“悔其‘老’作”,但无论如何,这本书和此后的《欧洲文明十五讲》(北大出版社,2004)以及《冷眼向洋书系之二——20世纪的欧洲》(三联书店,2007年修订版)等集中在五年内出版的这三本书,我以为确是欧洲研究的大事。这些书丝毫没有意识形态的“八股腔”,不是来自或译自外国人的著作,而是自1950年,即半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用中国人自己的眼睛看欧洲,是“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体悟”出来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大著。这些书是叫人明白的,从历史哲学和启蒙的角度叫人明白欧洲之所以为欧洲,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奠定了世纪交替之际我国欧洲学的基础。我以为,这样说是毫不为过的。

这三本书抓住了欧洲文化精粹的内核——以人道主义和自由为核心价值的欧洲精神,探讨了欧洲的去、现在和未来。指出欧洲不仅是一个地理观念或政治、经济观念,尤其是特定的历史文化概念,代表了一种古老而又不断创新的、成熟的文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是西方文明率先通向世界历史(现代化和全球化),是欧洲的经验辐射、扩展而走向全世界。直到1950年以前,世界的学者、东方的学者和中国的学者,有谁不承认近代史上“西风东渐”的事实呢?现在全世界与现代化有关的,诸如科学技术、自由贸易、民主自由、人权、宪政、法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没有一样不是源自欧洲的。

当然在这个辐射的过程中存在福祸相倚,也是必然的。乐民先生对此亦有深刻的阐述,如“全球化的悖论”等。

研究中西文化应该着眼于它的“史”的“轨迹”,两种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轨迹决定了两种不同的“思想底格”。读通了中西两种不同的文明史,就不能不承认,中国比起西方来缺少的正是源于西方的工业革命带来的科学精神和启蒙运动带来的民主、自由精神。西方有这两宗法宝,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是贯通的,工业化是水到渠成的。中国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自我循环,

置身于世界变化之外的。这样的历史所形成的“政治文化”,只能是“专制主义”。这样朝代相因的历史,如不与西方文明相遇是断断打不破的。如从中西不同历史哲学找原因,西方重自然,中国重道德。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科学思维。剑桥大学李约瑟讲了那么多中国科学发展史,但讲来讲去只是“技术”,终归没有发展为近代科学。所以需要“补课”,需要“移植”和“嫁接”过来。既是“移植”和“嫁接”,就必定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有各种各样的不适应、不自然,也就是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和困难。

当然,中国将来总有一天有自己“自主”文化的,但这需要时间“磨合”。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有个前提的,这就是要善于将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探索出将西方文明的精华用于改造中国,同时也将中国文明的精华融入世界文明的途径。按张东荪等人的意见,首应从19世纪中选取,因为此时期的西方文化,如人权、民主、宪政、权力制衡等等,正是中国所缺少的。“老实说直到今日,我们还是得回到中国刚向西方打开门户时的一句老话,向西方学习。学什么?学我们没有的东西,说来说去还是应继续迎进‘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作为一种有自知之明的态度,仍然是十分切实的需要。”时至今日,如果不是抱着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不放,就该承认,相对于欧洲,无论是国民素质(如国民的文化、科学、道德、保健、环境、公民意识等等),还是国家管理(仅以敢于反思、官员廉洁、行政效能、司法公正、贫富差距、政府本身运转成本而言),我们不是仍然处于“赶”的位置吗?更何况我们这些年取得成就的经验来源,最终还得到西方去找,要开放、要入世,要实行市场经济、要同国际接轨,年复一年派大批官员出国学习……其中缘故,还需费辞吗?

乐民在2008年8月16日给我的长信中说他在治学中,马克思帮了大忙。他举了两个例子:其一是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全球化”,发现过去读《共产党宣言》都白读了,到这时他脑子里才有了“世界历史”的观念,才懂得了读《共产党宣言》该着重理解什么。其二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这个讨论刚一开头就被压下去



陈乐民、资中筠夫妇

了,有人好不容易开了点窍,遭到迎头一棒,病至不起。他则借此读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知道有人是可以一方面“把马克思放在神龛上,而做的事,说的话,却都是反马的”。他说,这场讨论如果允许继续下去,必定要提出“人权”和社会主义“异化”问题,这还了得!

在上述同一长信中,乐民还写道:“从此我一读再读三种外国书,第一是康德,第二是黑格尔,第三是洛克、休谟。我发现马克思既‘化解’了前人,又把一切都‘政治化’了,也可以说‘实用化’了。他的思想亮光不幸被埋没在里面了,以致各种颜色混杂在一处,只露出了‘斗争哲学’和‘无产阶级专政’。我很为马克思可惜,他的过人才华被自己扭曲了。”这些话是他的独特之见,也表示了他极不赞成将学术研究“实用化”和“政治化”的学者立场。

乐民曾多次指出,马克思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学说名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说本来应该是开放的、发展的,是可以包容和吸收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但很长时间内把它封锁住了,历史上的思想家们没有谁像马克思及其学说那样,遭受人为的摆布和嘲弄。”因此他在给我的同一信中说,“我曾想用‘马克思学说’代替‘马克思主义’,因为主义往往是‘排他’的、一元的、‘非此即彼’的、‘意识形态’化的。‘学说’则具有广大的包容性,是‘多元’的,是允许不同意见的。”

乐民先生的文章亦史、亦文、亦哲,他赞同陈

衡哲先生所说:历史不是叫人哭的,也不是叫人笑的,乃是叫人明白的。他的文章蕴厚、含蓄、融汇中西、深入浅出,但点睛处又十分犀利,一语中的,全都是让人明白的。

陈乐民说,他不是政治家而是书生,角度不同,他倾向于把马克思看做西方文化史的一员,而不是唯一。今人的任务是既要研究他,更要超越他。马克思确实是伟大的,但毕竟是有时代局限性的。他同意陈衡哲先生所说,自己是深受唯物史观影响的一个人,承认唯物史观是解释历史的良好工具,但不是唯一的工具。他说他从不认为历史的解释只能是一元的。以多元代替一元,无疑是破除各种“八股”,也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法门”。他问:写学术文章为什么一定要完完全全依从某一理论框架那样“起承转合”呢?

乐民对于“欧洲精神”的阐述,既得益于张东荪、陈序经、冯友兰等大师,又自有创见,表现了他勇敢的启蒙学者之风。他的结论是:“欧洲精神”或西方文明在实质上点出了“世界历史的走向”。他以为“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自由思想和民主的制度在19世纪已覆盖了欧罗巴和北美,形成一种我称为‘大西洋的文化(或文明或思想)体系’。”并以为概括的可以叫“自由主义”,至于之所以用“自由主义”而没有用“资本主义”,是因为资本主义是因“资本”而生发出的主义,而“自由主义”则重在人的精神。它不是先有理论,不是先由一些“精英分子”先验地从头脑中想出来的,它纯然是由经验中产生的。换句话说,是先有自由,再发展成“主义”,而不是先有“主义”,再限制自由,以期实现人为的、先验的“主义”,所以说是历史、文化的自然进程。“五四”时提出的德、赛二先生,说到极处,是对欧洲精神的高度提炼,“欧风美雨”所及,浓缩而又浓缩,扬弃而又扬弃,就是“民主与科学”。他公开宣称“渴望中国的前途是民主和自由的土地”。他明确说,他不反对他的书的责任编辑孙晓林先生在“欧洲文明的进程”出版后的座谈会上,称他为“自由主义者”和“启蒙主义者”。终其一生,他不停步的在求索,耻为附庸,他“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使自己活得更明白,“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康德语)。他曾说自己“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老来终于破网而出了。

乐民先生这百来幅书画作品都是搁笔三十余年之后,即六十来岁之后,偶尔的遣兴寄情之作。与他从事的西方文化研究对照看,我觉得恍如有了两位乐民先生。由此而更理解他在上个世纪末为何对“西化”和“传统”产生了难于化解的矛盾。一个是坚持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坚持五四启蒙精神的乐民先生:“在理智上我不能不如实承认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文化传统’并没有开出科学和民主,并没有导向现代化。”另一个乐民先生则是:“在感情上我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是非常有感情的,特别在传统和现代化发生冲突时,我的感情常常在传统这一边。”后来两个乐民先生“合二而一”了,因为他看清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并不在于它是否能与现代化挂钩,而在于它内涵的精神力量和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广大而精微,刻着悠久历史的沧桑痕迹;它深邃而悠远的哲理,独特的美学价值及某些可以抽象继承的道德情操,都是可贵的精神财富”。

我虽因家世渊源,也喜好中国书画,可真正是外行。但看乐民先生的字,就算是外行,只要稍有中国文化修养,也看得出真是“清新俊逸”,赵(孟頫)中含王和欧,一幅幅,一行行,一字字,看来如信步山林,自然自在,吟啸徐行,“书卷”气尽在其中。他的画着意追求寒林浅水、疏朗空灵的画风和“秋叶初霜、平林淡远(染)”余味不尽的境界,一孤松、一小桥、一山、一水、一石,都在“简淡雅”中含着剪不断的“文”的韵味和内涵。他极爱中国书画,讲究诗书画三者相通的神韵,但对中国文化的长处和不足,心里却是极清楚明白的。

乐民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几幅最著名的杰作的永恒价值,在于昭示着欧洲正在心情激越地向死气沉沉的中古告别……而拉斐尔笔下的圣母和耶稣,尤其是世间最理想、最令人向往的母性和人性的回归……文艺复兴使人的理性跃动起来,它预告新世纪的启动。中国艺术品最缺少的,恰恰正是这种体现时代变革的内在精神和形象表征。从中国美术史里,风格、神韵的分殊差别固然可以表现时代的不同特色,唐宋元明清风格各异,但都没有向昨天告别、向新世纪招手的迹象。”多么精彩!



乐民兄在告别人世之际是心有牵挂,言犹未尽的。他在2008年11月12日“给没有收信人的信”的绝笔中写道:“我个人最难说的事,就是在有生之年(还有多长?)修订《欧洲文明》的两本书,最近几年我又积累不少思想……我感到我正在向某种‘历史哲学’迈步。”他还说,他在思想上已进入了新的“转变时期”:“就是从把西方文明‘理想化’转向把它看做更为繁难的‘历史哲学’,而不是把它简单地‘模型化’。例如美国民主、法国民主、英国民主等等,都是由西方文明出发的‘摹本’。我晚年想做而可能做不成的问题,就是探索西方文明何以产生出这么多‘摹本’……”又说:“古今中外,我服膺的人只有康德。他使我理解了天下难解之事,也使我了解自己……我现在已是斗室中的‘世界主义’者了(指康德的理念——本文作者注),羽化登仙,大概是一个老人最入迷的境界。”

“但是岁不我与,照现在情况看,很可能做不出什么,终于将是一桩遗憾的个人‘牵挂’。”——

新书推荐

## 官场怪圈定律



剖析官场迷魂阵,透视千年权术史,《官场怪圈定律》是一部使政治家沉思、官员猛醒、百姓喝彩的盛世危言。

每一个对中国官场现象困惑不解的人,每一个研究中国兴亡历史的人,每一个关心中国未来命运的人,都应该关注这样几个大问题:天下大势为什么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为什么治乱循环,鼎盛时万国来朝,衰败时异族入侵?几百年来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世界闻名的科技发明创造?民主政治为什么不能在近代中国成功?曾经伟大的中华民族怎样才能继续伟大?这一个个历史的大怪圈,根源于官场上无数发人深省的小怪圈:谁变蝎子谁蜇人、忠臣没有好下场、老鼠胁猫猫变鼠、杀鸡吓猴猴更狂、严刑峻法难治贪、木匠做枷夹木匠、清官难逃猾吏手、官逼民反政权亡……

现任享有“一座内乡衙,半部官文化”之称的河南省内乡县衙博物馆馆长的李茗公,以杂文手法和讲故事的形式,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撰写了这部四十多万字的《官场怪圈定律》,而且还配了三十多幅尖锐搞笑

在写这些时,离他告别中筠大姐和家人,告别朋友、告别人类和告别他倾心相许的人间学问,已经只有三十六天了。

像乐民兄这样地地道道的读书人,这样汇萃中西、今古文化于一身的人文学者,这样的中国传统的艺术根底,这样的超乎物外、身体力行的启蒙者,难道真成绝响?难道我们真可以听任其成为绝响?

本文为纪念乐民先生而作,以他自己的话作为本文的未结束语:

我经几十年的反复思考,“站在东方看西方”,只弄明白了一个简而明的道理:我挚爱的祖国,多么需要一种彻底的“启蒙”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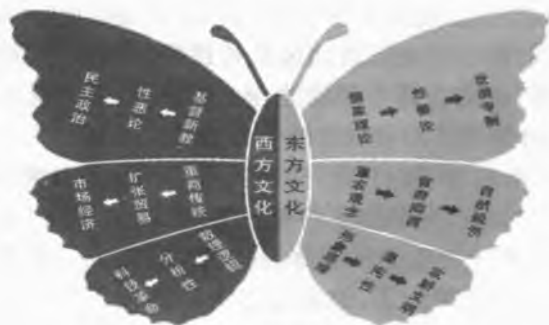
我只能维持自己的良知和作为学者的责任感,至于这种良知和这种责任感究竟有没有客观效果,我无能为力。我只能说——我尽力了!

2009年11月

(作者为湖南省教委原党组书记、湖南农学院原副院长) (责任编辑 李晨)

的彩色漫画插图,从研究昆虫动物界的权力金字塔入手,对传统文化导致的官场弊端进行了颠覆性阐释。

中西传统文化基因的不同,造成了政治制度的差异。东西文化的主要脉络和根本差异,可简化成一只对比鲜明的蝴蝶结构。附图:



东西方传统文化演绎对比图

若问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若问来世果,今生做者是。所谓定律,是指为已经被实践和事实所证明的,反映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的论断。《官场怪圈定律》开出的药方是:只有修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缺陷,汲取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接受普世价值,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的经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民主法制。从官场运行机制上进行改革,改良了中国官场运行的文化土壤,才能从根本上破解这些官场怪圈定律,中国的政局才能长治久安,中华民族的明天才能繁荣辉煌。(价格及汇款地址见本刊第47页)

# 胡耀邦救了我一家

● 姜达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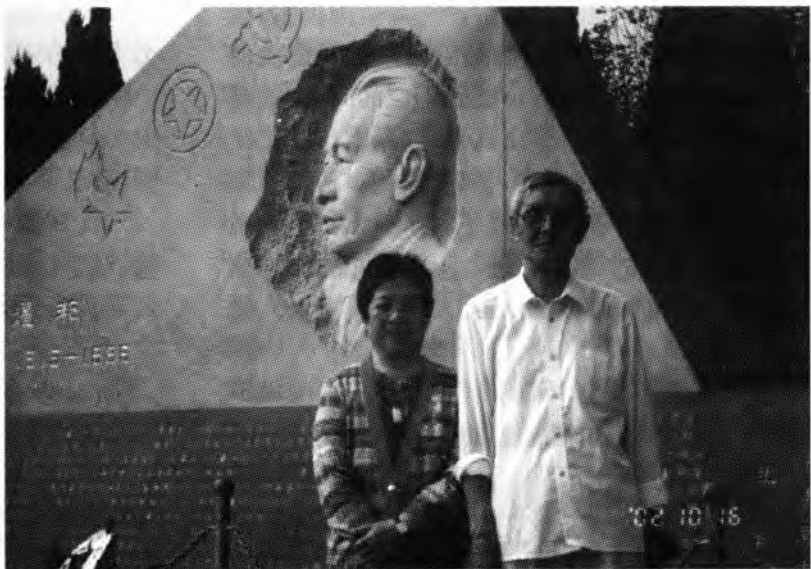
1954年我与爱人赵维田分别在团中央和中国少年报社工作。老赵是党员,我是团员,三个孩子是少先队员。这是一个奋发向上、幸福美好的家庭。

没料到1967年风云突变,在那个黑暗、恐怖的年代,颠倒黑白,无中生有,我的家也在劫难逃。老赵被打成反革命,漏网右派、叛徒、特务的帽子戴了整整10年。其实,他是南京地下党员(中央大学学生),曾于1948年被捕,但他矢志不渝,被营救出狱后仍坚持斗争,以实际行动迎来了南京的解放。这在1955年肃反审干时,早已有结

论。可悲可叹的是学生出身、经历简单的我,不久也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诬陷我14岁(读初二)的时候,担任过比三青团区队长还要大的官,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荒唐之至。3年后,因查无实据,才解除了对我的专政。

但是“风霜刀剑严相逼”,没想到在云南建设兵团的女儿赵薇患了精神分裂症,在病中被打成反毛泽东的现行反革命。闻讯后我有如五雷轰顶,简直快要疯了。这真是奇耻大辱,她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考初中的作文《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文笔流畅、热情洋溢,获得语文98分(数学100分)的优异成绩,考取北京市重点中学女二中。当年,她仅有15岁,本可以不去插队,是积极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写下血书争取去的。如此热爱毛泽东的孩子,怎么会是反革命呢?!

第二年,她被摧残得病情加重了,生活不能自理,兵团为了甩包袱,将她送回北京,一推了之。当我与她重逢时,眼前的她与过去判若两人:过去,她聪明、文静、漂亮,而眼前的她,双目痴



作者夫妇拜谒胡耀邦墓

呆,疯疯癫癫,自言自语自笑,没有片刻的安宁。作为母亲,我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为了治好她的病,我四处奔波、求医求药。但高昂的医药费(每月100多元,而我月薪仅有78元)全家不吃不喝也支付不起。政治上蒙冤,人格失去了尊严,加上债台高筑,我真扛不住了,曾想自缢,求个解脱。但一想到老赵,他劳动繁重,吃不饱,靠我补贴粮票,3个孩子中最小的才12岁,没有娘怎么活?我走投无路,不得不去找老赵的领导——团中央书记胡耀邦。那时,他的处境并不好,造反派勒令他闭门思过,说他“走资派还在走”。

一个初夏的上午,我找到了耀邦家,门前冷冷清清。我悄悄地走进他的书房,只见三面墙壁全是高大的书柜。50年代我曾听说,他作报告,宣传鼓动性很强,据说与他挑灯夜读,博览群书有关(说他困了就用冷水浇头)。真是“百闻不如一见”,眼下,他身处困境还能安下心来读书,我由衷地钦佩敬仰。

是我的脚步声惊动了了他,他抬头问:“你是

谁？我不认识你。”我说：“我是赵维田的爱人。”他听了微笑着招呼我坐下。没想到他是那样平易近人，我见他就像见了亲人一样，一诉衷肠。当他听到赵薇在病中，双手被绑吊在橡树上鞭打，至今手腕仍伤痕累累，惨不忍睹时，他沉着脸站起来说：“简直是法西斯兵团！”当他听到赵薇受摧残致使病情加重，生活不能自理，兵团甩包袱，一推了之时，他义愤填膺，右手握拳说：“我要为青年一代打抱不平。”他同情地给我出主意说：“首先，要求平反，这样才能解决治疗费，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当时一听“平反”二字，我简直吓了一跳，那年头是要冒杀头危险的。再一想，耀邦说得对，平反才是唯一的出路。他大智大勇，敢挺身而出，打抱不平，作为孩子的母亲，孩子的监护人，我还有什么好害怕的。耀邦的一席话，点燃了我要活下去的希望和申诉的勇气。

关于怎样写申诉书，他手把手教我说：“中央首长很忙，年纪又大，因此，申诉信要简短，不要超过500字，用毛笔写正楷，字写得大一些。”临别时，还叮嘱我：“要兵团负责赵薇的治疗费和生活费，一直负责到病痊愈能参加工作为止。”

耀邦给我做主的信息不胫而走，亲友们胆子壮了，纷纷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当时中国青年报社社长余世光要帮我写申诉书，胡克实同志有哮喘病，但仍带病领着我去了王府井购买特效药……

在那漫长的黑夜中，我仿佛看见了一线曙光。

不久，我持申诉信来到了耀邦家。他看完以后，挥笔写了一封介绍信，内容是：王震同志，今介绍姜达雅同志来你处，她持有申诉书，请接待。最后署名胡耀邦。那字迹流畅而又苍劲有力。没料到红小鬼出身的他，竟写得这样一手好字。令我喜出望外的是，信中居然称我为同志。当时，在有些人的心目中，我是“反革命家属”和“有历史问题的人”，可老首长却称我为同志，这对我是多大的安慰和支撑！

当天，我兴冲冲地来到了王震同志家。他看了耀邦的信与我握手说：“你个人不幸，家庭不幸，不过孩子回来了总是好事，有的还被打死在外地。”当时，王震是国务院业务领导小组组长，

他在我申诉信上作了批示，批转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办公室处理。从此，由北京市东城区知青办公室负责人宋常生出面和我一同去与兵团交涉。虽然阻力很大，但每次交涉都能解决部分治疗费。

四人帮粉碎后的一天，老赵去看胡耀邦。耀邦关切地问：“你怎么样？”老赵委屈地说：“被专政了10年，还不平反，看来阻力很大。”耀邦听了站起来，右手挥拳激动地说：“你给我挺住，坚决地给我挺住！”他愤然地说：“全国像你这样的，不是10万、40万，而是上百万。”

回到家来，老赵精神焕发，仿佛打了一剂强心针。他喜形于色地告诉我，赵薇平反有希望了。我诧异地问：“你听谁说的？”他说耀邦已亲自出面要云南省委书记李启明伸张正义，为赵薇平反。果然不久，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传来了为赵薇平反的消息。我惊喜地问自己：时隔6年了，他怎么还记得赵薇，他为啥亲自出面为她平反？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曾经说过：“我要为青年一代打抱不平！”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耀邦恢复工作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老赵的沉冤才获得昭雪。从此，我们一家人才从苦难的深渊中被拯救了出来。胡耀邦是我家的大恩人，大救星。全家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十年浩劫过后，除了赵薇因受迫害终身致残，做了时代的牺牲品之外，我们一家人对过去的创伤没有一声叹息，相反却是奋发图强，努力成才。届时年已52岁的老赵转业学国际法，著名国际法专家、北大教授赵理海说：“你曾是南京市学生运动的领袖，搞了多年团中央的工作，转业是得不偿失的。”但老赵不畏艰难，他前十年磨一剑，写出《国际航空法》（54万字，台湾水牛出版社1991年出版），该书填补了我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空白，是航空界的经典之作，至今仍被人奉为该领域的旗舰。赵理海赞叹不已，指定该书为学生必读课本。后十年他又磨一剑，专著《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2000年出版后，被举为“中国WTO的理论泰斗”。他是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国际法专家、博士生导师、中国WTO法律研究会第一副会长。中央下发红头文件特聘他为对外经济贸易部WTO法律顾问。小女儿当年才15岁，因受家庭株连（下转51页）



# 民主的对立面不是专制吗

• 胡 湘

邵建先生在 2009 年第 9 期《炎黄春秋》上发表《民主与专制的百年迷途》一文，旨在颠覆近百年来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一个观点，即“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他认为，所谓“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乃是由《新青年》导出的“一个政治学误区”，甚至可称之为“一个百年迷途”。在他看来，“民主与专制”不是对立的观念，真正和“民主”对立的观念是“君主”，而真正和“专制”对立的观念则是“立宪”。

我是抱着很大的兴趣去拜读此文的，但看完后的感受是，作者对民主与专制相互关系等问题的解读，在概念、逻辑乃至认识历史的方法论等方面都有值得商榷之处。

## （一）

“民主与专制”作为一个范畴中的概念，其对立和相反的意味本是十分明显的。所谓“民主”，意指主权在民。在政党政治条件下，人民有权通过自由选举决定由谁来统治。美国哲学家悉尼·胡克在《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中说：“一个民主的社会是政府依靠被统治者自由地表示同意的一种社会。”这个定义的关键在于“自由地表示同意”。在刺刀尖下、在信息来源受限或者在没有选择余地的情况下所进行的选举和决策，都是不折不扣的“伪民主”。只有人民在“自由地表示同意”的情况下选举出来的政府或制定出来的政策，才可称之为民主政府或民主决策。所谓“专制”，则指由个人、阶级或政党依靠暴力强制性地垄断政权，暗箱操作式地进行决策，不容他人染指和参与。有些专制主义者如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等也会表演“民主秀”，但据说其得票率可达到不可思议的百分之百。这距离人民“自由地表示同意”的要求不啻相

差十万八千里。在这里，民主与专制相互对立的意味难道还不够显著吗？

邵文之所以要破除“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的陈见，是因为他从梁启超的著作中发现了“民主的专制国家”这样的概念。他认为，既然世上存在过“民主的专制国家”，那么民主与专制就不一定是对立的。这方面的突出例证就是德国的纳粹党凭选票而上台。他由此对梁启超大加赞赏，认为提出“民主专制”或“民主的专制国家”，不失为梁启超的独特贡献。

我在这里想特别强调的是，所谓“民主的专制国家”乃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概念。世上没有这样的国家，倒是“伪民主的国家”或“以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国家确实存在，如纳粹党统治的德国和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都热衷于拿纳粹党通过选票上台说事，以证明民主亦可导向专制，民主与专制并非势不两立。实际上，希特勒的纳粹党夺得政权，离不开德国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希特勒充分利用一战失败后德国民族的耻辱感以及经济大萧条所带来的绝望心理，以种族主义蛊惑民众。但那时德国人对希特勒表示怀疑和失望的也大有人在。在选举过程中，希特勒派遣其党卫军胁迫民众，破坏其他政党的集会，明显违背了军队不干预政治的民主通则。早在纳粹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前的 1930 年底，其冲锋队和党卫军即达十万之众。在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淫威之下，民众又如何“自由地表示同意”？况且，纳粹党在议会选举虽然成为大党，但并未取得组建政府必要的多数。希特勒在不具备组阁权的情况下出任总理，是老迈昏聩的兴登堡总统在旧势力的压力之下与希特勒通过一系列幕后交易达成的，所以早有学者指出：“兴登

堡认为如果不让希特勒当总理,他将离开联合,任何人组阁都将难以控制他和他可以积聚起来的破坏性力量。兴登堡等人的盘算是给希特勒当总理的甜头,但内阁成员中纯粹是少数,这就把希特勒约束住了。”所以“与其说是希特勒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勿宁说是一场合谋政变助他取得政权,更合乎真相。”(肖雪慧:《苏格拉底之死和希特勒上台说明了什么》,见《书屋》2008年第7期)希特勒上台后,随即钳制舆论,取缔其他党派,清除魏玛民主政府的一切民主痕迹,从而建立起现代历史上一个标本式的专制独裁政权。把纳粹德国称为“民主专制”或“民主的专制国家”,纯粹是一种想像中的虚构。

邵建先生认为真正和“民主”概念相对立的概念是“君主”,而真正和“专制”对立的概念是“立宪”。这样的厘定看起来似乎颇有新意,但问题是,君主制被推翻之后并不意味着就实现了“民主”,继君主制而起的强人政治和独裁政治(包括阶级和政党的独裁),同样是与“民主”相对立的。再者,现代有些保留“君主”名目的国家,如英、日等国,恰恰又在本质上实现了“民主”。因此,“民主”与“君主”之间构不成一对严格的矛盾关系。同样的,“专制”与“立宪”的关系也较为复杂。专制政权有的是“君主专制”,有的是“阶级或政党专制”。前者是一种有限专制或开明专制,如古代西方国家的君权便受到教权、领主权的制约,即便在古代中国,“君主专制”亦是有限的,乡绅文化或隐士文化都能发挥其独特作用。后一种专制则为“极权主义的专制”或草根主义的专制。其国家权力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的全覆盖。在一些君主专制的国家,如早在13世纪的英国,便有了“立宪”的实践,而现代极权专制的国家也讲究“立宪”,纷纷以宪法规定国体和政体。因此,“专制”与“立宪”同样也构不成一对严格的矛盾关系。

“立宪”与宪政既有联系也有差别。宪政必有宪法,但有宪法则不一定有宪政,像极权专制的国家便是如此。宪政是民主的本质属性,追求民主必然追求宪政。所谓宪政,其特征有如下几个:一是规定人民的各种权利并将其落到实处,任何一种利益都不得排斥其表达要求,纵使这些要求在民主程序中也许会取得妥协和遭到拒绝;二是建立有限政府,实现立法、行政、司法的分立和相互制

衡;三是要确立违宪审查制度。

历史上的君主专制政体或者演变为“君主立宪”政体,如英、日等国,或者演变为“民主共和”政体,如法、美等国,而现代极权专制一旦倒台,则一般地成为“民主共和”政体。专制与民主的对立关系不容置疑。实现了民主,就意味着专制不复存在。如果专制仍然存在,那实现的一定不是真民主,而是“伪民主”、“假民主”。历史上的一些独裁者如希特勒、斯大林等人并非不懂真正的民主为何物,问题的实质在于他们不爱民主,仇视民主。懂得民主而又仇视民主的人物一旦上台,其推行专制的手法更为五花八门,其实行专制的程度更远在古代君主之上。极权专制的国家经常以“为人民”的名义残民以逞,经常以“民主”的名义将统治者的意志强加于人。在这些国家,“民意”既被虚化又被崇拜,既被漠视又被利用。真是运用之妙在乎一心。

## (二)

邵建一文的漏洞,还表现为它将民主与立宪视为反专制的两种方式,认为民主就是主张革命,立宪就是主张改良。实际上,近代历史上的反专制,只有革命和改良两种方式,两种方式的都是追求民主与宪政。历史上的民主主义者并非都是暴力革命论者,而立宪(宪政)除了改良也可通过革命的方式而达到(如美国)。邵建先生将民主和革命划等号,将改良与立宪划等号,是明显地将问题简单化和绝对化了。

不仅如此,在革命和改良这两种方式上,邵建先生明显呈现出对改良的偏好和对革命的厌弃。他将英国的“光荣革命”视为最为理想的改良,而对法国大革命则多有指责,其理由是这场革命导致罗伯斯比尔的暴政。这样一种偏好改良和厌弃革命的思维方式,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一种时髦,其中的代表作有李泽厚的《告别革命》、朱学勤的《理想国的覆灭》等。在这种思维方式支配下,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暴政被无限地放大,而其正义性和《人权宣言》、1891年宪法等思想遗产的正面影响却被忽视了。实际上,英、法两国的历史背景大有不同,法国没有英国那样悠远的议会传统,而法国的君主专制又是当时欧

洲国家中最为残酷的。法国人的生活远比英国人悲惨。法国大革命前夕,国王路易十六的反动统治激起社会各阶层的愤怒,当民众特别是第三等级感到活不下去的时候,革命难道不是他们的正当权利?不可否认,法国革命后导致了短暂的暴政,但最后法国成为典型的民主共和国,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拜大革命所赐。

在历史上,就革命来说,也有非常成功的事例,如美国的独立战争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美国不仅借革命获得了独立,而且确立了民主政体,被马克思称为当时世界上最完美的民主共和国。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伟大的政论家托马斯·潘恩说:“如果美国的独立不能伴随一场对政府的原则和实践的革命,而只是从英国独立出来,那就太渺小了。”他大声疾呼:“让我们为宪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正是有华盛顿、杰斐逊等一批杰出的政治家高瞻远瞩,才通过一场独立战争确立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华盛顿拒绝手下拥戴其为国王的建议,其对民主的真诚爱戴使他成为美国人心中最伟大的总统。美国正是通过革命实现了民主和宪政,而邵建先生对美国革命却存而不论,显然有失偏颇。

回过头来再看中国。清朝末年,以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形成对峙。清政府在强大压力下“预备仿行宪政”,但却将时间一拖再拖。“皇族内阁”等丑剧的出现,击碎了国人关于君主立宪的梦想,这才有了辛亥革命的最终登场。我们不能因为辛亥革命之后不久中国陷入军阀混战而否定辛亥革命的正当性。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动摇国本之后,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描绘了中华民国的政治蓝图,确立了“限权”和“分权”的原则,是在中国实现民主和宪政的基本纲领。实际上,在民国初年的政坛上,确也出现了许多积极的气象,以宋教仁为首的国民党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共和党在国会中形成竞争格局。如果不是袁世凯这样的乱世枭雄破坏《约法》,帝制自为,如果不是“流质易变”的梁启超鼓吹所谓“开明专制”,中国社会完全有可能走上宪政民主之路,避免军阀混战的局面。这样的机会不仅民初政坛上存在,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也同样存在。问题是,中国出不了华盛顿式的伟大人物,倒是盛产袁世凯、蒋介石这样嗜权如命、唯我独尊的乱世

英雄,民族和国家才因此艰祸繁兴,未有穷尽。

在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高潮期,《新青年》杂志应运而生,旗帜鲜明地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而邵建先生却说:“在政治学的识见上,《新青年》及其时代,委实是梁启超时代的倒退。当年,梁启超解决了的问题,《新青年》却又把它搅混了。”邵建先生对梁启超情有独钟,认为他以立宪反专制的方法不仅现实可行,而且“对历史的未来有着惊人的洞见”。相应的,《新青年》以民主反专制,则大不合时宜,是对梁氏思想的反动和倒退。他还遗憾地表示:“然而,在精神影响上,主导20世纪的,不是梁启超,而是《新青年》(亦即不是政体的改革,而是国体的革命)。”

民国初年的政坛,本已呈现出实现民主和宪政的希望。那时候并非没有宪政的一整套构想,被称为“中国的杰斐逊”的宋教仁先生一直在坚持《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原则,而袁世凯及其追随他的共和党却一再批评《临时约法》束缚总统行政权力,影响行政效率,因而谋求修改宪法,向强化总统权力的方向发展。而恰在此时,梁启超发表《宪法之三大精神》,公开鼓吹开明专制,实际上是主张在共和的名义下行独裁专制之实。梁启超的行为,明显违背“宪政”精神,还哪里谈得上以立宪反专制?袁世凯利令智昏,1913年11月宣布取缔国民党,国会因达不到开会的法定人数而形同虚设,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由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组合而成)也失去了存身之地。1914年3月,由袁世凯指定的60名议员制定《中华民国约法》(“袁记约法”),确立了总统独裁的政治体制。后来袁世凯又在筹安会诸人的怂恿下着手恢复帝制。

试想,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新青年》以民主反对专制,何错之有?怎么就是在梁启超思想基础上的倒退?1915年底,连邵建先生赞美有加的梁启超也发起护国运动推翻袁世凯,邵建先生却对此视而不见,反而指责《新青年》鼓吹民主就是煽动革命,为国民运动推波助澜,这是什么样的逻辑?袁世凯之后的中国,军阀混战,武人当道,民国初年宪政框架下的政治设施被严重破坏,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尽管其思想发生了诸多变化,但其三民主义所蕴含的宪政理想仍然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

十多年来,包括邵建先生在内(下转32页)



# 也谈刘少奇骨灰的保存和查找

● 黄家生

《炎黄春秋》2009年第12期刊登刘立强的文章《刘少奇的骨灰是如何保存下来的》(以下简称《刘文》),对原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文甫生前写的一篇文章《查寻刘少奇骨灰经过》(以下简称《赵文》)提出了不同意见。读完全文,给人的强烈印象是:赵文甫抢了作者父亲刘建勋(“文革”期间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功,而且由于赵文甫逝世后此事还被写入了赵的生平,致使中央也不得不将错就错,无法予以纠正。

刘少奇骨灰的处置和保存,虽然是刘少奇的身后之事,但也是刘少奇生前遭受残酷迫害的延续,是他受迫害全过程上的一个部分,因此也不可谓之小事;同时事涉两位高级干部,看来确有必要搞清事情的真相,免得许多年后,又成了一件让后人莫辨真假的公案。

《刘文》说:1975年一军换防离开开封时,在刘建勋的周密安排下,将刘少奇的骨灰保存在“河南省委档案处”。《赵文》说:刘少奇的骨灰是1979年3月5日赵派人赴开封,于第二天(3月6日)取回郑州,在当时刘少奇尚未平反的情况下,秘密保存在赵办公室的保险柜里,一直到1980年5月刘少奇平反大会前迎回北京。现在,刘建勋、赵文甫和另一重要当事人、时任河南省委副秘书长的霍云桥均已辞世。

那么,《刘文》、《赵文》究竟孰是孰非呢?

为了弄清事情真相,笔者找到了开封火葬场关于存放刘少奇骨灰的登记表。登记表上清楚地记载着:刘少奇(当时被专案组有意写成刘卫黄)的骨灰1969年11月14日由8172部队送存,申请人写的是刘少奇的儿子刘原,编号123,寄存年限3年,1972年11月14日第一次续存3年,1975年11月14日第二次续存10年。登记表的上方醒目地写着一行字:“1979年3月5日夜11时半取”。这就是霍云桥于1979年3月5日根据赵文甫的指示取走刘少奇骨灰时留下的记录。据一位采访过霍云桥的同志告诉我们,霍云桥生前曾明确地证实了这个日子,并详细地回忆了当时取骨灰的情景。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最近也回忆了当年他们家人查找刘少奇骨灰的经过:1979年2月出狱不久的王光美住在中组部翠明庄招待所。一天,来京开会也住在这里的赵文甫前去看望,谈话中不约而同地都谈到了查找刘少奇骨灰的事。不久,家人了解到刘少奇的卫士长李太和是身边工作人员中唯一护送刘少奇到开封并参与后事处理的人,于是辗转与李取得了联系(当时李已调往安徽合肥某部队工作),李很快赶到北京向王光美等报告了刘少奇后事的有关情况。李太和回忆了刘少奇骨灰盒的编号“123”,以及骨灰盒的形状、颜色,还说红色的骨灰袋上还印有四个字——“移风易俗”。末了李太和焦急地

1979年3月5日夜11时半取

开封市火葬场 编号: 123

申请人: 刘原	变更申请人:
地址: 8172部队	地址:
变更申请人:	变更申请人:
姓名:	姓名:
死者姓名: 刘少奇	寄存日期: 1969年11月14日
寄存年限: 3年	续存日期: 1972年11月14日
续存年限: 3年	续存日期: 1975年11月14日
续存年限: 10年	续存日期: 1985年11月14日
续存年限: 10年	续存日期: 1995年11月14日
续存年限: 10年	续存日期: 2005年11月14日
续存年限: 10年	续存日期: 2015年11月14日
续存年限: 10年	续存日期: 2025年11月14日
续存年限: 10年	续存日期: 2035年11月14日
续存年限: 10年	续存日期: 2045年11月14日
续存年限: 10年	续存日期: 2055年11月14日
续存年限: 10年	续存日期: 2065年11月14日
续存年限: 10年	续存日期: 2075年11月14日
续存年限: 10年	续存日期: 2085年11月14日
续存年限: 10年	续存日期: 2095年11月14日
续存年限: 10年	续存日期: 2105年11月14日

说,他记不清存放期是多少年,担心过了时间火葬场会将骨灰自行处理,再三叮嘱要抓紧查找。于是,刘源紧急联系当时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段君毅和刘杰同志,但不巧两人都下乡了。于是他电话联系上了赵文甫的秘书,请他尽快向赵报告李太和提供的重要情况。刘源说,他记不清具体过了几天,很快赵文甫就电话回复说,骨灰已从开封火葬场取回,保存在他的办公室。赵文甫所述骨灰盒的样式、颜色与李太和提供的完全一致。在问到骨灰袋上的字时,刘源故意留了一手,只问骨灰袋上是不是还有几个字,而没有说明是什么字。当听到赵文甫说是“移风易俗”时,他和母亲才舒了一口气,确认找回的是刘少奇的骨灰。

刘源还回忆说,1982年他大学毕业到河南工作,有一次在省委赵文甫的办公室,赵还打开保存刘少奇骨灰盒的保险柜给他看,赵的秘书在

一旁说,他也到开封参加了取骨灰。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赵文》陈述的查寻刘少奇骨灰的过程是正确的,而《刘文》所说刘建勋“冒风险、选准人、巧安排、严保密,最终圆满、妥善地处理了刘少奇同志骨灰的交接、保存难题”,指示“一定要把刘少奇同志的骨灰‘送到省委档案处安置存放’”等,是不符合事实的。

最后,再提供个情况:当时(1979年)的河南省长刘杰,当年(1969年)装殓刘少奇骨灰的李太和,都还健在。他们都可以提供相关重要证明。

说来也真让人感慨,这才过了多少年,现在连刘少奇“文革”中是否遭受过残酷迫害,都开始有人提出疑问。而围绕刘少奇骨灰的保存和查找出现的不同说法乃至于争论,再次提醒我们,不仅要努力维护历史事件的真相,更重要的,决不能让那个悲剧时代的教训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淡化、湮灭甚至颠倒!

## 来信照登

### 还历史本来面目

《炎黄春秋》编辑部:

我是一名基层离退休人员,今年82岁了。最近看了《炎黄春秋》2009年11期《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和2010年第1期《对(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一文的批评》、《刘少奇是被迫害致死的》等文章,感触颇深。愿借贵刊一角,谈谈自己的几点意见。

首先我认为,贵刊编辑部把不同观点、不同论据的文章,原汁原味地摆在读者面前,不仅是尊重作者,而且也是对读者的尊重。兼听则明。读者自会去比较、思考,从而把问题引向深入。何况编辑对文章的论据也不可能一一去查核,只能由作者“文责自负”。所以,我以一名读者的身份,肯定编辑部的这一做法,期望有这方面的文章继续问世。

其次要说明的,我虽不是刘少奇专案高层知情人员,也不是接触到刘少奇去世前后的有关监管、医护、运输等工作人员,不可能写出关于刘少奇之死的有分量的文章。但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是入党多年的老党员,又亲身经历过文革,从关心国家大事的角度出发,有权利和义务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来龙去脉提出质疑。我赞同《炎黄春秋》2009年第12期上《不该忽略的大事》一文的观点,建国60周年历

程,应该全面回顾。伟大光荣正确的光明一面,固然应该大书特书,错误过失的阴暗一面,也应该秉笔直言。否则,共和国史中缺了文革十年,岂不成为不完整、不连贯的“断代史”吗?堂堂国家主席,以“莫须有”罪名,突然成为阶下囚,含冤而死,能说不算一件大事吗?

刘少奇之死,已有平反结论,似乎不必再翻旧账,但很多细节,尚有待厘清。例如:对生命垂危的刘少奇在抢救中是善待,还是虐待?有没有大小便在病床上,不给换洗衬裤?刘去世后火化,为何要用“刘卫黄”之名?医疗救治中的干预,是谁在指使?等等。这些疑点的澄清,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吸取历史教训,才能深刻地知道“以人为本,依法治国”的重要。我诚恳地希望,凡是接触过刘少奇冤案的有关人员和刘少奇亲属,应该勇敢地站出来,讲实话,让广大读者了解真相。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不断总结和运用自身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全党提倡独立思考、敢讲真话的精神,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和看法,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我衷心祝愿,贵刊在改革大潮中脱颖而出,独具时代特色,继往开来,成为敢讲真话、敢讲心里话的广大民众心目中的一面旗帜。在党和国家复兴之路的跋涉中,迎风飘扬,永不褪色。

于2010年元月12日  
南京读者 杨军

# 韩国腐败文化与廉政建设

● 詹小洪

## 一、韩国腐败概貌

### 1. 国际组织对韩国腐败的认知

反腐败国际非政府机构——国际透明性机构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简称为 TI) 自从 1995 年开始, 每年都会发布按国家排列的“国际透明性机构腐败认识指数”。以 10 分为满分, 数值越趋近于零, 排名越靠后, 就说明越腐败; 反之, 数值越高排名越靠前, 表明越廉洁。4 分以下表明整个社会都很腐败, 而 7 分以上则说明整体上比较廉洁。

TI 每年都以世界银行和“世界经济论坛”等 7 个独立机构, 以及各国的专职经营人员、公务员、银行职员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该指数是以综合分析这些问卷调查为基础编制的。问卷调查内容包括: 世界银行等 12 个目标机构的受贿情况、外国企业在该国的经营环境、政界人士及公务员的腐败情况、办事效率、进出口商品通过海关时需要提供的非法费用等。

本文根据韩国报纸披露的 TI 零星资料, 制成下表。从表中不难看出, 除 1999 年得 3.8 分

外, 韩国总体上处于 4—7 分, 排名多在 40—50 位, 属于中等程度腐败国家。而且有朝廉洁国家发展的趋势: 得分逐渐提高, 排名趋于靠前。

韩国自从 1996 年加入富国俱乐部即国际经合组织(OECD)以后, 自诩为发达国家的一员, 什么排名总喜欢放在 OECD 成员国中比较。如果说在全球排名中, 韩国腐败指数还算中等的话, 那么在 30 个 OECD 成员中就算腐败程度相对很高的国家了。在能够得到的几年资料中, 韩国都处在 22—24 位。就是在韩国得分最高的 2008 年的腐败指数中, 韩国为 5.6 分, 也不及 OECD 平均得分的 7.11 分。更使韩国民众难以释怀的是, 韩国的清廉国际排名远远低于在东亚的经济竞争对手: 2008 年, 新加坡(9.2 分, 第 4 位)、香港(8.1 分, 第 12 位)、日本(7.3 分, 第 18 位)、台湾(5.7 分, 第 39 位)。

2005 年, 有个韩国学者就 2004 年的 CPI 指数发表评论说, 韩国的得分和排名(反映社会的腐败程度)与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国民收入极不相称。2004 年, 韩国人均 GDP 超过 1 万美元, 而腐败程度(以 CPI 的得分和排名来衡量)与人均 GDP5000 美元的国家不相上下。

另一个韩国经济学家撰文, 不无感慨地说, “如果韩国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减少到日本的程度, 那么经济年增长率将会提高 1.4—1.5 个百分点”。

### 2. 韩国民意中的韩国腐败

韩国国内民众又是如何评价自己国家腐败的呢? 下面笔者根据韩国主流媒体披露出来的资料力图给读者勾勒出一个轮廓。

韩国在历年国际腐败指数 (CPI) 的排名表

年份	参排国家数	韩国得分	国际排名	在 30 个 OECD 成员国中排名	备注
1995		4.29			
1999	99	3.8	50		
2000	90		48		
2001	91	4.2	42		
2002	102	4.5	47		
2003	133	4.3	50	24	中国排 66 位
2004		4.5	47		
2007		5.1	43	23	
2008	180	5.6	40	22	OECD 平均 7.11 分

本表系根据 2001—2009 年[韩]《朝鲜日报》中文网资料制作



在每年都公布的韩国国内十件大事中,2000年“金融腐败”列第七件,2001年“贪污腐败层出不穷”也榜上有名。

2002年9月,韩国市民组织“反腐败国民连带”以首尔等12个城市3017名中学生为对象进行社会腐败程度的调查,结果令人震惊。被调查的韩国的青少年中,92%认为韩国是“腐败的国家”。至于腐败主因,有53%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政界的不正之风,19%认为是地缘和学缘。甚至28%的学生认为,“如果贿赂能够解决问题,就要爽快地送礼”。调查组织者痛心疾首地评论道,“我们的社会泛滥着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极端拜金主义”;不无担忧地说,长期以来,“韩国社会成为人们精神依托的道德、信义、礼节、友情、尊敬、孝道、忠诚”现在都“开始土崩瓦解”。

韩国青少年潜意识中的腐败观念,远远超过经济发展水平大大低于他们的落后国家的同龄人。2008年11月,国际透明组织(TI)对韩国、印度、孟加拉和蒙古4个亚洲国家的青少年进行了反腐败意识指数调查,结果韩国在满分10分中获得6.1分,是4个国家中倒数第一。国际透明组织表示,四国青少年比较之下,韩国青少年的反腐败意识十分薄弱。如果对这种现象袖手旁观,韩国就不能进入“清廉的发达国家”行列。

2003年6月,直属于韩国总统府的反腐败委员会以1400多名普通人进行民意调查,其结果有16.1%受调查者认为公务员“非常腐败”,42.1%受调查者认为“比较腐败”。共有58.2%的受调查者认为公务员腐败。在“最腐败的行政领域”内,受调查者回答:建筑75.3%、税务61%、法律事务58%、警察55.4%、国防及兵役48%。

在2002年反腐败委员会发表的《2001年71个公共机构清廉度》报告,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排在第71名的竟是中央检察厅。

2007年10月,韩国“透明社会协约实践商会”委托韩国中央研究中心,就“对韩国社会腐败的认识”问题,针对全国500名普通成年人和200名政界、市民团体、媒体等有关专家进行调查,结果是,普通受调查者给出的清廉分数是4.73分,专家给出的分数是5.59分。

就腐败领域,普通受访者和专家都给政界打了最低分,分别是3.21和3.88分。就整个韩国社

会腐败程度来看,87.6%的普通受访者和76.5%的专家表示“非常严重”。就“达到清廉的发达国家所需要的时间”,回答说“十年以内”的普通受访者和专家最多,分别为42.8%和50%。回答说“五年以内”的普通受访者和专家分别为23.6%和17.5%。

### 3. 外国人眼中的韩国腐败

在韩国的外国商人、外交官对韩国的腐败也颇有微词。

韩国反腐败委员会分别以2002年12月和2003年6月,对150名驻韩国的外国商会人士和大使馆外交官进行了对韩国的腐败认识的问卷调查,结果有63.3%的受调查者认为韩国政府官员腐败。67%的受调查者认为韩国最腐败的领域是政治领域。在调查过程中,对“是否招待过韩国公务员”的提问,有15%的人做了肯定回答。在被招待对象中,财政经济部居首位。

2004年6月同样的调查中,仍有50.5%的驻韩外国商务人士和外交官认为韩国公务员腐败。这次的调查报告还深入指出,在韩国居住5年以上的外国人中,有61.3%的人认为韩国公务员腐败,居住3—5年和1—3年的人中,其比率分别为51.9%和48.9%。可见,外国人在韩国居住时间越长,对韩国公务员印象越糟。就“韩国公务员腐败的最大主因”,49.5%的外国受调查者认为是“腐败文化”,其后依次是“缺乏伦理观念”(占19.2%)、“政治结构”(16.2%)。

## 二、韩国的廉政建设

韩国政府及社会防止腐败的法律法规是完备的,对腐败的惩罚也不可谓不重。

### 1. 反腐败机构建立

2002年2月,在金大中政府时期,建立了直属于总统府的“反腐败委员会”。

2004年,在反腐败委员会下面另设“高级公务员腐败调查处”,专司调查总统亲属、国会议员、高级检察官、大法官和国家情报院高级官员的贪腐情况。

2004年底,反腐败委员会改名为“国家清廉委员会”,每年颁布“韩国社会清廉指数”。

### 2. 反腐败措施

从1993年起,韩国开始实行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由公务员伦理委员会负责监督公布。每逢公务员的财产比上年有明显增加或者反常增加,就会引起公务员伦理委员会高度关注,会要求当事人就财产剧增原因在20天内提交书面解释及凭据材料。如逾期不配合,要被罚2000万韩元(时约合2万美元)。必要时,公务员伦理委员会还会要求当事人提交近3年的财产相关资料。金大中政府以后,还将高层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对象扩大到他们的直系亲属。

金大中政府时期通过的《反腐败基本计划试行法》,卢武铉政府时期通过的《透明社会协约》,都曾规定,对腐败公务员赦免、复权及减刑政策严格掌握,加强对腐败收入的没收和追缴,授予反腐败委员会对非法政治资金进行调查和追查当事人金融账户的权力。

韩国历届政府都注意对公务员转岗就业或退休后工作的限制。如禁止因腐败而被处罚免职的公务员到相关企业就业。对正常退休或转岗的高层公务员和国会议员任期结束后,到相关领域的企业任职和就业也有限制。例如,曾任检察官和法官的人士退休后,一定年限内不得到律师事务所任职,不得受理自己在司法部门时曾分管领域的刑事案件;对因违法违纪而被撤职的公务员,5年内限制其到包括私人企业在内的有关机构任职。

### 3. 对腐败的惩罚

2008年4月,韩国政府颁布了《腐败公务员处罚强化对策》,规定对惩戒公务员的种类有:罢免、解任、降级、停职、减薪、训斥。对犯下收受钱财、接受宴请、挪用公款、贪污和腐败的公务员,惩戒的追溯的时效由过去的3年延长到5年。

韩国90%以上的腐败犯罪的审判都是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进行的。2006年该院制定并公布了腐败量刑标准:受贿超过1亿韩元(当时合10万美元)以上,将被判处5年以上的实际徒刑;5000万至1亿韩元之间3年6个月实刑;3000万至5000万韩元2年6个月实刑。实刑是指实际执行的,与缓刑相对。行贿所受的惩罚轻些,但只要超过了2亿韩元,就要无条件判处实际刑罚。对于行贿与受贿的“拉皮条者”(中介人)量刑标准为:超过1亿韩元,可判处实际徒刑。

2008年3月首尔市政府公布了《2008年首尔市政清廉度改善综合方案》,规定了极为严厉的反腐败措施:如果首尔市公务员收受企业3万韩元(时合人民币不到200元)以上的贿赂或者接受招待,不论职务高低,将立即被停职甚至免职。而行贿的企业两年内不得参加首尔市开展的各种竞标活动。此外,为鼓励首尔市民和内部人士积极揭发受贿现象,将腐败举报奖金从1000万韩元提高到5000万韩元。还实施“内部受贿揭发者身份保护宣誓制”,一旦调查人员泄露举报人身份,就会受到惩罚。

从2008年7月,韩国国务会议通过《特定经济犯罪加重处罚法》。为了杜绝公务员的腐败之风,对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公款或收受贿赂的公务员、国企干部、金融机构的干部职员在受到刑事处罚被关押的同时,还要被追讨贪污受贿金额2—5倍的罚金!这一着可真得叫腐败者倾家荡产了。

韩国也不光是惩罚贪腐的公务员,对一般市民的枉法行为也不手软。如2004年国会议员选举前,针对各种选举时的拉拢选民的买票卖票的贿选行为,检察机关规定,如果选民接受了30万韩元(时合2100元人民币)以上的财物,就会被拘留。选举委员会还通过媒体公开接受财物的选民名单,通过这些手段,来确立“在选举时接受钱财或向别人要钱,就会被社会抛弃”的法律意识。

### 4. 奖励举报

韩国在严惩贪腐的同时,大力奖励举报。早在2002年开始实施的《防止腐败法》就规定,国民举报公职人员腐败行为,因此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可获得最高达2亿韩元的奖励和彻底的安全保障。对举报腐败的奖励上限超过了举报敌谍(1.5亿韩元)和逃税犯(1亿韩元)的奖励。

走笔至此,必须说明的是,我们国家的腐败程度并不会比韩国轻,近几年的国际透明性组织的“腐败调查指数”,我国得分都比韩国低,腐败排名都比韩国靠前。我国近几年反腐败揭露和清查出来的大案要案比韩国的情况严重得多。我们决没有“一百步笑五十步”的理由。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李 晨)

## 『墨西哥奇迹』与墨西哥宪政

· 思源

墨西哥与俄罗斯,这是一个奇异的对比:

两国人口总数比较接近,都在一亿多。国土面积则相差很大,俄罗斯是墨西哥的 8.7 倍。一般理解,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应该比墨西哥强得多,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倒过来。以 2000 年为例:墨西哥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 5814 亿美元,是俄罗斯的 2.2 倍;而人均国民总收入,墨西哥 5110 美元,俄罗斯 1710 美元,前者约为后者的 3 倍。两国经济状态为何如此悬殊?

与俄罗斯形成巨大反差的还有,1940—1981 年连续 40 多年的时间里,墨西哥的经济以年均 6.1% 的速度持续增长,同时政局大体保持长期稳定,被国际上称为“墨西哥奇迹”、“墨西哥稳定之谜”。

谜底在哪?我看就在 1917 年。

1917 年,墨西哥立宪会议通过了一部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和普选原则,从此走上了虽有坎坷却顺应世界潮流的宪政之路。

1917 年,俄罗斯发生十月革命,尔后以武力解散立宪会议,否定宪政,走上了一条斯大林一个人说了算,5000 万人蒙冤的无产阶级专政之路(详见《炎黄春秋》2009 年第 11 期《俄罗斯走向宪政的大弯路》)。

此可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 一、墨西哥简史与宪政概要

墨西哥是美洲文明古国。大约两万年前,墨西哥就有人居住,处于旧石器时代。墨西哥是印第安人古文化的摇篮,它孕育了驰名世界的玛雅文化、托尔特克文化和阿兹特克文化。

1519 年西班牙殖民者侵入墨西哥,1522 年在墨西哥城建立新西班牙总督区。1810 年 9 月 16 日,伊达尔戈神父在多洛雷斯教区发动起义,拉开了墨西哥独立战争的序幕。1821 年墨西哥宣告独立。

1867 年法国、英国和西班牙入侵者被赶出墨西哥。

1910~1917 年墨西哥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定国名为墨西哥合众国。

1917 年,宪政主义者卡兰萨总统颁布了奠定国家宪政基础的《墨西哥宪法》(2 月 5 日由制宪会议通过)。这部宪法执行至今,期间虽进行过近 200 次修改,但其宪政民主方向始终没变。宪法规定:国家为总统制的联邦共和体制,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总统由直接普选产生,任期 6 年,终身不得再任。总统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执掌国家最高行政权。由参众两院组成的联邦议会是国家立法机构,主要职权有:批准条约及总统关于法院、财政、外交、军队高级官员任命;修改宪法;批准总统出访;必要时任命临时总统等。内阁是政府行政机构,由总统直接领导。墨西哥各州制定本州宪法,但州政府权力受国家根本法约束。

## 二、宪政初期组建政党(1919~1940 年)

墨西哥在走向宪政之前,有较长的地方封建割据历史。地方军阀和地方首领史称“考迪略”,相当于地方小诸侯。考迪略的惯性,一直延续到 1917



年宪法颁布之后的十多年,军人暴乱、军阀混战、破坏选举、扰乱政局。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强人卡列斯(1924~1928年任总统)开始把全国约1800个地方考迪略和200个党派团体联合起来,组建一个用以取代考迪略势力的全国性政党,以解决政权交接的制度化问题,这就是1929年3月创立的国民革命党。从此,开始了墨西哥历史的新阶段。国民革命党(PNR)是一个官方党和一个职业政治家的党。以前通过武力较量来解决的政权交接问题,现在可以在党内通过和平、合法的手段协商解决了,考迪略的个人领导地位已由政党的领导地位取代了。

1934~1940年卡德纳斯任总统期间,支持工农运动,实行与工农联盟的民众主义政策,建立工农武装,与正规军相制约,并实行竞争性考试,进一步加强军队的职业化。军队编制也缩小到49038人。此后,军队开始脱离政治斗争,专心致力于自身专业水平的提高和军人教育水平的提高,过去只听命于考迪略的武装力量,逐步变成一支国家化武装力量。

1938年3月卡德纳斯解散了国民革命党,在它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的官方党——墨西哥革命党。墨西哥革命党(PRM)的成立是墨西哥宪政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政治改革。这次改革的要点有二:一是把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广大民众吸收到执政党,纳入官方机构,把卡列斯时期的考迪略和地方首领党改造成一个有工人农民加入政治体系的党;二是把卡列斯建立的地区结构的官方党,改造成职团结构的官方党,将墨西哥国民党分成4个职业部门——农民部、工人部、人民部和军人部,形成一个广泛的、中央集权的执政党。官方党的这种职团结构,对于宪政制度的确立有两个重要意义:

第一,除了军队,党的其他3个部都有从基层到中央的垂直组织系统。

第二,进一步把军队引入制度化的轨道,避免了他们经常非法干政的弊端;同时把他们过去那种左右政局的决定性作用缩小到只有1/4的比重,并对他们严格限制。

经过民主革命后近30年的不懈斗争,特别是经过卡德纳斯的政治改革,宪政制度终于在墨

西哥基本确立起来:军人只能服从宪法政府的领导;教会和大学已同政府达成妥协;地方考迪略以及有组织的工人农民都已加入执政党;所有这些社会势力都已服从于一个强大的政治机构,权力中心已不是某个人,而是依法选举产生的总统。总统身上是“两制”结合:一方面是总统集权制,兼任执政党领袖;另一方面是总统一任制,终身不得再任。

1940年在卡德纳斯总统执政后期,墨西哥的经济出现了危机,从而又引发了选举危机。执政党墨西哥革命党内部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以卡德纳斯总统所支持的总统候选人穆希卡为首的“激进改革派”;一派是前总统希尔为首的“恢复秩序派”,他们提名当时政府的国防部长卡马乔为总统候选人,并发起了强大的竞选运动。

尽管卡德纳斯想控制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发动群众游行以支持穆希卡,但在当时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压力下,如果坚持提名穆希卡为总统候选人,就有可能使国家陷入分裂,甚至内战。最后,众参两院以多数票通过支持卡马乔为总统候选人,并在两院组织“政治行动集团”,从而避免了军队内部暴乱的灾难。一场严峻的政治危机终于过去了,1940年7月7日举行大选,卡马乔赢得了胜利,当选为合众国总统。

卡德纳斯遵照宪政程序,把国家的领导权交给了虽然不是他自己最满意的,却是依法选举产生的总统卡马乔。从此,每6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和权力移交制度化了;总统不得连选连任,以杜绝个人独裁的规定制度化了;任何觊觎总统职位的军人野心家都无隙可乘;墨西哥大众梦想了一个多世纪的宪法秩序终于确立起来。随着这一秩序的确立,墨西哥进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经济增长时代,这种增长很快使墨西哥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农业国。

### 三、宪政巩固 执政党自身制度的改革(1940~1958年)

1940年墨西哥革命党的军人部被卡马乔总统取消,标志着墨西哥历史上军人干政时代的彻底结束。

卡马乔取消军人部的决定是个人做出的,并

没有得到党的正式文件的认可,但国防部长卡德纳斯和绝大多数将军都支持这项决定。首先是因为卡马乔把他最忠实的朋友都安排在领导岗位上,这些人都坚决支持他。其次,欧洲战争的发展使许多军官认为,在战争的威胁下,军队的内部团结是绝对必要的,不能因为国内的政治斗争影响军队的稳定。再次,党的人民部的领袖们也都坚决支持,在他们看来,这一决定有助于“从一个军人政府到一个文官政府”的过渡。所谓“文官政府”自然是40年代从中产阶级中涌现出的政界人物领导的政府。所以,他们都认为,这个决定对建设墨西哥宪政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议会选举中,墨西哥革命党的人民部(主要是中产阶级)尽管数量上还是党内的少数,但在党的领导机构和新的议会中已变成多数。墨西哥革命党的性质也逐步由原来的以工农为主要依靠对象的各革命阶级联盟,变成以中产阶级为核心、以职业政治家为骨干的联盟。在选举后的第39届国会中,众议院几乎全由官方党的成员组成,在147名众议员中,144名是官方党的代表,只有3名是“独立的”(无党派)议员。而在官方党议员中,又绝大多数是人民部的成员。

1945年12月31日公布了卡马乔政府向联邦议会呈交并经国会批准的《新选举法令》。1945年的选举法实际上已经把后来几十年墨西哥政治制度最一般的轮廓具体描绘出来,是墨西哥宪政史上一次重要的改革,它不但为墨西哥政治力量对比变化的合法化、为墨西哥政治生活进一步制度化提供了法律依据,取缔了有可能带来选举暴力的各种组织形式,而且也为墨西哥过渡到文官政府奠定了更为扎实的基础。

1946年卡马乔总统任期将结束,对革命党自身制度进一步改革的需要比任何时候都迫切。因为:第一,墨西哥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民众的民主意识有了提高,政权的民主形式被摆到最重要的地位;第二,1945年,一些市政府的暴行,酿成了遍及全国的抗议浪潮;第三,1945年末选举法改革后,新一轮总统选举(1946年)即将来临,为了适应新选举法的需要,许多人都提议进行党的制度深入改革。

选举中,官方党首次提名一位文职人员米格尔·阿莱曼为总统候选人,并赢得了选举竞争的

胜利。此后,墨西哥再没发生过军人专政的事情。

1946年1月卡马乔将墨西哥革命党易名为革命制度党,简称“普里”(PRI),表明墨西哥的革命任务已从群众性政治斗争转为维护和完善现行的制度,相应地,意识形态宣传也从过去的以阶级斗争、社会公正为主,转变为以“全国团结”为旗帜,淡化阶级冲突,强调民族利益。

1950年为了满足日益增多的有政治意识的公民和专门化利益集团的参政要求,革命制度党重新恢复了部门提名制度,职团结构再度得到承认,并且扩展这一结构的外延,在党的外围创立特殊的群众组织,把更多的政治力量整合到党的周围。如:为了保持与军人的团结一致,革命制度党建立了“全国荣誉和公正委员会”;为了鼓励妇女和青年加入官方党,又成立了“全国妇女参政委员会”和“全国青年组织”。

1950年2月初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首都剧场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总结阿莱曼执政4年来党的工作,并做了一些制度性调整。经过这次调整,在卡德纳斯执政时期基本确立的墨西哥政治模式才真正确定和巩固下来。阿莱曼政府的头四年(1946~1950),是自20年代末开始逐步形成的墨西哥宪政制度最后建成的决定性阶段。

1956年墨西哥首都发生学生运动,军队进入工学院校园,把坚持反抗的学生强行赶出宿舍,并将这所高校封闭了数月之久,许多学生被军队交给警察局。这是革命制度党的一大败笔,为1968年更大的学生运动埋下了火种。

#### 四、选举制度改革(1958~1982年)

从1958年洛佩斯·马特奥斯就任总统时起,以推动选举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墨西哥历届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在此之前,由于墨西哥议会一直实行多数选票制,因此,议会几乎全部被执政党垄断,反对党中不仅没有参议员,而且连众议员也很少,议会实际上是革命制度党的一党天下。为了扩大大众议院的代表性,鼓励各个合法组织将其政治能量更多地用于通过合法途径参与国家政治生活,1963年通过修改宪法进行改革,建立了政党代表制,规定凡参加全国选举的政党,只要在选举中获得

2.5%的选票,即可得到5名众议院的席位,所获选票每增加半个百分点,再增加一个席位,但最多不超过20个席位。由于这一改革,各反对党在联邦众议院的席位总数从1961年的6席增至1964年的35席,其中当时最大的反对党——国家行动党就拥有20个众议员席位。1970年埃切维里亚总统执政后,为了能更多地听到少数党的意见,一方面他把反对党获得党众议员资格的总票数由2.5%降至1.5%,另一方面又把党众议员席位的最高限额从20席增至25席,此外,为引导和鼓励青年参与合法的政治竞选,埃切维里亚还把当选参、众议员的年龄下限分别降到30岁和21岁。应该说,马特奥斯和埃切维里亚的政治改革,虽然并没有改变革命制度党在联邦议会的主导地位,但却大幅增加了反对党在众议院的席位,并从此拉开了墨西哥现代政治改革进程的序幕。

1970年埃切维里亚就任总统后所进行的政治改革,与此前若干年的学生运动是有密切关系的。

1968年10月12日,奥运会在墨西哥主办,而恰恰是奥运会成了学生运动的导火索。人民对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长期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表示不满,如:革命制度党控制了国家的所有方面,对执政党几乎没有任何监督,以至于腐败成为国家的严重问题;由于一党独大,客观上造成了上届总统可以挑选下届总统,总统可以直接任命议员、法官、州长,所有宪法规定的人民民主权利几乎都成了一纸空文。民众的这些不满,此刻都借着奥运会这个导火索爆发出来。学生们认为,在国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政府投资1.5亿美元,用于建设新的体育设施,是政府在炫耀自己的“繁荣”,是“无聊”和“空虚”的表现。

1968年10月2日,即奥运会开幕前10天,墨西哥首都的“三文化广场”举行了抗议政府暴力镇压的万人集会,当天下午6时许,政府出动满载军警的坦克、装甲车包围了集会群众,镇压极为严酷,当场打死20多人,并用火箭筒攻击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校门。在此后近两个月的时



玛雅文化遗址

间里,大约有800~1000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2000多人被捕,成为墨西哥历史上最著名的“三文化广场惨案”。结果,使稳定了数十年的墨西哥宪政一度处于危机之中。

1971年学生们借联邦政府领导人换届的时机,要求重新评价1968年的学生抗议活动、平反和进行政治对话、消除腐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他们组织了各种学生团体,开展了小规模抗议示威,在这次抗议活动中,学生们汲取了1968年遭到残酷镇压的教训,没有采取1968年时的大规模抗议示威策略。政府也从1968年镇压学生运动使执政党威信大降和危及执政基础的教训出发,不敢贸然再次公开使用武力了。但原内政部长出身的埃切维里亚总统却希望将学生运动消灭在萌芽状态,为此,政府利用便衣安全部队来对付学生,在随后的镇压行动中,使10多名学生和民众死于非命。

路易斯·埃切维里亚由于直接参与和指挥了1968年的镇压行动,也是1971年压制学生运动时的总统,涉嫌下令杀害学生,直至33年之后,他虽然已是八十多岁的退休老人,仍受到墨西哥特别检察官的谋杀指控。

但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墨西哥的反对党慢慢成长起来了。他们与执政的革命制度党内主张改革的人士一起,逐渐形成了与执政党的竞争关系。在民心向背的变化中,各种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也在进一步改变着革命制度党的执政策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墨西哥国内政治危机发生的过程中,执政党革命制度党不但没有停止,而且还继续积极地推进选举制度的改革。

1976年洛佩斯·波蒂略总统执政后,主张迅速对国家的单一政治结构进行现代化的改造,鼓励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参与政党竞争,以便尽快建立起一个多元化的民主社会。为此,波蒂略于1977年很快颁布了《政治组织和选举程序法》,宣布取消政党议员制,而代之以“比例众议员”制,即众议院设400个席位,其中300席由全国300个选区多数票产生,另100个席位在获准登记的各反对党中按得票率加以分配,后一类产生的众议员称“比例众议员”,两类众议员享有完全同等的权利。此外,改革还放宽了政党登记的条件,反对党还可以联合参选。这一改革得到大多数反对党的支持,特别是使一些左翼政党取得了合法地位,并参加了1979年的议会选举,选举结果墨西哥共产党取得了18个席位,一度成为议会中仅次于国家行动党的第二大反对党。

尽管如此,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革命制度党仍然占据优势,在全国选举中,革命制度党的得票率一般都在70%左右,党在联邦议会中的主导地位还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 五、议会制度改革 政权平稳更替(1982~2000年)

1982年墨西哥出现外债危机,外债累计额达830亿美元。墨西哥不得不实行紧缩政策,并加入了关贸总协定,采取以偿付外债为目的的出口导向型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政府降低了关税,开放市场,吸收外资。墨西哥人口从1950年的2500万增加到1985年的7700万,而人均GNP却从每年的362美元上升到2734美元;人均寿命从41.5岁上升到64.2岁,文盲率则从80%下降到6%。

1982年上台执政的德拉马德里政府,做出了一个对墨西哥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决定,就是开始实行议会制度改革。他下决心把众议院中的“比例众议员”的席位由100个增加到200个,一方面是广纳民意,另一方面是扩大在野党的席位,充分发挥各政党在议会和国家政治中的

作用。他认为,没有政治制度的改革,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很多年后,德拉马德里回忆说:“党长期执政形成根深蒂固的腐败现象,最终导致了党在国家大选中的失败。”

1988年在墨西哥大选中,革命制度党候选人萨利纳斯虽然以51%的微弱多数获得了胜利,但民主革命党的卡德纳斯(前总统卡德纳斯之子)则以31%的选票创造了历史上反对党总统候选人的最高得票纪录。这次大选表明,墨西哥出现了可以真正取代革命制度党的左翼组织。1988年的总统选举被认为是革命制度党走向衰落的标志。这次大选彻底打破了革命制度党一统天下、稳操胜券的传统模式。

为了重树革命制度党在民众中的形象,萨利纳斯和其继任者塞迪略推出了政治改革方案。萨利纳斯将众议院的席位增加到500席,其中300席由多数票产生,200席为“党的众议员”,由比例代表制产生。

1991年11月1日萨利纳斯在国情咨文中正式提出,“社会自由主义”将成为革命制度党的指导思想。在社会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萨利纳斯政府对2000家国有企业实行了私有化,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被降到最低限度。同时,宪法第27条也作了修改,允许村社土地私有化。

墨西哥出现了4000万贫困人口,其中有1700万属于赤贫,20%的最贫困人口仅享有全国4.4%的财富,而20%的最富有人口却占有53.5%的财富。经济和社会矛盾由此可见一斑。

1993年墨西哥修宪,使得反对党成员也能够担任参议员。塞迪略总统执政时期,加快了墨西哥政治改革的步伐:总统不再指定革命制度党的下届总统候选人;联邦区长官不再由总统任命,而是由该区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联邦选举委员会不再由内政部管辖,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

至此,由于墨西哥历史上的三次学生运动(1968年、1971年、1988年),用血的教训换来了政府与民众对话、政府听取民众意见的成果,也换来了执政党民主执政的政治理念。

在长达数十年的执政过程中,革命制度党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利益集团。由于长期独霸政坛,缺乏必要的监督,政府权力在革命制度党中

间传递,社会财富也在他们中间分配。

在萨利纳斯执政期间,一方面,政府官员的腐败日益严重,不断受到反对派的猛烈攻击与指责;另一方面,革命制度党内的矛盾和冲突进一步加剧,党内分歧已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

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墨西哥正式生效。

同日,位于墨西哥东南部的恰帕斯州农民发生暴动。数千印第安土著组成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袭击并占领了该州的一些城镇,扣押了当地政府的一些官员。墨西哥政府紧急调集军队进行镇压,战斗中双方都有人员伤亡。此事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1994年8月在总统选举中,革命制度党虽然保住了统治地位,但墨西哥的一党独大的政治模式却遭到了全面的挑战。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固然是过度利用投机性较强的短期外国资本,但这些流动性极大的外资之所以逃离墨西哥,就是因为1994年墨西哥的政治局势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动荡。继恰帕斯州农民在这年元旦揭竿而起之后,又接连发生两位革命制度党要员被害、总检察长辞职和一位银行家被绑架等事件。动荡的政局与一些不良经济因素交织在一起,终于促使大量外国资本逃离墨西哥,从而引爆了震惊全球的金融危机。

对于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克林顿政府采取了紧急援救措施,给墨西哥数百亿美元的贷款担保,使其终于安然渡过危机。美国政府这种援救的政治意图,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解释,是要捍卫墨西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捍卫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整个西半球自由市场和民主的命运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曾经是拉美经济、政治革命先锋的国家(墨西哥)。因此,帮助墨西哥就是帮助美国自己。

金融危机之后,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加快,据美洲国家组织统计,1995~2007年,12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几乎翻了一番。由此,就业机会大幅度增加,特别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于出口美、加没有关税,发展也较为迅速。

1997年墨西哥中期选举,左翼的民主革命党和右翼的国家行动党异军突起,两党在议会中

的席位之和已经超过了革命制度党。同年,在首次由民选产生的首都联邦区长官角逐中民主革命党又击败了官方党。这宣告了革命制度党左右墨西哥政局的时代的终结,墨政局基本已成三足鼎立之势。

2000年7月2日墨西哥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统选举,由国家行动党和绿党组成的反对派竞选联盟“争取变革联盟”获胜,国家行动党人文森特·福克斯当选总统,革命制度党首尝败绩。

在这次选举之前,革命制度党已执政了71年,是当时世界上选举上台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在此期间,革命制度党渡过了党内的多次政治危机,避免了一次军事暴乱(1940年),并且克服了3次严重的经济危机(30年代的大萧条、1982年的债务危机和1994年的金融危机)。从2000年7月2日大选失败,到同年11月30日晚上政权交接,这中间还有五个月时间。革命制度党如果要抓住政权不放手而发动政变,时间是绰绰有余的。然而,它没有这样做。革命制度党是一个成熟的宪政主义党,70多年来它亲自在墨西哥培育宪政秩序,自己也自觉去维护。事实上,墨西哥是唯一没有发生过成功的军事政变的拉美国家。

## 六、和平转型 和平发展(2000年12月之后)

2000年12月1日国家行动党人文森特·福克斯就任墨西哥总统。

新一届联邦议会的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福克斯总统所代表的政党国家行动党在众议院的500个席位中仅占208席,在参议院128个席位中更是只占46席,不仅都没有达到半数,而且还分别少于反对党革命制度党1个和14个席位,这样一来,福克斯总统就不可能拥有过去革命制度党总统经常拥有的议会支持,议会不可能充当执政党和政府的“橡皮图章”。实际上,总统的行为受到了联邦议会更大的制约。墨西哥联邦议会已经今非昔比,议会不仅在“强而有力”地行使着宪法所赋予的各种职权,并且还在努力推动着墨西哥的政党政治、民主政治和议会政治的历史进程。70多年的宪政发展不仅使联邦议会成

为墨西哥民主的象征，而且是墨西哥民主的保障。

作为曾经有过连续 71 年执政历史的墨西哥最大政党革命制度党，在 2000 年大选失败之后沦为在野党，便十分坦荡地承认和接受了选民的选择。它虽然在议会政治的合法范围内，利用自己的投票权对福克斯政府有所牵制，但是并没有超越宪政规范去妨碍新政府履行自己的职责，更没有假借多年执政的资源优势去从事非法的拆台活动。在早已实行军队国家化的墨西哥，军队、警察都按照宪法的规定，忠于新的民选总统及政府，没有任何人敢于非法维护落选政党的“执政权”，没有发生任何“兵变”迹象。在宪政已经深入人心的墨西哥，70 多年来第一次政权易手，全国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有条不紊，平稳过渡、安全转型。

墨西哥的民主过渡之所以能够比较平稳，与长期以来“渐进”式的政治改革进程有关。

1996 年以来墨西哥经济年均增长 5%，在拉美各国中名列前茅，也保证了政权的平稳过渡。

福克斯在当选和就任总统后，无论是过渡班子还是新政府成员，都没有让自己所属的国家行动党党员占据主要地位。在福克斯政府 29 名成员中，国家行动党只占 6 名，革命制度党占了 3 名，前墨西哥共产党员 1 名，无党派人士 7 名，“福克斯朋友”组织成员 5 名，军人 3 名，其他 4 名。这无疑有助于政局的稳定，并减少“新政”的阻力。

福克斯总统在上任的头 5 天就先后向联邦议会提交了两份法律草案，要求履行前政府与恰帕斯游击队达成的和平协议，并下令从恰帕斯部分冲突地区单方面撤出 1500 名政府军，以表示新政府对和平解决恰帕斯州冲突问题的决心和诚意。

福克斯总统的态度得到了恰帕斯民族解放阵线的积极回应，该阵线领导人表示同意与新政府恢复和平谈判，从而使僵持多年的恰帕斯冲突重新露出和平解决的曙光。

2006 年墨西哥一举取代巴西，成为拉美国家最大的经济实体。

2006 年 7 月 2 日墨西哥大选，这是曾经连续执政 71 年的革命制度党在 2000 年丧失政权

后迎来的第一次大选，国内外都有人估计，革命制度党可能会东山再起。然而，出乎意料，革命制度党不仅未能东山再起，而且名落孙山，连冠亚军决赛权都没有抓到。选票最接近的两位总统候选人是国家行动党的卡尔德龙和民主革命党的奥夫拉多尔。最后是卡尔德龙以 0.58% 的微弱优势胜出，当选总统。

真个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落去的是革命制度党，归来的是国家行动党。墨西哥的宪政制度，连同它的选举制度、政党制度的成熟程度，都更上一层楼了。

险胜的卡尔德龙后来表现如何呢？

卡尔德龙一上任，就宣布采纳竞争对手奥夫拉多尔的提议，将自己和其他内阁成员的工资减少 10%。这项减薪计划为政府节约大量资金，省下来的钱足够在墨西哥兴建 2500 所学校。同时，卡尔德龙还承诺削减包括政府官员手机话费和出国访问的费用等其他政府开支。“向纳税人说明每个比索的用途，透明和负责是每个民选政府的责任。”

这一宣言也为他赢得了廉洁的美誉。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卡尔德龙推行了墨西哥薄饼限价、提高联邦军警薪金等政策。为应对通胀压力，2008 年 5 月又取消了对大米、小麦和玉米的进口限制。作为对竞选承诺的实现，卡尔德龙还推行对雇用没有工作经验者的公司予以奖励的政策，以增加就业机会。

与限价政策同时宣布的，还有墨西哥政府向 2600 万低收入者每人每月发放 120 比索（约合 11.6 美元）补助，1/4 的墨西哥人从中受益……

卡尔德龙总统为何这样处处为老百姓着想？有人说，这就是宪政条件下竞选上台的总统的本色。如果能够靠枪杆子终生稳坐铁打江山，他用得着讨好普通群众吗？

如此为民谋利的总统应该是誉满全国、无人敢“恶毒攻击”吧？不，两大反对党民主革命党和革命制度党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容不得半点沾沾自喜、文过饰非；如果胆敢对批评者进行打击报复，那就等于在政治竞争中自挖墙脚。这也许就是宪政民主的威力。

（作者系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所长）

（责任编辑 李 晨）



# 读 者 来 信 摘 登

《炎黄春秋》编辑部同志：

最近看了《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中的《毛泽东领导“三反”运动》这篇文章，我有些看法。“三反”“五反”“肃反”的时候我还小，并不知道其中意义，不过是“三反”内容如同儿歌似的经常挂在嘴上：“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我反对。”这些运动所反对的方面应该坚决打击，这是肯定的。在当时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只能采用运动的形式。但是一旦形成运动，有了指标，规定了数量，就会“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矫枉过正，过犹不及，就会出现众多的冤假错案。结果就会出现如同本期《公安工作“大跃进”》所写的类似现象。此后数次的运动出现的大部分问题都如出一辙。

1990年代，我的父亲生病住院，同病房的是一位曾经做过北京第一医院的第一任院长的老先生。我去医院照顾我父亲，经常和这位老先生聊天。他给我讲了他在“三反”中被打成“大老虎”的经历。北京第一医院成立于解放初期，当时建在一个大庙寺院里，房屋破烂不堪，需要重新改建，作为院长由他负责改建工作。“三反”那年，他在地开会期间，来了三个人，没有讲明身份，只是通知他有急事回北京。在火车上给他带了手铐，他问犯了什么事，三个人不予回答。中途把他关进某省一座监狱。在监狱中一直无人提审，只是刚进的前三天，由同室犯人围坐一圈，用手指戳他的脑袋，逼他坦白交待，三天不给饭吃，不让睡觉，脑袋都给戳肿了。他当时确实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也不知道坦白什么。好在三天后就没人理他了。和他关在一起的犯人有国民党特务、小偷、流氓、杀人犯等，而凡是新进来的犯人，无论何罪都要经过这样三天的围攻。在这个监狱里他从来没被提审过。三个月后，转回北京一个当时怀疑有问题的人集中关押的地方。在这里，他才知道是医院的会计和搞改建的包工头揭发他有“贪污”行为，被打成“大老虎”。同时关押的还有北京其他各单位的领导等，他所在医院的党支部书记也关在此。直到问题查清，恢复自由已是一年以后了。

《毛泽东领导“三反”运动》文中虽然写了“清查真假老虎严禁逼供信”，但这是在很多人被逼供打成“老虎”，很多个人和家庭受到冤枉、伤害之后才得以纠正。在当时法治不完善的情况下，即使后期被判刑的人中仍可能还有冤案。经过这样大规模的运动整治，是不是就从此杜绝贪污腐败现象了呢？其实也没有。只要有条件，只要权力过大，只要没有法律约束和有效的监督，恐怕再严厉的打击贪腐，也不过是一时，不能解决一世的问题。

北京读者 蒋燕燕 2010-01-11

炎黄春秋编委会：

反映给你们一件我阅读《炎黄春秋》发生在身边的事。

前几天，我在阅读《炎黄春秋》2009年12期。当我翻读到《大跃进中的安徽官场和一个人的觉醒——读〈张恺帆回忆录〉》一文时，我家小时工小吴阿姨看到这个题目，指着“张恺帆”三个字问我怎么念，我告诉了她。她立刻大声说：“张恺帆是个大好人，我知道他，他为我们无为人受了不少的罪。”小吴小时候因家贫未上过学，进城务工后，养成了随处向人请教认字的习惯。这次她大概拿不准这几个字才问我的。

小吴告诉我，三年饥荒年代里，她姥姥一家17口人饿死了15口。活着的，一个是她妈妈，出嫁到婆家了，另一个是她小姨，当时只有三岁，个头很小，每天躲在地里自己找些小萝卜头、菜根之类的东西，没有饿死。但因营养不良，现在还是很矮小瘦弱。小吴是1962年出生的，她说她出生时情况已好多了。在她家乡，比她大几岁的人里，男人多，女人少，因为饥荒年代家里人尽量保住男孩活下来。有一家为保住一个儿子不饿死，饿死了六个姐妹。现在好多男人找不到对象。

当天小吴对我说：“你看完了这本杂志，借给我，我带回家给我女儿看。我讲起过去的苦日子时，她们不相信，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我得对她们进行教育。”第二天，我将这篇文章复印了一份给小吴。

下一次小吴来我家时，告诉我：当她把这篇文章带回家，说是写张恺帆的事时，她那平日不爱读书看报的丈夫赶快接过去看，还口口声声地说：“张恺帆是个大好人。当年他把食堂的大铁锅都给砸了。”当天晚上，他们家就谈论起当年无为县饿死人的惨状，在那荒唐的年代，张恺帆为保护无为老百姓受了不少的罪。其实，小吴和她丈夫都是三年饥荒后出生的人，但他们的先辈告诉他们当年曾经发生过的苦难荒唐事，他们铭记在心，现在还要以此教育子女。

我订阅《炎黄春秋》是为自己解惑，解开历史上的一些疑团，了解真相。这次意外地被我家小时工小吴阿姨将这一篇文章做了教育子女的教材。是啊，好人是不应被忘记的。无为县老百姓没有忘记张恺帆，是应该将荒唐年代发生的荒唐事清理原因，分清是非，从中吸取教训，作为历史教材教育子孙后代。

祝《炎黄春秋》愈办愈好！

北京读者



个人文集  
家史传记！  
三千元起编辑出版

出书范围

一、个人出书：

- 1、革命史、受难史、创业史等回忆录、自传。
- 2、诗文、小说、杂文、随笔等个人文章合集。
- 3、思想理论著作、专业学术著作、旧文结集等。

二、家庭、家族出书（可录音摄像）：

- 1、家庭、家族诗文集、书画集、图片册、亲友纪念册。
- 2、家族先贤传、家族大事记、家谱族谱、家史档案等。
- 3、遗文资料整理、口述录音、摄像刻盘供出版与保存。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打算→编辑部寄发参考样书→作者寄送稿件图片→公司核算成本价格→协商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寄送大样作者初审→专业编辑审改→协商设计封面插页→排版设计制作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出版印刷送书（出版附赠光盘，需录音摄像另商）。

出版说明

一般标准：大32开本，封面插页铜版纸彩印、内页胶版纸印刷，无线胶装。  
基本价格：200页出版50本两千元，300页50本三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计。  
特别说明：书稿内容文责自负，所出书一般没有书号只用于交流与赠送；需出版书号的我们编辑设计样书后代为办理。

欢迎“组稿代理”与“项目合作”

组稿代理：《个人出书网》《老人出书网》《家族出书网》自开办以来，深受各地老干部、学者与民间文化人的欢迎，每月编辑出版个人文集、家史传记50余部；为方便作者就近洽谈与交稿，我们计划设立“地方组稿代理”与“编辑出版分站”，愿与有组稿资源与能力者洽商合作。

项目合作：随着中国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传统文化精神逐步回归，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渐成热点；本公司大力开拓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网络传播与线下出版业务，愿与相同志愿者合作开发相关项目，请来人考察相商。

出版服务专员热线：010—68920114 68920182

时代文化出版机构：北京市海淀区厂洼街五号  
（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院）  
博越商务楼6507室 邮编100089

登陆网址：（个人出书网） www.grcsw.com  
（老人出书网） www.lrcsw.com  
（家族出书网） www.jzcswnet.com

免费咨询电话  
400 633 2311



# 欢迎订阅2010年《炎黄春秋》

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 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

《炎黄春秋》是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对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代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是非功过，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不增美、不溢恶、求实存真，以史为鉴，以史资治。在林林总总的期刊之林中具有鲜明特色。

《炎黄春秋》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资深的革命家，是革命和建设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有的是专家学者，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

本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总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国内各地邮政局（所）均可订阅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 68532048

传真：(010) 68532569

每期定价：6.90元

全年定价：82.80元

如在当地邮政局（所）订阅有困难，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订阅，免付邮费。



## 《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精品书系(第一编)再版隆重推出



1998年推出的《炎黄春秋》精品书系，系从1995年以前45期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150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为：《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历史迷案揭秘》、《名流写真》、《血荐轩辕》。书系出版一年后，即脱销。在纪念《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之际，应广大读者的要求，书系再版发行，以弥补本刊早期合订本销罄之不足。

本书系全套5本，定价125元；另加邮挂费12元（因存书不多，恕不分卷出售）。

## 新中国60周年丛书：

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转折：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内容简介：

本书多位作者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重大事件的决策，记录了一个又一个非凡的历史瞬间，既有官家的宏观视野，又有民间的客观冷静。这些发表于著名纪实性杂志《炎黄春秋》的文章，致力于匡正教科书的偏误，挖掘过去年代有意或无意掩盖的真实历史，全面提供了观察中国政治、经济与生活变化的新视角，诸多真知灼见也闪耀其间。

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定价：36元 邮费6元

转折：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定价：36元 邮费6元

欲购者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订购。





**批量制造改革者**

**我参与了抢救胡耀邦**

**右派农场的马克思主义学会**

**反右欠下的良心债**

**思想者陈乐民**

**“墨西哥奇迹”与墨西哥宪政**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6.90元